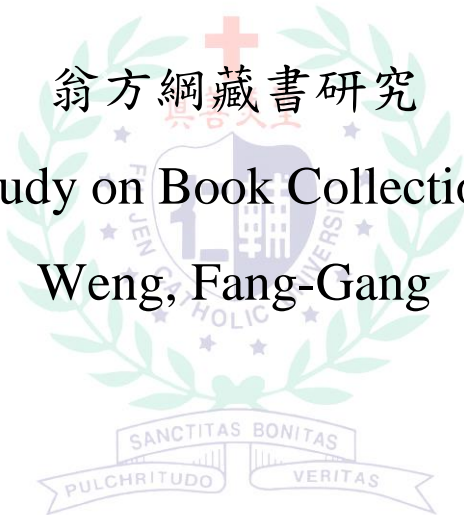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陳冠至博士

翁方綱藏書研究

A Study on Book Collection of
Weng, Fang-Gang



研究生：陳柏溢 撰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七月



私立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陳柏溢 先生之碩士學位論文

翁方綱藏書研究

A Study on Book Collecting of Weng, Fang-Gang

經本委員會審議合格，特此證明。

論文口試委員

指導老師

鄭恒雄（召集人）

陳冠至

鄭恒雄

陳冠至

趙飛鵬

趙飛鵬

系主任

李正吉

李正吉

中華民國 108 年 07 月



謝辭

時光飛逝，碩士生活說長不長，說短暫也不短暫，轉眼間我也即將畢業了。回想以往的我，萬萬也不曾想過居然能夠取得碩士學位，所以，在這段求學的過程中，真的非常感謝一路上教導我的師長、助教、以及互相勉勵的學長姐、同學們，才讓我能夠順利完成學業。

首先，要深深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冠至老師。他引領我從一個完全門外漢，到能夠完成論文的撰寫，而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謝和我之間扮演著亦師亦友角色的冠至老師。老師不僅花費非常多的心力在教導我，除此之外，更是不遺餘力的回答我的問題，讓我得以循序漸進，慢慢地一點一點進步，直到完成論文。我心中的感謝或許無法用簡短的文字表達，但容我再次謝謝我的指導老師—冠至老師。此外，也非常感謝口試期間，給予非常多寶貴建議與指引未來研究方向的趙飛鵬老師、鄭恒雄老師，使得此篇論文更加完整，真的非常感謝老師們的用心與指教，讓我可以順利完成論文。

在求學期間，也非常感謝系上的老師們，包括：李正吉主任、林麗娟老師、吳政叡老師、黃元鶴老師、彭于萍老師、陳世娟老師、陳淑燕老師等諸位老師，給予我學業上的指導，讓我理解圖書資訊學的內涵，也給予我更多啟發，使我想要再更加深入去探討與研究。同時，也非常感謝靜宜助教與小童助教，總是給我很多幫助與建議。除此之外，也感謝這一路走來與我互相勉勵打拼的同學們，昀庭、明菁、弘傑、怡秀、冠勻、仕軒、劉涵，以及學弟妹們世軒、梓涵，謝謝你們，讓我可以和大家互相砥礪、也一同歡笑。不論是待在研究室的日子，或是一同學習的修課過程中，因為有你們的陪伴，使得碩士生活總是顯得充滿歡笑與樂趣。

最後，感謝一直在我身邊陪伴與鼓勵我的父母與好友們，你們的支持是我向前邁進最大的動力，並且讓我下定決心，前往下個階段。於茲謹將本文獻給所有關心我的人，謝謝你們在我人生的這個階段給予種種幫助與鼓勵，真的非常感謝你們陪我一起走過這段美好的時光。

陳柏溢 謹誌於輔仁大學文開樓

2019 年 7 月



摘要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書籍是文化最重要的承載物。承襲宋明藏書事業勃興之緒餘，有清一代，私人藏書之風特別盛行，著名藏書家輩出。翁方綱(1733-1818)是清代中葉的名宦，也是著名的學者與書法家。由於他非常崇拜北宋名儒蘇軾(1037-1101)的人品、道德與文章，因此，他為自己的讀書室起名叫「蘇齋」。可見他對藏書活動的癡迷與熱情。

翁方綱博學多聞，才華洋溢，一生研究經籍、從事考訂、探索金石、精通書法、創作詞章，具備多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他所提出的「肌理說」，更成為清代乾嘉時期最有影響力的詩學理論，使得後世學者紛紛投入研究，對其詩論提出許多觀點；至於翁方綱之金石與書法方面的造詣，亦有學者提出一些研究成果，惟獨翁方綱的藏書事業付之闕如，至今仍乏人探索。

因此，本研究的宗旨，擬從現存翁方綱生平接觸過的古籍當中，透過翁方綱之題跋、手札，以及所有記載翁方綱事蹟的諸家文集等文獻，來找出翁方綱個人藏書的內容與特色、藏書社群並且選擇適當的社群分析軟體 UCIN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Network)，作為輔助研究的工具。透過該軟體內建之繪圖程式，將翁方綱社群資料輸入，進而描繪出翁方綱社群關係圖，希望藉由現代的科技，來顯現「資訊視覺化」的成果，並使讀者能夠更加方便了解其內涵，以及對當時與後世藏書文化的影響。本文共分為六章，各章內容分別如下述：緒論、文獻分析、研究方法、翁方綱社群關係的解析、翁方綱的藏書活動、結論。期盼能為中國古代圖書事業的發展史，再添新的一頁。

關鍵詞：翁方綱；私人藏書；清代；數位人文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soul of city, and the book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bearing of culture. Inherit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collection of books, the private collection is especially popular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famous books collectors rise at that time, too. Weng, Fang-Gang (1733-1818) is a famous eunuch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lso a famous scholar and calligrapher. He named his study room "Su Zhai", because he admired Su, Shi (1037-1101) who was a famous Confucian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how that how he immersed in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Weng, Fang-Gang was a well-informed and versatile. He spent all his life on studying religious text, doing textual criticism and doing epigraphy. He was also good at calligraphy and write poetry and article. He is a really talented person. "Texture theory"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y of poetry in the Qian-jia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exture theory" made many scholars started to involve to the research and presented different ideas of the theory of poetry. There were also many scholar doing research on the Epigraphy and calligraphy of Weng, Fang-Gang. But there was no one doing research on the books collection of Weng, Fang-Gang.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the inscriptions, commonplace books, and all the anthology and other literatures of the Weng, Fang-Gang ancient books in the rare book that Weng, Fang-Gang had contacted. To find out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eng, Fang-Gang's personal collection, bibliophile groups and choose the right UCIN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Network) as a tool for research. Through the drawing program in the software, I inpu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Weng, Fang-Gang community, and then the computer will show the Weng, Fang-Gang's community relationship map. I hope that the modern technology will show the results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d make readers to know it is more convenient to understand its connot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books collection culture at that time and next generation. Thi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Introduction,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ology, Analysis of Weng Fang-Gang's bibliophile groups, Weng, Fang-Gang 's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Conclusion. I look forward to adding a new page to the history of the rare Chinese book industry.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big step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Keyword: Weng, Fang-Gang; Private collection; Qing dynasty; Digital humanities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3
第二章 文獻分析	5
第一節 清代的藏書事業	5
第二節 清代中葉京津地區的私家藏書風氣	14
第三節 翁方綱的生平與藝文成就	1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7
第一節 研究步驟	27
第二節 研究架構	28
第三節 研究方法	30

第四章 翁方綱社群關係的解析.....	33
第一節 親族關係.....	33
第二節 師承關係.....	36
第三節 友朋關係.....	43
第五章 翁方綱的藏書活動.....	65
第一節 藏書的徵集.....	65
第二節 藏書的度藏.....	70
第三節 藏書的利用.....	75
第四節 藏書的流通.....	82
第五節 翁氏藏書對推動學術文化的影響.....	84
第六章 結論.....	93
附錄.....	99
附錄一：國家圖書館典藏：宋·郭忠恕，《佩觿》（內含翁方綱手書題記）.....	99

附錄二：國家圖書館典藏：宋·蘇軾，《註東坡先生詩》 （內含翁方綱四十小像）	101
附錄三：翁方綱藏書印	102
附錄四：翁方綱藏書社群成員知見表	103
附錄五：國家圖書館典藏：漢·司馬遷，《史記》（內含翁 方綱藏書印、手書題記）	106
附錄六：國家圖書館典藏：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 （內含翁方綱手書題記）	108
參考文獻	109



表目次

表 1 清代江浙、安徽藏書家分布表..... 16

表 2 清代私家藏書樓在京杭大運河流經各省境內的分布統計表... 18



圖目次

圖 1 翁方綱親族藏書之社會網絡關係圖	35
圖 2 清·鄭玄，《儀禮註疏》	39
圖 3 翁方綱之師承關係藏書社群網絡圖	43
圖 4 翁方綱之友朋關係藏書社群網絡圖	61
圖 5 翁方綱藏書社群網絡關係圖	62





第一章 緒論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書籍是文化最重要的承載物。承襲宋明藏書事業勃興之緒餘，有清一代，私人藏書之風特別盛行，著名藏書家輩出。清代常熟藏書家錢曾（1629-1701）就曾說過：「閑窗靜坐，爐香郁然，覽茲墨妙，是正書中一二訛字，覺人世間榮名利養之樂，罕有逾於此者。」¹藏書家們能夠從書卷中體會到紙潤墨香，這種心情，非有獨鍾，實難體會。



清朝統治中國的二百六十多年間，由於官府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和寺觀藏書都得到空前的發展，使得歷來學者多認為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裡藏書事業發展的全盛時期。由於文獻的傳承和藏書制度的變革，清代藏書對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教育，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²

翁方綱（1733-1818）是清代中葉的名宦，也是著名的學者與書法家。由於他非常崇拜北宋名儒蘇軾（1037-1101）的人品、道德與文章，因此，他為自己的讀書室起名叫「蘇齋」。至於翁氏的藏書處所，除了「寶蘇室」外，另有「小蓬萊閣」、「賜書樓」、「三萬卷齋」、「三漢畫齋」、「石墨樓」等處，可見他對藏書活動的癡迷與熱情。然而，翁氏的藏書當不只三萬卷而已，³據《履園叢話》記載：「所

¹ 清·錢曾撰、丁瑜點校，《讀書敏求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頁115。

²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頁745。

³ 劉兆祐，《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2007年5月第1版），頁231-233。

居京師前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瑯。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談論也。」⁴可見其藏書之富與品質之精。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翁方綱博學多聞，才華洋溢，一生研究經籍、從事考訂、探索金石、精通書法、創作詞章，具備多方面的成就，留下的著作包含文集、詩集、題跋、序文、筆記、提要、手札等，可謂著作等身。尤其是他所提出的「肌理說」，更成為清代乾嘉時期最有影響力的詩學理論，使得後世學者紛紛投入研究，對其詩論提出許多觀點；至於翁方綱之金石與書法方面的造詣，亦有學者提出一些研究成果，惟獨翁方綱的藏書事業付之闕如，至今仍乏人探索。因此，本研究的方向即在於：

1. 由於現存翁方綱藏書相關史料十分缺乏，因此筆者擬從現存翁方綱生平接觸過的古籍當中，透過翁方綱之題跋、手札，以及所有記載翁方綱事蹟的諸家文集等文獻，來找出翁方綱個人藏書的內容與特色，以及對當時與後世藏書文化的影響。
2. 探討翁方綱於學術文化及其他方面的成就，以及這些成就與他所熱衷之藏書事業的關聯性。

有鑑於此，為了完成上列之研究旨要，尚待釐清的相關問題仍有許多，茲縷列如下：

⁴ 清·錢泳，《履園叢話》（《清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卷4，〈叢話六·耆舊〉，頁3341。

1. 清代中期，北京地區文士們普遍的生活文化型態與特徵為何？
2. 清代中期藏書活動的特色與翁方綱個人藏書的關係如何？
3. 翁方綱的藝文交遊、社群生活等，與其藏書生活的關係為何？
4. 翁方綱的藏書事業，對於當時與後世學術研究的影響有哪些？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擬對翁方綱各個面向的成就來研究。由於現存翁方綱藏書事蹟的相關史料十分缺乏，因此筆者將透過地毯式的文獻搜索，涵蓋文學、史學、圖書資訊學等學科領域的各類文獻，來蒐集相關資料。此外，在研究過程中，針對主題的範圍與限制，也必須加以釐清，說明如下：

一、在研究範圍上，本文將以翁方綱以及其家族、交遊情況去更加的深入探討、研究、了解，並且去延伸發掘出翁方綱的藏書事業、藏書生活與藏書社群等等，其中，本文收錄的人物，以翁方綱藏書社群為主，故所錄之人物皆為藏書家，非藏書家則不收錄。

至於本研究所指的藏書家，筆者參照陳冠至先生於〈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一文中所做的結論：「舉凡著述家及其後代，書畫收藏者、碑刻古器收藏者，以及古今書籍（包含軸、卷、冊、抄本等非今日所認定為書籍的載體形式）的收藏者，不論其收藏量的多寡，藏書目錄之有無，只要其人癖好藏書、熱愛圖書，均可按史料上的記載，視當時藏書活動與文獻徵集的關

聯程度，將之視為『藏書家』。」⁵本文即透過上文對中國古代藏書的定義為主軸，整理與歸納出翁方綱及其藏書社群的藏書活動和事蹟。

二、在時空的斷限上，本文所指之清朝中葉，即是以公元 1645-1840 年間的中國為研究的時空背景。不過為求藏書文化發展歷程之完整性，有時仍必須涵蓋少部分清初時期與清代後期，俾便觀察到藏書文化史的全貌；而區域限制，則以翁方綱的籍貫順天府大興縣，以及翁方綱藏書地京師(北京)為中心來進行探討。

三、本研究需要爬梳的史料，主要是正史、清人別集、清代地方志、清代筆記小說、清代書日和題跋、清人藏書專著與專論等各類文獻。其中，凡具備翁方綱藏書紀載者，則加以收錄、整理與分析，作為解釋翁方綱藏書活動的基礎，包含圖書蒐集、整理維護、校籌刊物、出版刊行、典藏鑑賞、文會社集、書籍流通……等與翁方綱藏書事業相關的一切活動。



⁵ 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48 卷第 1 期，2010 年 10 月），頁 132。

第二章 文獻分析

滿清王朝在總結前代統治者經驗的基礎上，採取了一種寬嚴相濟的政策。一方面加強民族壓迫，厲行文字獄，鎮壓各地的軍事集團和農民起義，強化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進一步加強了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另一方面，則提倡程朱理學，並大規模地全國性徵書，以及編纂叢書和刻印書籍，從意識型態上鞏固新朝的統治，維護封建秩序。所以，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的官府藏書，往往得到加強與充實。清祚肇建，首先是由內閣負責收藏中央政府的圖籍；到了乾隆初年，則由昭仁殿庋藏歷代遺留的善本，翰林院保存《永樂大典》等圖書。乾隆中期修撰《四庫全書》，更是一種「寓禁於徵」的鉅型社會行為，由官府組織力量，對全天下的典籍進行一次全面性的審查與刪改；且透過入藏《四庫全書》，更為國家藏書事業擴建了北方宮廷四閣（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文溯閣）和江南三閣（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的大量官府藏書事業。加上《四庫全書薈要》的編成與入藏，以及修書時大量底本的保存與複製，官府藏書系統得以更加完備。尤其是官民合辦的江南三閣，當時更允許士子們借讀借鈔，不僅有利於知識與文化的普及，對於私家藏書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⁶

第一節 清代的藏書事業

在清初統治者的休養生息與剛柔並濟的政策之下，政治逐步趨向穩定，經濟和社會生產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繁榮的社會經濟，直接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與興盛，也因此圖書事業隨之得到了很大的推進，刻書活動十

⁶ 傅璇琮、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 745。

分普遍，不論是官府、寺觀、書院、坊市或是私人等刻書事業均達到鼎盛時期，圖書大量的生產，印刷業又更進一步地精進與發達，相當有利於各類型藏書事業的發展。⁷

清代是中國古代藏書學術思想發展的總結性階段，不論是孫從添(1692-1767)的《藏書紀要》、沈紹實《儒藏說約》、葉德輝《藏書十約》、錢曾《讀書敏求記》、丁申(1829-1887)《武林藏書錄》、以及葉昌熾(1849-1917)《藏書紀事詩》等藏書專著與專論，都是蘊含著豐富古代藏書學術思想的重要成果。因此清代藏書思想研究在中國藏書史上，確實佔了很重要的一部份。⁸

藏是用之根本，沒有藏，則無以為用。清代藏書的佞宋觀念、善本觀念、抄錄觀念、鑑賞觀念等，既是清代藏書家十分流行的藏書蒐集觀念，也是清代藏書家愛書精神的一種體現。徵書、購書與抄書，都是清代藏書的基本圖書徵集法，而其中的抄書活動，既是古代文人學士治學的基本方法，也是古代藏書家補充藏書的重要途徑。相較於歷代的藏書活動，清代是最為重視藏書建築科學設計的朝代，在防火、防潮、防霉、防蟲、防盜等各方面，都可謂特別考究。表現在對於藏書樓的設計上非常謹慎與細心，清代的藏書家們大多嗜書如命，對於藏書的呵護絕不遜於以往的每個朝代。⁹

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源遠流長，透過歷代典籍的傳承與散播，是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其中，官府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和寺觀藏書，構成了中國古代四大藏書體系，¹⁰加上歷朝歷代學術的遞進發展，對於促進中國古代文化的橫向散布與縱向傳承，確實起著最為重要的歷史作用。就清代而言，清初學風崇尚明末啟蒙思想家們所主張的「經世致用」之學，由於當時對程朱理學的提倡，在「格物致知」

⁷ 徐壽芝，〈試論清代的公私藏書〉（《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頁127。

⁸ 王蕾，〈清代藏書思想研究現狀與思路〉（《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0年第6期），頁19。

⁹ 程煥文，〈論清代藏書思想及其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的關係—《清代藏書思想研究》序〉（《圖書館建設》，2013年第1期），頁3。

¹⁰ 葉憲允，〈清代「靈隱書藏」及其影響〉（《高校圖書館工作》，2016年第4期），頁73。

的學術思想影響之下，部分學者轉向考據和訓詁之學，使得「漢學」逐漸興盛。當然，讀書往往就需要先藏書，且為了更為廣泛的學習，藏書就更廣博、精要，由學術的要求，進一步提高到藏書質量的講究，於是使得藏書與學術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¹¹

一、官府藏書

政治制度上的保證，是官府藏書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而經費上的投入，則是官府藏書能夠不斷發展的必要條件。要發展官府藏書，首先必須保證有充足的財源，尤其是歷代統治者在無數次的民間訪書中，都很好地運用了經濟手段，投入巨大的財力。¹²綜觀清代的官府藏書系統，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宮廷藏書樓

即建立於皇宮、行宮等地方的藏書樓。例如：內廷之文淵閣、圓明園之文源閣、盛京之文溯閣、承德之文津閣、以及乾清宮之「天祿琳琅」等處。

關於「天祿琳琅」藏書的誕生，起始於高宗乾隆，當時皇家藏書日益豐富，規模相當可觀，不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超越了前朝。乾隆 9 年（1744），乾隆帝下令翰林學士檢閱內府善本，擇其優者，移至昭仁殿列架典藏，並親題匾聯「天祿琳琅」四字，高懸於殿內。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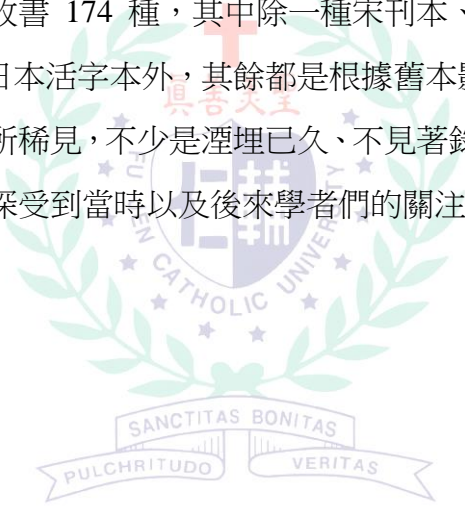
¹¹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 746。

¹² 徐壽芝，〈古代官府藏書與利用〉（《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3 期），頁 131。

¹³ 劉薈，《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 1 版），頁 21。

嘉慶皇帝親政後，由於當時經濟已高度發達，學術亦繁榮鼎盛，使得學者藏書風氣相當盛行，加上文網亦不如以前那麼嚴密，於是許多禁書遂逐漸復出於世。嘉慶 4 年（1799），阮元（1764-1849）初任浙江巡撫，發現有不少珍本秘籍為《四庫全書》所未收，於是利用職務之便，大肆地蒐訪《四庫全書》所缺之圖書。他於蒐得之書當中，選取珍本影鈔，並按照《四庫全書》提要的體例，寫成各書提要，彙整成一編，上呈朝廷。此事歷時十餘年，直至嘉慶中葉，進呈之書高達 174 種。嘉慶帝乃下令仿照《四庫全書》排比裝潢，蓋上「嘉慶御覽之寶」朱文方印，並賜名《宛委別藏》，典藏於宮中。

《宛委別藏》總計收書 174 種，其中除一種宋刊本、一種元刊本、三種明刊本、一種清刊本和六種日本活字本外，其餘都是根據舊本影寫精鈔。《宛委別藏》所收錄的版本多數為世所稀見，不少是湮埋已久、不見著錄於明清各家藏書目錄當中的重要古籍，因而深深受到當時以及後來學者們的關注。¹⁴



（二）、官辦藏書樓

在第一份《四庫全書》抄寫完後，乾隆皇帝考慮到蘇州、浙江。因為這些地方為多數人文匯集之地，讀書人多，為了讓讀書人能夠看到《四庫全書》，於是決定再抄寫三份，分別藏於江蘇的蘇州、鎮江和浙江的杭州。在此之前乾隆皇帝已經向三地各賜頒了一部《古今圖書集成》，揚州、鎮江為了藏《古今圖書集成》，已經仿造了天一閣修建了文匯閣和文宗閣，皆為乾隆賜名之，杭州把《古今圖書集成》藏在西湖孤山的聖音寺玉蘭堂內，乾隆 47 年（1782）對玉蘭堂進行了改建，乾隆 49 年（1784）建完，並且改名為文瀾閣。¹⁵

¹⁴ 張升，《明清宮廷藏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 10 月第 1 版），頁 170-171。

¹⁵ 費愉慶，〈中國古代官府藏書機構考〉（《當代圖書館》，2004 第 3 期），頁 78。

（三）、中央機構藏書處

翰林院是清廷分掌論纂文史的機構。清廷因為修《四庫全書》而藏置圖書於翰林院，故其藏書在官府藏書系統中佔重要的地位。翰林院設點簿廳，掌管圖籍；設招待廳，掌繕寫、校勘之事。朝廷在纂修《四庫全書》之時，由於各省進到之書一部份是所經辦官吏採進之書，一部份是各省藏書家進呈之書。隨著修書工作的進行，都感到要發還給原主是件困難的事，但是若統一抄寫複本保存也是非常費事費工，所以最後在乾隆 51 年（1786）提出了直接保存原本，因而構成了翰林院藏書的基礎。

國子監為清廷最高學府，初設於順治元年（1644）。在國子監的典籍廳設漢典籍一員，職掌貯監書籍、碑石、版刻等各種事務由典籍總管。國子監由於教育研究的需要，是有專門藏書提供師生使用的。國子監收藏圖書，分有總庫和分書庫兩級。彝倫堂書庫和御書樓是總書庫，六堂（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六個講習之所）等則有藏書分庫供師生閱讀。¹⁶

（四）、地方政府機構藏書處

清代地方行政區域的教育事務，初期設有督學道的管理。雍正 4 年（1726），各省督學改為學政，稱提督某省學政，掌管一省之學校以及教育行政、考試等等之

¹⁶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 794-798。

事。正是因為學習、教育和考試的需要，所以在全國各地的府、州、縣的學校都設有藏書處，其特點為持續性的，朝廷會不斷的賜予典籍，這是典籍增加主要的來源。也因為這些地方上的藏書，成為地方文化教育事業的主要資源。¹⁷

一般而言，官府藏書有比較充裕的經費支撐，有固定的管理人員，並經常獲得朝廷的頒賜圖書，以及各界的贈送、調補，因此，其所典藏的圖書，不論質與量都是很高的，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成為封建社會文化與教育推廣的重要基地。

二、寺觀藏書

寺觀藏書，即佛教的寺院和道教的道觀（館、宮）等藏書，在中國古代藏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與官、私、書院藏書相互促進，互為補充，成為我國古代藏書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寺觀藏書自出現以來，歷經一千餘年的曲折發展，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

古代的寺觀藏書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兩漢之際佛教的傳入，以及道教的發展與佛經的傳譯、道藏的出現等因素，為中國古代的寺觀藏書創造了必要的物質基礎。隨著佛教的傳入，道教的出現，佛、道經典不斷透過經藏的翻譯而產生，使得寺觀藏書事業亦隨之開始萌芽，並不斷得以開展和興盛。¹⁸

佛、道二教自兩漢時期傳入江南，歷經千餘年後，寺觀四處林立，寶塔遍佈各地。僅杭州一地，北宋時就有佛教寺院 360 所，至宋室南渡後，又增至 480 所，正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寺廟的林立，也為中國古代寺觀藏書

¹⁷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 812-813。

¹⁸ 徐壽芝，〈古代寺觀藏書及整理〉（《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3 年第 6 期），頁 93。

事業的活絡，提供了發展的舞臺與基礎。嘉慶 14 年（1809），翁方綱與阮元創辦「靈隱書藏」，並且捐贈自己的《復初齋集》以供庋藏，實為歷代寺觀藏書中的一項創舉之一。¹⁹總之，寺觀藏書在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承悠久，生生不息，成績輝煌。

三、書院藏書

中國是世界上設置圖書典藏機構與管理人員最早的國家之一，作為中國古代三大藏書系統之一的書院藏書，其在圖書來源、收藏規模和特色、館藏管理體系以及服務原則等方面，對中國現代圖書館工作，都產生了许多深遠的影響。古代書院，可說在中國文化史、藏書史以及圖書館史上，都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席之地。²⁰

隨著宋以後書院的興起與發展，並進一步與科舉考試，以及教育、理學研究和講學等學術文化活動相互結合，使得書院藏書日漸豐富。尤其到了清代，在考據學的推動之下，藏書事業更成為書院功能當中，最為重要的環節。²¹

歷代書院對於如何借閱使用本身典藏的圖書，都設立許多規定。例如在借閱方法上，曾有規定了借閱日期、卷冊數，以及借閱時必須當面點清圖書；如有殘破和污損，皆勒令限期補齊或賠償；而對於隨意圈改點評者，以後則不予借書。在借閱內容上，也曾制訂了哪些書可借，哪些不可；哪些可以借出院外，哪些必須在院內書室閱讀等規則。²²

¹⁹ 陳東輝，〈杭州靈隱的書藏與經藏〉（《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 年第 4 期），頁 127。

²⁰ 顧沿泊，〈古代書院藏書對現代圖書館的啟示〉（《圖書館情報研究》，2010 年第 4 期），頁 187。

²¹ 周郁、蔡建國，〈晚清書院藏書圖書館化述論〉（《高校圖書館工作》，2008 年第 2 期），頁 58。

²² 王志勇，〈清代書院藏書的借閱制度考略〉（《齊魯師範學院學報》，2013 年第 6 期），頁 144。

然而，清初有鑑於明末書院之結黨亂政，動搖國本，故對書院採取壓制手段，禁止別創書院。直到康熙、雍正年間，才又逐漸開放。只是好景不常，其後又因西風東漸，中國各地在受到西式教育浪潮的衝擊下，書院教育日漸萎縮，不復舊時盛景。不過，當光緒 27 年（1901）清政府正式下達書院改制命令時，即便各省書院紛紛改成各級學堂，而書院藏書或藏書樓，卻仍在興辦近代圖書館的熱潮中繼續發揮出許多作用。總之，中國古代書院藏書的開放性、管理制度的完善性、管理人才的精幹性，都為古代的書院藏書樓走向現代圖書館的轉化過程，做出了相當重要的準備工作。²³

四、私家藏書

在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圖書典籍都是由官方收藏和管理，對於國家藏書，普通讀書人是難以窺見的。為了使自己閱讀到更多的書籍，學者們紛紛出資購買或抄寫書籍，於是私家藏書乃逐漸發展起來。相較於官府藏書，私家藏書在記載、保存、傳播、發展文化中，有幾點是官府藏書較無法比擬的。其一，對於圖書的保存與傳承之成功。最為明顯的情況即是每逢戰亂，官府藏書往往都會遭到損毀；以及改朝換代後的皇家藏書，都會損失極大。而相較之下，私家藏書則是因為分散於各地，加上藏書家們多半嗜書如命，通常都會極力地守護著自家所藏的書籍，所以大多能夠躲過戰亂且流傳給後世。其二，在廣泛接近讀者，供人閱讀，亦即發揮圖書流通作用方面，私人藏書更優於官府藏書。其理由就是歷代皇家或是各級官府藏書，普遍都是管束極為嚴厲的，通常只能為皇家或達官、貴族等少數人所使用，至於一般文人、百姓，則很難閱讀的到。相反地，私人藏書會因為遍及各地，比較容易讓更多人閱讀使用，況且不少藏書家都有以書傳學、造福社會的進步思想，秉持為傳播

²³ 周郁、蔡建國，〈晚清書院藏書圖書館化述論〉，頁 58。

學術文化而主動向社會開放其私人藏書，讓更多的人能夠閱讀、校讎、抄錄或複製。

24

大多數藏書家在不斷蒐集圖書的過程中，得以利用豐富的藏書，不斷地學習進步，逐漸成為聞名於當世的學者。例如清代的藏書家們，他們利用豐富的自家藏書，具有淵博的知識，積極從事版本、目錄、經學、小學、史學、文學等領域的研究，以及校勘、辨偽、輯佚、編纂、刊刻等方面的學術活動。²⁵

其次，由於清代的印刷出版事業空前發達，自康熙時期起，在清宮就設置了龐大的刻書機構—武英殿修書處，所印書籍種類、數量與品質都相當地高，通行天下。至於坊刻和家刻，也都更為興盛。在這樣多元印刷生產圖書的情況下，書籍成了市面上量產的大宗商品，供需層面都很大，貿易十分頻繁，出現許多馳名天下的大型書籍市場，例如：北京的琉璃廠、金陵的三山街，以及蘇州、杭州等地的販書業，都達到了空前地繁榮景象。總之，當時只要懷抱聚書的嗜好，携金往赴各地書市，便可舟楫車運，滿載而歸，頃刻間頓成藏書之家。

綜觀清代私家藏書的發展歷程，它有著幾個不同於前代的顯著特點：

第一，清代的藏書家在藏、用的結合上，不少人埋首於學術研究，並且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這對中國古籍的整理，做出許多方面的貢獻，同時也發展並總結了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藏書學、編纂學等諸多學問。

第二，在藏書風氣上，清代藏書家普遍有重視宋雕元槧，搜求善本的嗜好。他們不惜重金，盡力購求，以多獲為榮。為了表示對宋元珍刻的偏好，有些藏書家特別構建專門典藏宋元善本的藏書庫，有些則編撰家藏的善本書志，還有許多僅僅鈐印典藏宋元珍本的專門藏書章而已，然其旨仍在特為標記，以突顯寶愛之意。

²⁴ 李萬健，〈清代藏書家及其目錄〉（《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0年第1期），頁10。

²⁵ 張娟，〈清代私家藏書對學術發展的影響〉（《呂梁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頁50。

第三，很多清代藏書家都承襲與發展了明代部分私家藏書所具有的開明藏書思想，他們不僅能借書於人，甚至還有許多人組織專門社團，以廣典籍之流通。²⁶

總之，私家藏書之興盛，確實促進了清代學術，尤其是樸學的發展。由於私家藏書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參考資料，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大量的私家藏書支撐，清代學術研究要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承襲明末一些開明的藏書家流通圖書的觀念，更多的清代藏書家，也意識到不秘私藏、互相交流的重要性，²⁷這點對於發揚與活絡清代的學術與研究，更是發揮著極為重要的歷史作用。



第二節 清代中葉京津地區的私家藏書風氣

私家藏書大致是因讀書治學之目的而建立起來的，但也因興趣愛好，治學重點和讀書求學的目的等不同，可以略分成撰述家藏書、收藏家藏書和出版家藏書。清代的私人藏書家為數甚多，而涓涓細水，匯為洪流，由於眾多藏書家的不遺餘力，日積月累，才使清代的藏書事業蔚為大觀，人數與風氣皆居歷朝之冠。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藏書家與藏書家之間，往往會因嗜癖相同而結為藏書社群，且每一時期，都有一些優秀的藏書家，他們或以遠見卓識，領風氣之先；或以藏棄的精美豐富，冠海內之首，成為當時藏書界的代表人物。²⁸

²⁶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頁269-270。

²⁷ 陳東輝，〈清代私家藏書與學術發展之互動關係〉（《文獻》，2003年第4期），頁192-193。

²⁸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頁92。

一、清代中葉私家藏書的發展

清代中葉特指乾嘉時期。清代樸學到了乾嘉時期達到了全盛階段，典籍文獻的考據碩果累累，遍及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諸多方面，在經義、史實、天文、地理、名物、制度等許多領域，都進行了辯證與考訂。如此大量的工作，需要學者們豐富的藏書和學識，這是清代中期私家藏書發展的一個原因。

清代私家藏書發展的軌跡，是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相吻合的。中國長期處在封建主義為主流的情況下，明末資本主義剛開始萌芽，便因改朝換代而遭扼殺，清朝政府為了消解來自各地漢人和南明的反抗，同樣也祭出了中央集權的法寶，強化了本就十分濃烈的封建色彩。封建文化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反映在私家藏書上，「重藏輕用」的觀念便為多數的藏書家所認同，例如嘉慶年間的「五桂樓」主人黃澄量，給子孫立下「鬻與借人即為不孝」的家規。²⁹「抱經堂」主人盧文弨（1717-1796）則有「三禁」誠約：「禁私開、禁煙火、禁出借」。³⁰而藏書高達十萬卷的楊繼振（1832-1897），也在藏書印中鑄下了「三勿」之誡：「勿以鬻錢，勿以借書，勿以貽不孝子孫」。³¹此外，傳承數百年之久的寧波「天一閣」，更是以「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為家訓，為子孫們所共同遵守。在這樣的封建倫理框架之下，不少知名藏書家及學者都熱衷於「藏」，更注重「守」，成為清代私家藏書承襲古代思想而呈現出的一種文化氣象。³²

此外，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的編纂，也刺激了私家藏書的發展。關於這個狀況的原因，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是四庫館徵集天下圖書時，朝廷對於獻書較多的收藏家給予嘉獎，這被許多人看作是光耀門庭的佳事，從而鼓勵更多的私家

²⁹ 黃建國，高躍新，《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7月第1版），頁364。

³⁰ 黃建國，高躍新，《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頁364。

³¹ 黃建國，高躍新，《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頁364。

³²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頁333-334。

藏書。另一方面，由於《四庫全書》修成後，乾隆皇帝為了宣傳他「欽定」的思想文化，於是主張《四庫全書》在一定範圍內，可向士人與學者們開放。總之，清代中期的私家藏書風氣，是以乾嘉考據學的興盛為動力，同時以《四庫全書》的編纂為契機，進而得到不斷的推展與繁榮。³³

據統計，清代全國的私家藏書人數，當以江南的江浙等地區為最多，至於北方則是以山東、直隸兩省為最。³⁴僅以藏書家人數佔全國絕大部分的江蘇、浙江及安徽來看，可以得知清代的藏書風氣是非常旺盛的。

表 1 清代江浙、安徽藏書家分布表。³⁵

省份	府別	清初期 (1644-1735)	清中期 (1736-1840)	清晚期 (1840-1911)	總計
江蘇	江寧府	2	13	11	26
	鎮江府	1	8	2	11
	常州府	2	14	11	27
	無錫	8	14	5	27
	蘇州府	76	146	62	284
	揚州府	8	36	8	52
	松江府	10	33	6	49
	總計	107	264	105	476
浙江	杭州府	24	88	61	172
	嘉興府	19	58	16	93
	湖州府	3	17	24	44
	金華府	0	2	4	6
	寧波府	8	18	15	41
	紹興府	6	22	21	50
	台州府	0	3	8	11

³³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頁 100-101。

³⁴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 746。

³⁵ 王桂平，《清代江南藏書家刻書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

	總計	60	208	149	417
安徽	徽州府	13	35	8	56
	寧國府	1	12	9	22
	池州府	2	1	2	5
	太平府	0	2	0	2
	總計	15	49	19	83

由上可見，從清代的不同時期來看，若以人數為多寡為序，中期是清代私家藏書風氣最為鼎盛的時期。再從地域來看，則以江蘇省的蘇州府、揚州府和浙江省的杭州府、嘉興府，以及安徽省的徽州府等地區的藏書家數量最多，³⁶由於這些地區歷來就是天下經濟、交通、人才與文化之總匯，各方面皆引領全國風氣之先，以故影響所及，各省藏書名家一時輩出，造成清代私人藏書事業的空前鼎盛。



二、清代北京的私家藏書

清代的北京稱為「京師」，與天津同屬直隸省。有清一代，各朝均注重顯示學術文化的繁榮，其中編纂各種大型圖書，就成了重要的手段。例如：康熙朝編纂《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等，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清朝通典》、《清朝通志》等叢書。這些御纂典籍既招示著清代學術文化的繁榮，也為私家藏書事業的發展，提供自上而下的動力。另外，由於唐代發明的雕板印刷術，不久便傳到了北京地區（唐代稱為范陽），使得這裡很快就成為北方的刻書中心，歷唐朝至清代，官刻、坊刻事業不斷地在北京聚集與茁壯，使得書肆遍布北京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民

³⁶ 王桂平，《清代江南藏書家刻書研究》，頁2。

國年間，他們有的既刻書（生產）又販書（銷售），為京師的私家藏書事業，提供了大量的典籍來源。³⁷

表 2 清代私家藏書樓在京杭大運河流經各省境內的分布統計表。³⁸

省份	省屬各府藏書樓的數目						
直隸	順天府 (11)	天津府 (5)					
山東	濟南府 (2)	東昌府 (1)	貴州府 (2)	兗州府 (1)			
江蘇	淮安撫 (1)	揚州府 (3)	江寧府 (7)	常州府 (5)	蘇州府 (19)	太倉府 (3)	松江府 (1)
浙江	嘉興府 (9)	湖州府 (2)	杭州府 (16)	紹興府 (4)	寧波府 (2)	金華府 (1)	台州府 (1)

從上表可知，若以地域上來看，清代直隸境內有 16 個私家藏書樓，分布在京杭運河流域的順天府和天津府。在京航運河沿岸私家藏書流通與傳遞的過程中，有眾多沿岸的藏書家積極參與，他們利用京杭運河便利的水運交通，跨州越省，流通古代圖書，竭盡所能地進行古代文獻的傳承工作。³⁹

³⁷ 劉大軍、喻爽爽、李雲，《中國私家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1 版），頁 145-146。

³⁸ 韓梅花，〈清代京杭運河沿岸私家藏書的流傳與傳承〉（《文獻研究》，2013 年第 5 期），頁 94。

³⁹ 韓梅花，〈清代京杭運河沿岸私家藏書的流傳與傳承〉，頁 94。

第三節 翁方綱的生平與藝文成就

翁方綱，字正三，號潭溪，又號蘇齋，順天府大興縣人。生於清雍正 11 年(1733) 8 月 16 日戌時，卒於嘉慶 23 年(1818) 正月 27 日丑時，享壽 86 歲。畢生官處清要，權衡文柄；又喜獎掖後進，輔弼風教，關心士習，學政相成。其傳略、年譜資料甚詳，有沈津撰寫的《翁方綱年譜》、陳純適所撰《翁方綱年譜》，以及李豐楙撰《翁方綱及其詩論》與附錄等。此外，還有翁方綱自撰之《家事略記》，至今流傳。⁴⁰



一、仕宦經歷

乾隆 19 年(1754) 當年翁方綱 22 歲時，因翻譯陶潛(365-427)的〈桃花源詩〉，乾隆帝閱翁氏卷而嘆曰：「牙拉賽音！」(意即漢語甚好)並以「俎豆」一聯，獲御定第一等第一名，授職編修，校繕官書。⁴¹在此之後的 10 年間，翁方綱歷任春坊右中允、左春坊左中允(同時仍然兼編修)、翰林院侍讀，又曾兼充過日講起居注官與《續文獻通考》纂修官。

乾隆 29 年(1764)，翁方綱被任命為廣東學政，這一去任職就是連任 3 屆長達 8 年之久，這是有清一代外放任職時間最長的京官之一。乾隆 36 年(1771)，翁方綱因為「以失察生員年貌冊」⁴²的原因，而被降職三級，並在同年的冬回京。

⁴⁰ 孫守真，《翁方綱及其文獻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年 2 月)，頁 87。

⁴¹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乾嘉名儒年譜》8(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 7 月第 1 版)，頁 21 上-21 下。

⁴²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 34 下。

翁方綱 41 歲（乾隆 38 年，1773）時，因留心典籍，見聞愈廣，充補《四庫全書》纂修官，入翰林院修書。同年，復授為翰林院編修。44 歲（乾隆 41 年，1776），以原銜充文淵閣校理，又充武英殿繕寫《四庫全書》分校官。時翁氏除承修《四庫全書》外，又承修《明紀綱目》、《音韻述微》、《續通志》，在「四庫全書館」內，專治金石、篆隸、音韻諸書。⁴³從翁方綱被任命為《四庫全書》修纂官開始，透過在編書過程中與行家們「時相過從討論，前後約將十年」⁴⁴的這段期間，不論是為翁方綱的藏書事業或是在此之後翁方綱自撰的《兩漢金石記》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至乾隆 50 年（1785）的期間翁方綱又曾歷任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並且曾兼充文淵閣校理、三通館纂修官、文淵閣直閣事等職。乾隆 51 年，翁方綱被外放督江西學政，3 年後（乾隆 54 年，1789）奉命歸京城，並且被授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於乾隆 56 年（1791）外放督山東學政了 2 年後歸京仍回內閣供事。⁴⁵

嘉慶 4 年，當年翁方綱已經 67 歲，聖賜尚方珍物 13 種，左遷鴻臚卿。⁴⁶到了嘉慶 6 年（1801），翁方綱被嘉慶皇帝派往了昌平馬蘭峪守護裕陵。直到嘉慶 9 年（1804）奉「命以原品休致回籍」⁴⁷，才重返京城。嘉慶 19 年（1814），年事已高的翁方綱重預恩榮宴，被賜與二品卿銜，時年 82 歲。⁴⁸

二、藝文成就

⁴³ 陳連營，〈翁方綱及其經學思想〉（《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6 期），頁 9。

⁴⁴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 37 上-37 下。

⁴⁵ 段惠子，《翁方綱著作研究-以經學、金石學、書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年 4 月），頁 3-4。

⁴⁶ 張光賓，《中華書法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 4 月初版），頁 306。

⁴⁷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 55 上。

⁴⁸ 清·國史館，《清史列傳》（《清代傳記叢刊》104，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卷 68，〈儒林傳下·翁方綱〉，頁 39 下。

翁方綱為乾嘉著名學者，其著作必然會受到當時社會、學術氛圍的影響。在翁方綱的藝文成就上，不論是書學甚或是「肌理說」的提出，都對乾嘉時期的學術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一）、翁方綱的書法

翁方綱的書法不以一家名，論翁方綱的學者，有以「南帖」、「北碑」立論，而論「南帖」、「北碑」者，通常皆祖於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等二篇論文。⁴⁹翁方綱的楷書初學顏真卿（709-785），繼學虞世南（558-638）及歐陽詢（557-641），尤得力於歐陽詢的《化度寺碑》。隸書效法《史晨》、《韓勅》等諸碑；行書則出於米芾（1051-1107）、黃庭堅（1045-1105）之間，且最得王羲之（303-361）《蘭亭序》之神韻；而八分書，則是得古鐘鼎款識及漢碑之秘；晚年則以蘇軾、米芾之法行之。翁氏生平雙鉤摹勒舊帖數十本，而其所摹《蘭亭序》長卷，凡古今題識印記，悉行鉤摩，紙墨之色亦微妙微肖，故當時北方學書碑版者，莫不規之。⁵⁰

清代中晚期興起的碑學，實質上是對書法之「美」的新發現。隨著碑學觀念的深入，與碑學體系的確立，人們對於書法審美的原則和態度，發生了轉移。乾嘉時期，書法的主流依然是二王、唐宋以來的傳統，這個大傳統，被後人統稱為「帖學」，而被後人譽為清代四家的翁方綱、劉墉（1719-1805）、成親王（1752-1823）、鐵保（1752-1824），都是乾嘉時期「帖學」的卓越代表。⁵¹

⁴⁹ 孫守真，〈翁方綱書學思維探論－與阮元〈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等文作一較論〉（《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22期，2011年4月），頁116。

⁵⁰ 宋如珊，《翁方綱詩學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12月），頁7。

⁵¹ 吳高歌，〈翁方綱、鄭石如、阮元書學觀念的比較〉（《中國書法》，2015年第19期），頁130。

翁方綱嗜好金石學研究，尤其關注書體的流變、碑帖的優劣，皆與書法息息相關，故對其書學理論，影響甚大。在趙、董書風及法帖盛行的背景下，翁方綱力倡唐碑，尤其崇尚筆帶古法的歐陽詢楷書，改變了清初書壇一意追慕趙孟頫（1254-1322）、董其昌（1555-1636）的帖學風氣，開啟了乾、嘉崇唐學歐的風氣。在前人的基礎上，翁方綱反覆肯定並強調北碑之上承隸書、下啟唐楷的重要地位，無疑具有較大的進步意義。然而，由於受到經學及考據學的影響，在師法古人方面，翁方綱僅止於追求與古人為伍，卻對古人來歷一無所知，這是翁方綱書學思想的侷限，也是後人非議較多的地方。不過，翁方綱在當時因成就較高，交遊廣泛，影響也較大。總之，翁方綱是乾嘉時期，碑帖轉換中的典型人物。⁵²

（二）、肌理說

由於翁方綱一生非常喜好典籍文獻，故積極從事於研究經籍、從事考訂、探索金石、精通書畫、創作詞章，具備多方面的成就。翁方綱的詩法理論極為重視學古，這種情況除了與翁方綱重視詩歌內容實質的因素有關之外，也和翁方綱學習黃庭堅有著一定的關係。黃庭堅作為「江西詩派」的開山祖師，翁方綱不止一次表達了他對黃庭堅的崇敬之意。⁵³翁方綱的詩學著作有：《石洲詩話》八卷、《王文簡古詩平仄論》一卷、《七言詩三昧舉隅》一卷，以及在《復初齋文集》中「神韻」、「格調」、「詩法」諸論與多篇詩序、贈序等。⁵⁴尤其是「肌理說」的提出，更成為清代乾嘉時期最有影響的詩論。⁵⁵翁方綱的「肌理說」，雖然是屬於詩學方面的

⁵² 朱友舟，《翁方綱書學思想研究》（南京：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4月），頁40。

⁵³ 張偉，《翁方綱詩學思想探析》（江蘇：蘇州大學文藝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4月），頁13。

⁵⁴ 徐國能，〈翁方綱杜詩學探微〉（《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期，2006年7月），頁181。

⁵⁵ 楊淑玲，《翁方綱肌理說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7月），頁5。

問題，但是其思想的內在依據，以及問題處理的模式，皆與清廷當時的文化統治者，有著密切的關係。⁵⁶

自明初以降的百年當中，程朱理學長期停滯，甚少發展，最終越來越與社會現實脫節，變得缺乏活力。正是在這種前提之下，理學乃進行自我更新，促使陽明學說應運而起，不僅把理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更曾經一度風靡天下，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⁵⁷到了清初，承續晚明回升的崇宋思潮，學人們開始對明儒的空談心性、恥於事功的學風，進行許多深刻的反思與猛烈抨擊，他們以經世致用彼此號召，論詩，重學問，主議論，摒棄明人宗盛唐卻僅得其膚廓空乏、學晚唐卻僅得其纖細窄仄的風氣，把目光重新投向輩受攻擊的宋詩，從而形成了崇尚宋詩的一股熱潮。

58

康熙年間，王士禎（1634-1711）起而推崇唐詩，其「神韻說」獨霸書壇五十年之久。只是隨著乾嘉的樸學之風開始興盛，空靈清談的詩學，給人無所依傍之感，於是喚起新的詩學審美情趣與理論的建構風潮。翁方綱身處這樣的藝文環境，順應了這一時代的潮流，創造了膾炙人口的「肌理說」。⁵⁹所謂「肌理說」一詞，乃取自唐朝詩人杜甫（712-770）的古詩樂府〈麗人行〉中：⁶⁰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杜甫詩中的肌理，原指美人肌膚細膩，而翁方綱卻以此作為詩論的口號，並以此來評論作家。⁶¹其實，在翁方綱生存的時代裡，杜甫早已被尊為「詩聖」了。而在翁

⁵⁶ 吳淑慧，《清儒翁方綱及其《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6月），頁9。

⁵⁷ 黃立一，《翁方綱詩論與清中期詩學思潮轉向》（泉州：華僑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4月），頁31。

⁵⁸ 邱美瓊，〈由求同到證異：翁方綱對黃庭堅詩歌的接受〉（《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10期），頁122。

⁵⁹ 吳中勝，〈「肌理說」與翁方綱的詩學精神〉（《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頁181。

⁶⁰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臺北：國家圖書館，2011年3月第1版），卷1，〈杜甫一·麗人行〉，頁11上。

⁶¹ 王建生，〈「肌理說」的意義〉（《中國文化月刊》，第221期，1998年8月），頁46。

方綱看來，杜詩甚至更是與儒家經典並駕齊驅。⁶²「肌理說」，主要是基於對「神韻說」與「格調說」的反省，同時也透過指出「神韻說」與「格調說」之病。

所謂「神韻說」是指在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詩經」的風雅、楚辭的浪漫、建安詩歌的慷慨，在魏晉時期出現了謝靈運（385-433）清麗脫俗的山水詩和陶淵明（陶潛）清新自然的田園詩，從而開啟了山水田園詩歌的創作之門。「神韻」的審美風格則是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逐漸積澱而成的，進而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獨特的藝術品質，而其中則是體現了追求飄渺、自然、清遠、典雅的美學傾向。若是從中國藝術審美的實際來看，「神」是由傳統的要求文本中 生氣的注入。而「韻」則是藝術魅力核心的所在，是一種內在的性格和生命狀態。⁶³

而「格調說」則是明代李夢陽（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等為領袖，稱為前後七子的 14 人，他們標榜所謂的「復古」，並且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以及和沈德潛（1673-1769）所共同倡導的崇尚漢魏盛唐而排仰宋詩的詩論主張。⁶⁴「格調說」的實質是以魏漢盛唐詩為典則，建立了重抒情審美的詩學理念。此種理念以知性型態介入創作，但是卻又恰巧違背了詩歌所強調的抒情審美的精神。⁶⁵

翁方綱的「肌理說」開闢出新空間，並試圖提出相應於時代的解決之道。翁方綱對古典詩學中「理」字的考察有二：一是「詩不設理路」說，此以嚴羽（1191-1241）、王士禎為代表；二是「以理路為詩」說，此以陳獻章（1428-1500）、莊昶（1437-1499）為代表。但是翁方綱卻認為這兩種主張，皆是過與不及。⁶⁶

⁶² 張然，〈學人之詩與肌理說辨析〉（《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2 期），頁 29。

⁶³ 金景芝、盧萌，〈「神韻說」的淵源〉（《集寧師專學報》，2010 年第 2 期），頁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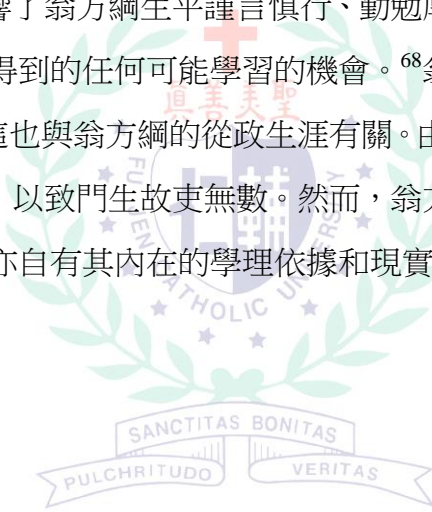
⁶⁴ 孫學堂，〈對「格調說」及幾個相近概念的省察〉（《求是學刊》2004 年第 3 期），頁 95。

⁶⁵ 陽曉，〈沈德潛格調說研究評述〉（《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6 期），頁 46。

⁶⁶ 蔡志超，〈翁方綱肌理說及其杜詩論述〉（《慈濟技術學院學報》，第 14 期，2009 年 11 月），頁 280。

「肌理說」也代表著清代一大批樸學大師的心聲。他們治學有方，覓詩無途，但是卻又忍不住秉筆作詩，於是滿腹的考據學問，充斥於筆鋒之下。對他們來說，這本來應該是其書齋生活的真實反映，又可稍解埋首學術的平淡與單調。「肌理說」亦為眾多詩才平平者指出一條學詩的新途徑。正因為如此，「肌理說」擁有一些具備中等資質的追隨者，企圖通過肌理對詩法的講求，進而成為詩人。⁶⁷

家世與生平直接影響了翁方綱的詩歌創作，不管是其詩歌作品，還是詩學觀念，都顯現出這樣的烙印。祖母、外祖父、父親等人的性格和人生觀，以及清貧飄泊的家庭環境，不但直接影響了翁方綱生平謹言慎行、勤勉厚忠個性之形成，而且使他更為珍惜在這種環境中得到的任何可能學習的機會。⁶⁸翁方綱的「肌理說」，在當時產生的影響很大，而這也與翁方綱的從政生涯有關。由於翁方綱幾十年來的宦海揚升，再加上位極人臣，以致門生故吏無數。然而，翁方綱的「肌理說」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大詩學流派，亦自有其內在的學理依據和現實的基礎。⁶⁹



⁶⁷ 楊小華，《翁方綱詩學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5月），頁75。

⁶⁸ 鄭才林，《翁方綱詩歌創作及其詩學思想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5月），頁5。

⁶⁹ 吳中勝，〈「肌理說」與翁方綱的詩學精神〉，頁18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作為一個歷史與圖書文獻方面的課題，本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縝密的檢索歷史資源及其相關研究的各種成果，因此，文獻的蒐集與分析，是本研究的重心所在。為此，本研究主要是採用一般歷史研究法，透過圖書資訊學、歷史學與版本目錄學的視角來進行探討，藉由史料的蒐集舉證，再利用歸納法推衍出合理的解釋與結論。必要的話，也將採用社群分析軟體等數位人文的方式，來解決部分的問題。相關細節說明如下。



一、 文獻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在資料的參考上，史料方面，將以翁方綱豐富的著述，例如：書籍、稿本、鈔本、手書題記、題跋、尺牘，以及清人著作、筆記小說，或是與翁方綱具有社會關係者（例如：血緣、姻親、師承、友朋等）之著作，還有清代書目題跋與藏書專著等文獻為主。而在近人的研究成果上，舉凡有關清朝中葉當時的私人藏書活動、以及與翁方綱藏書活動有關之親師友的藏書事蹟等近人研究成果，筆者皆加以蒐集閱讀，作為本文主旨和概念的啟發，以及行文的參考依據。

二、 文獻分析及歸納整理

本研究需要接觸與蒐集大量的文獻史料，因此，必須計畫合適的整理與歸納方法。本研究收錄的史料，將以清代中期的藏書家為重點，首先必須整理出清朝中葉時期順天府當時藏書的風氣與方法，剖析翁方綱所生活的年代、活動地區，以瞭解時空背景對翁方綱藏書事業的影響，然後掌握翁方綱個人藏書活動的相關著作，以及交遊情形等資料，依照其內容與性質，予以分析、整理與解釋。尤其是翁方綱的交遊社群關係，可以幫助了解翁方綱的藏書興趣、方向與藏書生活內容特色等面向，還能析論出他們的集團性與社群類型。經過適當的整理與歸納之後，便可從資料中彙整出翁方綱的藏書事蹟，進而了解翁方綱的藏書事業對當時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甚至得以略窺清朝中葉時期北京的藏書文化。透過系統性的資料歸納與分析，必將有助於史料的整理與結論之導出，是不可忽視的環節之一。

誠如前文所述，目前有關翁方綱之藏書事業至今尚乏人探索。因此，本研究將以翁方綱所留存之文集、詩集、題跋、序文、筆記、手書題記、尺牘，以及清代文集、筆記小說、藏書專著與專論等史料中，去進一步深入了解翁方綱藏書事業的真實樣貌。由於翁方綱藏書事業的相關史料十分匱乏，為免有所遺漏，筆者擬採取地毯式的蒐集方式，逐字閱讀相關史料，仔細地查檢翁方綱藏書事蹟的種種相關紀錄。古代的歷史研究較之於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往往無法取得實際的調查數據，僅可由零碎的文獻紀錄當中去爬梳整理。因此，更加需要研究者細心的從眾多資料當中，仔細地去尋找出與主題相關的線索。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歷史研究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一般歷史研究法，首先藉由史料的蒐集並加以整理篩濾，接著取其詳實可用者，作為歷史解釋的旁證基礎，最後再利用歸納法，推出或衍生合理的解釋與結論。而觀察、研究的方法，便是分析與詮釋。分析詮釋的方法，並非唯一，可能不是最佳研究文化的方法，但卻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方式。其邏輯之自律，方法之嚴縝，並不逮於自然科學，且不以預測、控制對象為目的。所以，必要時本研究也將搭配使用一些量化或統計的數據，即盡可能地從史料當中，將翁方綱的藏書事跡一一查出，作為量化的基礎，雖可能掛一漏萬，但仍是依照抽樣調查的原則，對於翁方綱的私人藏書事業，以及清代的社會文化現象，做一些深入性地觀察、分析、行為推衍與結論。最後，再以這些方式得出的結果，作為本研究解釋歷史現象的依據。⁷⁰

二、 文獻分析法

即透過針對相關文獻的蒐集、整理、分析與判讀，來提取所需的一種方法，並且對與題旨相關的現有研究成果，作出客觀而有系統地描述與討論。文獻分析法在研究方法上，是一種注重客觀、系統及量化的方式，且在範圍上，不僅是分析文獻的內容，還必須進一步地分析整個文獻的學術傳播過程。而在價值上，文獻分析法也不只是針對文獻內容作敘述性的解說而已，還必須推論文獻內容對整體學術傳

⁷⁰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8月初版），頁8。

播過程所發生的影響。從中國古代典籍的產生開始，一直到清代私家藏書的盛行，舉凡與書籍典藏相關的概念、成因、背景，或是諸如藏書管理與流通等專業活動，皆在本文探討的範圍之內。最後，對論文相關資料進行彙整與爬梳，並針對翁方綱私人藏書事蹟的內容、貢獻與影響，提出系統性的論述。⁷¹

三、 數位人文法

世界各國的人文學界，都已紛紛開始關心以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方法套用到歷史研究上面，來解決一些人力難以解決的複雜問題。⁷²目前國內以群體傳記學為基礎，搭配數位人文的研究方法，利用社群軟體進行古代文士社會關係的集團性分析，其中最為知名者就是「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⁷³

而本文即嘗試以「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的作法，透過資訊科技，選擇適當的社群分析軟體 UCINE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Network），作為輔助研究的工具。透過該軟體內建之繪圖程式，將翁方綱社群資料輸入，進而描繪出翁方綱社群關係圖，希望藉由現代的科技，來顯現「資訊視覺化」的成果，並使讀者能夠更加方便了解其內涵。至於在運作與處理方面，首先必須透過蒐集、過濾、整理與輸入大量的史料紀錄到 UCINET，經過資訊系統的自動分析、比對與交叉綜整，便可描繪出翁方綱藏書集團各種社群關係網絡模組圖示。

⁷¹ 黃敬程，《明代北京私人藏書研究》（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6月），頁40。

⁷² 金把路，〈韓國數位人文教育現狀與課題〉（《漢學研究通訊》，第35卷第1期，2016年2月），頁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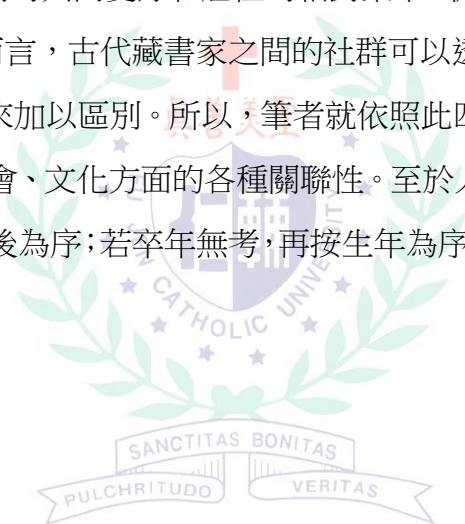
⁷³ 哈佛大學，「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檢索於2019年5月14日，<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bdb>。



第四章 翁方綱社群關係的解析

第一節 親族關係

文獻是伴隨著文化的創造而產生，藏書即成為一個時代，一個地域的重要文化體現。藏書事業的日漸發達，與當時的藏書風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藏書家之間的社群。藏書家們的共同愛好和居住的相對集中，促使藏書家們喜歡彼此往來，甚至結社。⁷⁴一般而言，古代藏書家之間的社群可以透過血親、姻親、師承與友朋等四種社會關係，來加以區別。所以，筆者就依照此四種關係，來探究翁氏藏書與區域藏書社群之社會、文化方面的各種關聯性。至於人物的排列順序，原則上是依照藏書家的卒年先後為序；若卒年無考，再按生年為序。若生卒年皆不可考者，則置於最末。



一、家族關係

(1) 翁麐標 (1656-1708)

翁方綱的祖父諱麐標，字孝定。康熙 36 年（1697），隨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奉命隨駕運糧至 13 臺，軍功加 2 級。據《翁氏家事略紀》記載，翁方綱曾經說過：「先祖生平交契有手記之牘，并所藏書皆在樓上，不知何時被人遺失，以故先祖卒後，不知交契何人。」⁷⁵可見翁氏藏書，實際上是肇始自翁麐標。後來，翁

⁷⁴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2003 年第 4 期），頁 20；23。

⁷⁵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 8 上。

慶標徙官齊東 13 年，卒於任，享年 53 歲。翁方綱九歲開始習讀五經與詩文，其父祖甚為重視讀書，皆強調翁家世代門第書香，當以讀書尚學為家風庭訓。其父常語之曰：「吾家書香，需有人繼，且望汝一進庠門耳！」⁷⁶其父臨終時，仍對翁方綱再三勉勵教誨，望其好好讀書，可見翁父對翁方綱期許之深。因此，翁方綱一生致力於科舉功名，應與讀書家風有關。⁷⁷

二、姻親關係

(1) 朱筠 (1729-1781)

朱筠，字美叔，號竹均、竹君、笥河。翁方綱與朱筠兩人為親家關係，乾隆 43 年 (1778)，翁方綱長男翁樹端 (1697-1764) 聘娶朱筠之女為妻。⁷⁸兩家本來就在同縣，加上結為親家，使得互動往來變得更加密切，所以兩人之間，時常會有過從往來及詩文唱和。

由於翁、朱兩家本來都是是當地知名的藏書大家，故早在翁方綱兒子娶朱筠之女之前，兩人間就經常互有書事交流。例如乾隆 40 年 (1775) 正月，翁方綱向彭冠借他所藏的《玉延亭卷》來研究，當時朱筠奉命纂修《日下舊聞考》，翁方綱便藉著這個機會，讓朱筠將《玉延亭卷》抄入《日下舊聞考》中。之後，又因為翁方綱的客人拜訪翁方綱時帶來宋拓《孟法師碑》一本，翁方綱在見到此書之後，立刻想起朱筠家的藏書中有一抄本，於是馬上向朱筠借來進行讐校，⁷⁹足見

⁷⁶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 10 月初版），卷 6，〈先大夫文藁冊尾記〉，頁 16 上。

⁷⁷ 吳淑慧，《清儒翁方綱及其《易》學研究》，頁 8。

⁷⁸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14，〈戊戌八月十三日為大兒聘朱氏女婚啟〉，頁 19 下-20 上。

⁷⁹ 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8 月初版），頁 78。

兩家藏書交流之密切。此外，朱筠亦曾在家中向翁方綱出示自家珍藏的一部孤本，即宋刻本《漢隸字源》。此書在乾嘉以前，僅有毛氏宋刻本傳世，無從校對。因此，當朱筠向翁方綱出示此書之時，便引起了翁方綱很大的興趣，於是翁方綱就向朱筠借出並且與自己所藏的《隸變》等書做了校對，也為此書題了許多跋語，而這就是被後世奉為《漢隸字源》最佳版本的翁方綱校本。⁸⁰

從以上翁方綱和朱筠之間的校書等活動中，可以看出他們兩人之間的好交情，也正因為如此，乾隆 46 年（1781），當翁方綱聽聞朱筠的死訊後便道：「嗚呼！先生之文，或信或疑，此中真實，惟我知之。」⁸¹對於朱筠的死，翁方綱悲痛萬分，甚至作〈哭竹君五首〉來紀念好友的離去。⁸²關於翁方綱親族關係之社會網絡關係圖，請參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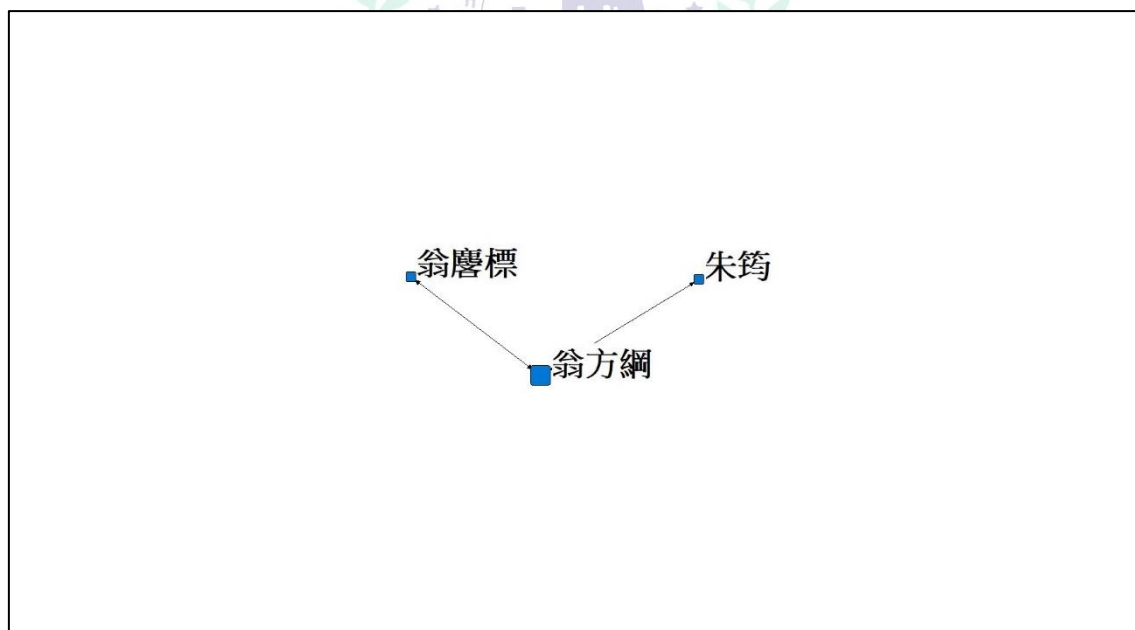


圖 1 翁方綱之親族關係社會網絡關係圖

⁸⁰ 楊吉源，《朱筠河研究－以樸學論題為中心》（新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1 月），頁 44。

⁸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14，〈祭朱竹君文〉，頁 17 上。

⁸²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54-14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清刻本影印），卷 24，〈哭竹君五首〉，頁 5-6。

第二節 師承關係

《禮記·學記》載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⁸³益友不僅可助學，並可輔仁。翁方綱是清代乾嘉時期以宏獎風流、提拔後學為己任的重要學者。⁸⁴翁方綱與他的交遊們關係匪淺，無論在品性或學識上，都深受這些交遊們的影響。翁方綱頗能兼收各家之長，融通並蓄，以成就自己獨特的品格與學養。翁方綱生當乾嘉盛世，居處京華勝地，又貴為顯宦，職司文柄，以是交遊廣闊，上自公卿，下至布衣，多達三百餘人。⁸⁵茲僅就當時與翁方綱具有師承關係之藏書家，舉其要者，分別縷述如下：



(1) 黃叔琳 (1672-1738)

黃叔琳，字崑圃，順天府大興縣人。康熙 30 年（1692），賜進士第三人，官至吏部侍郎。翁方綱幼年遊同里黃叔琳之門，從之為學，翁方綱說：

何公問字日，……爾日《漁洋集》，何黃香瓣同。吾父並遊從，二老對榻時，儻得深折衷。萬卷樓舊篋，我窺自孩童。⁸⁶

年幼的翁方綱看見黃叔琳藏書樓內有許多藏書感到非常驚訝。

⁸³ 王文錦，《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9 月第 1 版），頁 518。

⁸⁴ 張朵聰，《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研究》（河南：河南大學美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5 月），頁 6。

⁸⁵ 趙太順，《翁方綱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6 月），頁 32。

⁸⁶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67，〈書何端簡公然燈紀聞後二首〉，頁 15 上。

(2) 謝啟昆 (1737-1802)

謝啟昆，字蘊山，一字良璧，號蘇潭。「自少博聞強識，本以文字學名，迨出翁覃溪（翁方綱）門，益專力經、史、金石諸學。……後著《小學攷》五十卷，補朱氏《經義考》所未備；《粵西金石志》十五卷，與覃溪《粵東金石志》並行。」⁸⁷謝啟昆師從於翁方綱之門，學習經、史、金石、詩學，一生著述豐富，其《粵西金石志》，更是與翁方綱的《粵東金石志》相輔相成。翁方綱非常喜愛謝啟昆這位弟子，嘗稱云：「予與蘊山（謝啟昆）相劇切為詩者十有二年，乃蘊山出守，予以其宜勤職務也，又相誡不為詩者十年。今則舊學之懷，復積成卷軸者，又十有二年矣。」⁸⁸翁方綱與謝啟昆之間互相論詩，長達了數十年的時間，除此之外，謝啟昆也喜歡藏書，與翁方綱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翁方綱回憶這段師徒關係，更是讚道：「吾與西江諸友論詩，前則謝子蘊山，今則吳子蘭雪（吳嵩梁，1766-1834），最其秀也。」⁸⁹可見對於翁方綱來說，謝啟昆可以說是他的得意門生之一。



(3) 凌廷堪 (1757-1809)

凌廷堪，字次仲，號仲子先生。「生有異稟，觀書十行俱下。……遊翁閣學覃溪（翁方綱）門，乃究心經史，冀為其鄉先輩江（江永，1681-1762）、戴（戴震，1724-1777）之學。」⁹⁰凌廷堪從小天資聰穎，拜師於翁方綱門下，發憤讀書，畢生致力於經學。拜師期間，與當時翁方綱的許多朋友也有交遊，如藏書家錢大昕（1728-1804）便是其一，錢大昕嘗謂：「大昕謹啓次仲先生（凌廷堪）講席，聞大名十有

⁸⁷ 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清代傳記叢刊》12，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卷14·作史學家列傳，〈謝啟昆〉，頁385-386。

⁸⁸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4，〈謝蘊山詩序〉，頁8上。

⁸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4，〈廬山紀游圖序〉，頁24上。

⁹⁰ 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6·皖派經學家列傳，〈凌廷堪〉，頁160。

四五年矣。……賜讀各體文十首，精深雅健，無體不工，儒林文苑，兼於一身。當吾世而遇必傳之詣，何快如之！」⁹¹可見錢大昕早已久仰凌廷堪文學大名，見其創作，更是欽佩不已。

藏書家盧文弨也曾稱讚凌廷堪的為人，曰：「吾嘗求友於四方，聞英奇卓犖之士，每願納交，而賴眾君子亦不棄余，各以其所充實流露者資益余，余獲其灌輸浸潤之力，知解因得以稍擴充焉。」⁹²凌廷堪本身十分認真求學，且對於結交問學之友更顯熱衷，總是以自己的學術專業，默默支持著朋友，可見其對於文友的重視。除此之外，凌廷堪也會與人討論校書之事，他自稱：

毛氏汲古閣本諸經皆有脫誤，惟《儀禮》為最多。……丁未（乾隆 52 年，1787）夏，客南昌，從謝蘊山（謝啟昆）太守家假得正德本，復取楊氏《儀禮圖》欽定本、永懷堂本、張氏本、戴氏本，詳加較對鄭注一過。⁹³

由於發現毛氏「汲古閣」典藏圖書當中，《儀禮》（如圖 2）有較多的錯誤，為了訂正汲古閣本的錯誤，乾隆 52 年，凌廷堪先前往南昌謝蘊山家借得正德刊本後，又陸續採用自家所藏諸版本來進行校對。由上可知，凌廷堪不僅於經學上頗有成就之外，也很喜愛校書，透過與朋友之間的書事交流，相互勉勵與學習。

⁹¹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2 月第 1 版），序，〈錢辛楣先生書〉，頁 4。

⁹²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校禮堂初稿序〉，頁 1。

⁹³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 30，〈書校正汲古閣本禮儀注疏後〉，頁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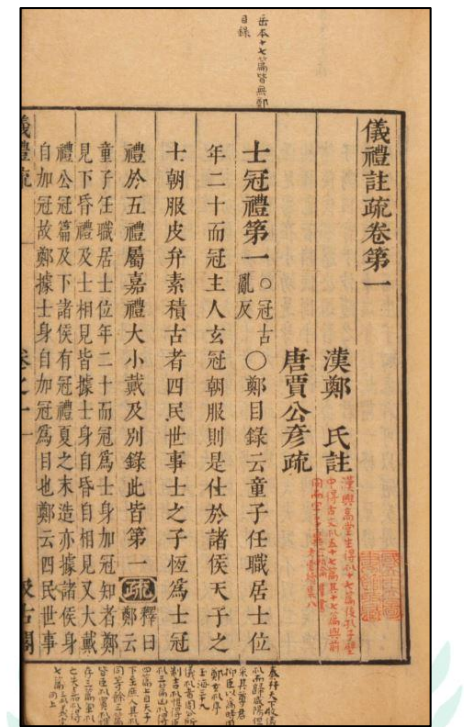


圖 2 清·鄭玄，《儀禮註疏》。⁹⁴

(4) 法式善 (1753-1813)

法式善，字開文，號時帆，又號梧門，蒙古族。性好文，以宏獎風流為己任。」⁹⁵法式善與翁方綱有著非常長且深厚的交情，據翁方綱自述：

《陶廬雜錄》六卷，法式善梧門撰，梧門姓孟氏，內府包衣蒙古世家，原名運昌，以與關帝號音相近，詔改法式善；法者，國語奮勉也，其承恩期許如此。自幼時，穎異嗜學，尊人秀峰（法式善之父，廣順）孝廉，受業於予，故梧門得稱門人。刻意為詩，又博稽掌故。其於詩也，多蓄古今人集，閱覽強記，而專為陶韋體，故以「詩龕」題其書室，又以「陶廬」自號。其於典

⁹⁴ 清·鄭玄，《儀禮註疏》，「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檢索於 2019 年 5 月 14 日，<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4e/1b.html>

⁹⁵ 清·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12 月第 1 版），卷 485·列傳 272，〈文苑二〉，頁 13402。

義、卷軸，每有所見，必著於錄，手不工書，而記錄之富，什倍於人，即此卷可見其大凡矣。與予論詩年最久，英特之思，超悟之味，有過於謝蘊山（謝啟昆）、馮魚山（馮敏昌，1747-1806）；而功力之深造，尚在謝、馮二子下。⁹⁶

法式善原名為運昌，直到乾隆 50 年，皇帝才下詔將其名字改為「法式善」，在滿語中為「勤勉」的意思。由於法式善的父親廣順為翁方綱的門下弟子，故翁方綱也承認法式善與他的師承關係。同時法式善的勤於著述與撰寫，也受到翁方綱的高度讚許。在詩賦方面，翁方綱則認為法式善的天賦超過他的兩位得意門生謝啟昆與馮昌敏，給予極高的評價，但是在功力和技巧上，則不如謝、馮兩人。

(5) 李宗瀚（1770-1832）

李宗瀚，字公博，號春湖，又號北溟。李宗瀚喜愛聚書，其好友鄧顯赫稱：「公無他嗜好，獨喜聚書，癖嗜金石文字，所藏多名拓，築『湖東樓』度之。」⁹⁷李宗瀚除了是一位藏書家之外，亦是書法家，「工書，受撥鐙法於翁方綱，與郭尚先（1785-1832）、何凌漢（1772-1840）、顧蕓（1765-1832）齊名。」⁹⁸李宗瀚的書法習於翁方綱，名師出高徒，與當時的許多書法家齊名，時人李聯琇（1820-1878）甚至讚其「書法在本朝，論者謂繼張照（1691-1745）、王澐（1668-1743）而三。少時澤筆趙（趙孟頫）、董（董其昌），秀韻天成；繼恐為其所囿，念善書先在捉筆得法，因問古法於大興翁方綱，乃改從廢鐙式。……案春湖（李宗瀚）筆法受自覃溪。」⁹⁹翁方綱不僅傳授李宗瀚書法方面的知識而已，他喜愛藏書、好交遊的個性，必定也或多或少的影響著李宗瀚。

⁹⁶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3，〈陶廬雜錄序〉，頁 16 上-下。

⁹⁷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147，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卷 109，鄧顯鶴〈卿貳六十九·李宗瀚行狀〉，頁 10 下。

⁹⁸ 清·李放纂輯，《皇清書史》（《清代傳記叢刊》84，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卷 23，〈李宗瀚〉，頁 19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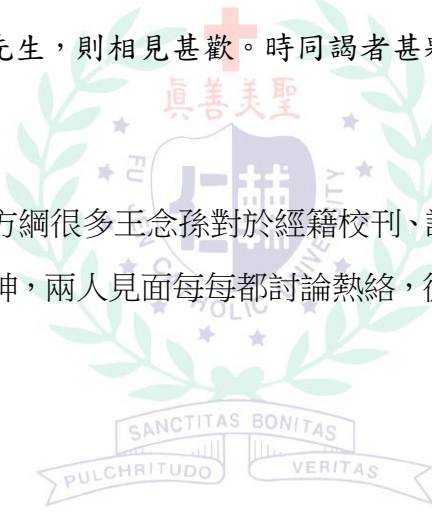
⁹⁹ 清·李放纂輯，《皇清書史》，卷 23，〈李宗瀚〉，頁 19 上-下。

(6) 王引之 (1766-1834)

王引之，字伯申，號曼卿。王引之出身學術世家，自幼苦學一如其父王念孫 (1744-1832)，並且從學於翁方綱。王引之嘗自述云：

昔余隨侍家大人於京邸，下帷之餘，謹錄所說《尚書詁訓》諸條，求教於蘇齋先生 (翁方綱)，先生覽而善之。及受知於文遠皋夫子，夫子，先生之門人也，循例往謁先生，則相見甚歡。時同謁者甚夥，先生獨與余論學，亶亶不倦。¹⁰⁰

王引之時常會去請教翁方綱很多王念孫對於經籍校刊、訓詁的意見，而翁方綱也非常喜愛王引之的求學精神，兩人見面每每都討論熱絡，從此以後，王引之便也以治名物、訓詁著稱於世。



(7) 李彥章 (1794-1836)

李彥章，字澤文、蘭卿，號榕園。其友湯鵬 (1801-1844) 敘之曰：「君由中書值樞垣，出守江右，觀督江左，都轉齊魯。政暇肆學，工詩善書，精鑑藏。」¹⁰¹ 李彥章曾經拜師於翁方綱門下，好友梁章鉅 (1775-1849) 嘗紀其事云：「同劉芙初 (劉嗣綰，1762-1821)、吳蘭雪 (吳嵩梁)、陳石士 (陳用光)、李蘭卿 (李彥章) 謁翁覃溪師，為「蘇齋」詩。」¹⁰² 由此可知，當時除了李彥章拜翁方綱為師外，其實還有梁章鉅等人，也一同前去拜謁翁方綱。翁方綱曾經稱讚李彥章的好學，曰：

¹⁰⁰ 清·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民國 14 年羅氏鉛印高郵王氏遺書本影印)，卷 3，〈翁覃溪閣學手札跋〉，頁 19 下-20 上。

¹⁰¹ 清·陶湘，《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清代傳記叢刊》32，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卷 8，〈李彥章〉，頁 7 上-下。

¹⁰²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乾嘉名儒年譜》13，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 7 月第 1 版)，頁 7 上-下。

「蘭卿來吾齋雖晚，而天才英特，嗜學好古，卓然必成，吾實不能以丹壑限量之。」

¹⁰³可見較諸其他來學者，李彥章等人雖然較晚來拜師，但是翁方綱很快便看出李彥章的才能，而後來李彥章也證明翁方綱並沒有看錯人，在詩詞的表現上，有著一番傲人成就。此外，翁方綱的《復初齋文集》，也是由李彥章所校刊，可見兩人之間的師徒之情，確實非常深厚。

(8) 梁章鉅 (1775-1849)

梁章鉅，字閔中，又字茝林，號茝鄰，晚號退庵，為清朝中葉著名的書法家、收藏家。梁章鉅處在清代金石學興盛，硬派書法日漸發展的乾隆、嘉慶、道光時期。嘉慶 20 年 (1815)，當時梁章鉅在北京任職，曾經拜訪過翁方綱，並且成為翁方綱的入室弟子。梁章鉅曾與翁方綱一同遊崇效寺，嘗謂：「崇效寺西來閣前丁香一樹，相傳為漁洋 (王士禎)、竹垞 (朱彝尊，1629-1709) 手植。四月十三日，侍覃溪師往觀，寺僧磨石乞勒記，因同作詩。」¹⁰⁴梁章鉅學習翁方綱作詩的技巧，兩人時常會一起出遊、賦詩，直至嘉慶 23 年翁方綱去世。在這 3 年當中，梁章鉅在文學、詩詞與金石書法方面，都從老師翁方綱處受益良多。關於翁方綱師承關係之社會網絡關係圖，請參見圖 3。

¹⁰³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4，〈薇垣歸娶圖詩序〉，頁 26 下。

¹⁰⁴ 清·梁章鉅，《退菴詩存》(《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道光刻本影印)，卷 7，〈展上己日邀雲芬子彥同觀宋四家天冠山詩畫合卷留飲小齋疊前韻〉，頁 17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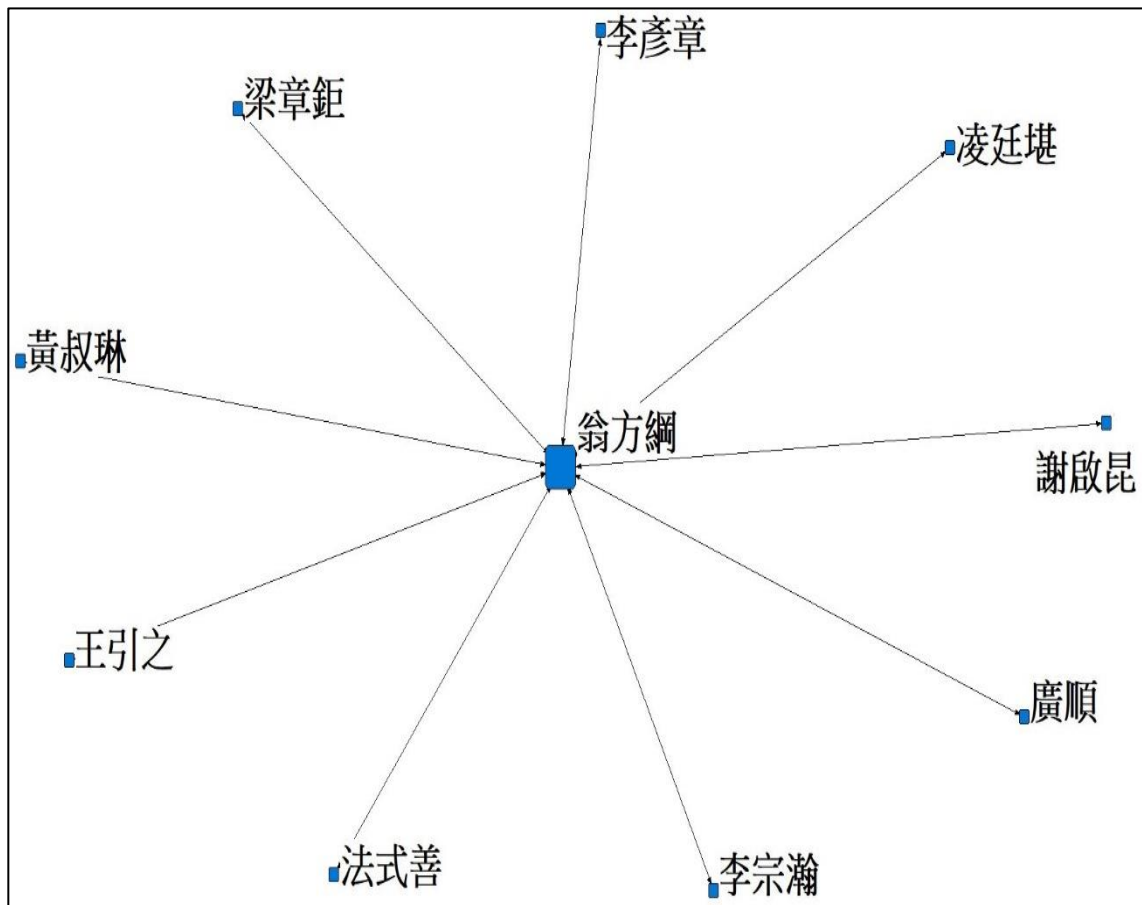


圖 3 翁方綱之師承關係藏書社群網絡圖



第三節 友朋關係

(1) 何焯 (1661-1722)

何焯，字屺瞻，號茶仙，「藏書數萬卷，得宋、元舊槧，必手加讐校，粲然盈帙。」¹⁰⁵何焯不僅喜愛藏書之外，他也熱愛校書，其校書之功力，輩受文人肯定，

¹⁰⁵ 清·趙爾巽，《清史稿》，卷 484·列傳 271，〈文苑一〉，頁 13368。

錢大昕稱其「考證漢書最有功」。¹⁰⁶除此之外，好友翁方綱更是讚賞何焯的「書法精妙」，¹⁰⁷兩人時常互相討論學問。

(2) 孔繼涵 (1739-1783)

孔繼涵，字體生，號荭谷，別號南州，自號昌平山人。乾隆 36 年進士。孔繼涵博學多才，尤其精於校勘，是當時著名的校勘家、著作家，以及金石、考據學家、文物鑑賞家，一生交遊廣泛，與當時許多的文人雅士都有著交流往來。其中有幾位對於孔繼涵來說影響深遠，例如翁方綱，兩人之間都喜愛藏書、刻書，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關於兩人之間的書事交流，翁方綱嘗謂：

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算數之書無不博綜。官京師，與友朋講析疑義，考證異同，所鈔校數千百帙，集金石刻千餘種，考論其事與經史相比附。與東原（戴震）交二十年，名物象數，與共研說。東原歿，經紀其喪，刻其遺書，以仲子聘其女為婦。藏書十數萬卷，遇罕見者，校勘付錄，世傳《微波榭叢書》。¹⁰⁸

孔繼涵的嗜好十分廣泛，於各方面皆有所涉略，相關之書籍無不博覽。在京師時，與翁方綱等諸名流、學者，皆過從甚密，他們經常一起講析疑義、考證異同、互相切磋，使得彼此的知識更加廣博。他與戴震的交情更是維持長達 20 年之久，戴震死後，孔繼涵整理了他的遺著，並校勘、刻板、付印，使戴震的書得以流傳下來。其友藏書家法式善就曾經讚美孔繼涵曰：「誦孟太史（孔繼涵），博古好事，不愧孔氏家風，版刻極佳。」¹⁰⁹

¹⁰⁶ 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 71，〈文苑傳二·何焯〉，頁 27 下。

¹⁰⁷ 清·李放纂輯，《皇清書史》，卷 13，〈何焯〉，頁 6 上。

¹⁰⁸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卷 8，〈孔先生繼涵〉，頁 38 下。

¹⁰⁹ 清·法式善，《陶廬雜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 11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北京圖書館藏嘉慶 22 年（1817）陳預刻本影印），卷 4，頁 39 上。

(3) 程晉芳 (1718-1784)

程晉芳，字魚門，號戢園，「喜讀書，蓄書五萬卷。」¹¹⁰與翁方綱交情頗深，翁方綱嘗謂：「予與魚門交一十三年，而魚門假歸江南，思所以贈吾魚門者，當於同學之事言之。」¹¹¹由此便可看出兩人之間的深厚情誼。

(4) 嚴長明 (1731-1787)

嚴長明，字冬友，一字道甫，號用晦。「幼穎敏，十行竝讀。……築室數楹，顏曰：『歸求草堂』，藏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¹¹²嚴長明天生聰穎，喜愛讀書，喜好交友，與多位藏書家都有往來，其友王昶 (1724-1806) 嘗謂：

乾隆丁酉 (42 年，1777) 冬，予為通政司副使，職事清簡，暇輒與錢閣學
瑋石 (錢載，1708-1793)、朱竹君 (朱筠)、翁覃溪 (翁方綱)、陸耳山
(陸錫熊，1734-1792) 三學士、曹中允 (曹仁虎，1731-1787) 習庵、程編
修魚門 (程晉芳) 舉消寒文酒之會，會自七八人，至二十餘人，……歲率一
舉，都下指為盛事。¹¹³

嚴長明在京任官期間，只要一有空閒，便會與翁方綱等多位藏書家或是一些文人雅士一同飲酒，以酒相會，此唱彼酬，人數有時多達 20 餘人之多，可見其交遊也十分廣泛。嚴長明「在軍機七年，幹敏異眾，然亦以是見嫉。……後以憂歸，遂不復

¹¹⁰ 清·江藩，《漢學師承記》（《清代傳記叢刊》1，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卷7，〈程晉芳〉，頁4。

¹¹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15，〈同學二首贈魚門別〉，頁13上。

¹¹² 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列傳第十八，〈金石學家·嚴長明〉，頁484-485。

¹¹³ 清·嚴長明，《官閣消寒集》（《叢書集成續編》116，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7月臺1版），序，頁1上。

出。客畢沅（1730-1797）所，為定奏詞」，¹¹⁴暇時，兩人也經常吟詩唱和，極盡友朋之樂。

（5） 錢載（1708-1793）

錢載，字坤一，號籀石。雍正 10 年（1732）副榜，乾隆元年（1736）舉鴻博。錢載年長翁方綱 25 歲，二人是忘年之交。翁方綱十分重視兩人之間的情誼，曾說：「方綱與籀石相知在通籍之前，而譚藝之心，於同年中之最。」¹¹⁵翁方綱與錢載有 10 年論推藝文之交，可謂相知甚深。翁方綱與錢載相知於通籍之前，談藝交心，於同年中為最。

（6） 盧文弨（1717-1796）

盧文弨（1717-1795），字紹弓，號磯魚、檠齋，晚號弓父，顏其堂曰：「抱經」，以故人稱：「抱經先生」。¹¹⁶文弨生性嚴謹求實，「生平精於校讐，彙萃諸書校勘記，名曰：『羣書拾補』」。 ¹¹⁷他不僅博學好古，喜好收書，更嗜校勘，其好友錢大昕（1728-1804）曾說：

抱經先生精研經訓，自通籍以至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奉廩修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祕鈔精校之本，輒宛轉借錄。家藏圖書數萬卷，手自校勘，

¹¹⁴ 清·趙爾巽，《清史稿》，卷 485·列傳 272，〈文苑二〉，頁 13392-13393。

¹¹⁵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4，〈籀石齋詩鈔序〉，頁 18 上。

¹¹⁶ 清·丁申，《武林藏書錄》（《叢書集成續編》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7 月臺 1 版），卷下，〈抱經堂〉，頁 20 下。

¹¹⁷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清代詩文彙編》3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志銘〉，頁 2 上。

精審無誤，自宋次道(宋敏求，1019-1079)、劉原父諸公(劉敞，1019-1068)，皆莫能及也。¹¹⁸

他一生以校書為課，家藏數萬卷，上自經史，下逮詩文，無不丹黃甲乙。翁方綱對於盧文弨十分喜愛藏書、校書與刻書，且熱衷於經籍之學，曾經讚道：

公為人方嚴成篤，事親孝，與人忠，其殫竭心力為所難能者，筆不勝書。而方綱於其嗣君之請志墓，專詳於所訂諸書者，校讎經籍之功，近世儒林之所少也。¹¹⁹

兩人之間相與切磋，探討典籍，裨益良多，其歡聚之樂，多類如此。此外，翁方綱也非常敬重盧氏為學之精勤，以及為人之誠篤。

(7) 畢沅(1730-1797)

畢沅，字纒蘅，又字秋帆，號靈岩山人。畢沅自幼失怙，由母親張藻養育成人，張藻才情洋溢，馳名一時，畢沅深受母親的文化薰陶。乾隆 25 年(1760)，畢沅以一甲第一名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仕至河南等地巡撫。畢沅惜才若渴，獎掖後進唯恐不力，其好友王昶就曾經說道：

先生愛才如恐不及，當巡撫陝西、河南時，一時名宿，如：吳中書泰來(吳泰來)、嚴侍讀長明(嚴長明，1731-1787)、程編修晉芳(程晉芳)、邵學士晉涵(邵晉涵，1743-1796)、錢州判坵(錢坵，1744-1806)、洪編修

¹¹⁸ 清·丁申，《武林藏書錄》，卷下，〈抱經堂〉，頁 21 下。

¹¹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24，〈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抱經先生盧公墓誌銘〉，頁 2 上。

亮吉（洪亮吉，1746-1809）、孫觀察星衍（孫星衍，1753-1818）等，皆招致幕府。少嗜著述，至老不輟。¹²⁰

畢沅與王昶兩人同樣從師於沈德潛，兩人相識甚久，交情頗深。王昶除了讚譽畢沅交遊廣泛之外，對於從年輕時期便開始勤於著述的摯友畢沅，一直到老都沒有放棄，更加認為難能可貴。而畢沅與翁方綱之間，雖然在詩學上的觀念與翁方綱是不無分歧，但是仍舊在詩中提起翁方綱，雖然在觀念上有所不同，但是兩人之間還是維持著詩友的關係，互有聯絡與交流。¹²¹



(8) 錢大昕（1728-1804）

錢大昕，字曉征，又字及之，號辛楣，晚號竹汀居士，齋號「潛研堂」。「十五補諸生，有神童之目，初從長州沈德潛游，頗擅屬辭，為『吳中七子』之冠。」¹²²錢大昕從小天資聰穎，從師於沈德潛，在當時的「吳中七子」之中，更是被譽為最佳之人。一生勤勉治學，職志學術，博學多聞，交遊亦廣，不僅僅與姚鼐（1731-1815）互有書信往來，討論學問，¹²³與翁方綱更是交情深厚，翁方綱曾在〈書洪文敏瑞麻贊石本後〉中提道：

洪文敏（洪邁，1123-1202）知太平州，州民以瑞麻合穎為獻，文敏圖而贊之，其序云：「假守於此十閱月」，不著歲時，惟曰：「太歲在酉」，是淳熙十六年（1189）己酉也。予篋有洪文敏所勒蘇書，自跋在淳熙十六年，守當塗時所作，與此贊筆意正同。而錢竹汀（錢大昕）《潛研齋金石跋》亦據《宋

¹²⁰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卷9，〈畢先生沅〉，頁3下-4上。

¹²¹ 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嘉慶4年（1799）畢氏經順堂刻本影印），卷35，〈歸航詩次翁宮詹覃谿韻〉，頁3下-4上。

¹²² 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列傳第三，〈吳派經學大師·錢大昕〉，頁58。

¹²³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嘉慶11年（1806）刻本影印），卷35，〈與姚姬傳書〉，頁6下-8上。

中興學士院題名》云：「邁以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由翰林學士差知鎮江府，此贊作於己酉（淳熙 16 年，1189）八月，是移知太平，即在十五年之冬也。其明年改元紹熙，乃以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而《宋史》於翰林學士後即書進煥章閣學士，為疎漏矣，又誤以紹興為淳熙也。」竹汀所考，與予所見正同，但《宋史》本傳此下即接書明年上章告老，尋致仕卒，年八十，竟似文敏卒於淳熙改元之明年者，其誤尤甚。¹²⁴

翁方綱見到洪文敏所跋的時間點記為淳熙 16 年，但是他覺得這裡似乎有錯誤，於是根據友人錢大昕所撰的《潛研齋金石跋》，考出時間點應該為淳熙 15 年，並非淳熙 16 年，與翁方綱考證的結果相同。從以上可以得知，當翁方綱有疑惑之時，便會參考錢大昕的意見，在學識間交流往來。

除了與翁方綱交遊之外，錢大昕也與當時的許多文人都有交往，如：翁方綱的學生黃叔琳，與錢大昕也有過從的情形，錢大昕曾說：「猶憶壬申（乾隆 17 年，1752）歲入都，曾拜公於里第。公所以獎而期之者甚厚。及備官詞林，得執後進之禮。尚書官太常時，予在記注右史，恆以公事追隨。」¹²⁵黃叔琳生平以造就扶持人才為己任，令錢大昕非常推崇。同時，對於黃叔琳的文章，錢大昕也非常欽佩，他又稱讚曰：「公之文行，如元氣入肝脾，久而不忘也。」¹²⁶此外，錢大昕與盧文弨也有書事交流，潛大昕嘗有詩讚美盧文弨云：「抱經古君子，貌古如其心。通籍五十年，依然雜生吟。」¹²⁷盧文弨與錢大昕兩人，因為都有藏書、校書的共同的嗜好，所以兩人也常常互借所藏之書，討論學問。另一方面，藏書家畢沅也與錢大昕互有往來，錢大昕曾向畢沅借《續資治通鑑長篇》來讀，他說：「吳門畢氏（畢沅）『經訓堂』、袁氏（袁廷檣，1764-1810）『貞節堂』，皆有鈔本，予得假讀焉。」¹²⁸由於畢沅藏書亦富，故兩人得以常在學術上互相切磋。

¹²⁴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26，〈書洪文敏瑞麻贊石本後〉，頁 4 下-5 上。

¹²⁵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 26，〈黃崑圃先生文集序〉，頁 5 下。

¹²⁶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 26，〈黃崑圃先生文集序〉，頁 4 下。

¹²⁷ 清·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嘉慶 11 年（1806）刻本影印），卷 8，〈盧抱經學士輓詩〉，頁 6 下。

¹²⁸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 28，〈跋續資治通鑑長編〉，頁 13 上。

(9) 桂馥 (1736-1805)

桂馥，字未谷，號雋門。是清代著名學者、文學家、書法家、篆刻家，以及《說文》研究的四大家之一。¹²⁹翁方綱與桂馥相識是在乾隆 33 年 (1768)，桂馥當年春參加了禮闈考試，獲得貢舉，得以進入國子監讀書，因而結識了翁方綱。兩人的進一步交往是在乾隆 39 年 (1744)，當時桂馥返京，帶著好友顏崇槩，請求翁方綱為其家藏《先世交游尺牘》題款。此次請題，為桂馥與翁方綱日後的密切交往，拉開了帷幕。¹³⁰

桂馥與翁方綱的友情長達了 40 年之久，在這 40 年的交往中，他們倆人有著「城南二十載，日日叩我廬」¹³¹的頻繁往來，並且有著「更上一層窮遠目，與君相識叩精微」¹³²的深入探討，也有著書法的切磋，更有著「為爾沉吟濡筆意，故人砥礪交情」¹³³的詩文題寫等等，兩人之間可謂相知相惜，交情不斐。

(10) 紀昀 (1724-1805)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號石雲。紀昀學問淵博，見識通達，貫通儒學典籍，旁及百家諸子。其學旨在辨別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論詩文流派之正偽，主持風雅，舉世所宗。翁方綱從小即英才碩彥，「與同理朱珪 (1731-1806)、獻縣紀昀

¹²⁹ 即段玉裁 (1735-1815)、桂馥、王筠 (1784-1854)、朱駿聲 (1788-1858)。其主要著作分別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桂馥《說文解字義正》，王筠《說文句讀》、《說文釋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¹³⁰ 丁春菊，〈桂馥與翁方綱交遊考論〉(《文史哲》，2014 年第 4 期)，頁 136。

¹³¹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49，〈送未谷任永平令〉，頁 4。

¹³²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19，〈未谷屬為摹文衡山眺遠二字扁其樓〉，頁 3。

¹³³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35，〈題周載軒編修鍾山讀書圖〉，頁 2。

俱以宏揚風雅為己任。」¹³⁴紀昀嘗任《四庫全書》總纂官，並修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長於詩歌、駢文，著有《紀文達公遺集》、《閱微草堂筆記》等。

(11) 王昶 (1724-1806)

王昶，字文舒，號蘭泉，晚號述庵。「性好金石，所藏碑刻凡千數百通，撰《金石萃編》160卷，考訂精博，為嗜古者。」¹³⁵王昶一生遷居各地，少年時期，即赴外鄉求學；中年之後，更是由內地自邊境，幾經輾轉，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加之文人特性，喜好遊覽名山大川，因此交遊廣闊。¹³⁶王昶少時就讀於紫陰書院，與當時素有才名的錢大昕、曹仁虎（1731-1787）、趙文哲（1725-1773）、王鳴盛（1722-1797）、吳泰來、黃文蓮等六位學者並稱為「吳中七子」。¹³⁷七子中，王昶與錢大昕的交情尤其深遠。錢大昕曾說：

吾友王君述庵（王昶），以詩名聞吳會間，酒酣，刻燭拈韻賦詩，纒纒成數千百言。間復倚聲樂府，偷聲減字，慢詞促拍，一一叶于律呂。其選言也新，其立意也醇，緣情體悟之作，清新婉約，出入風雅，有一唱三歎之音。¹³⁸

由於王昶在未進京之前，兩人所居之處相距不遠，王昶經常邀請錢大昕來作客，談論詩文、品味詞賦，彼此常有詩文唱和。此外，王昶與其他文人雅士也多有往來，頗受各方的關注與照顧，其好友嚴榮（1761-1821）便曾經說道：

¹³⁴ 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68，〈儒林傳下·翁方綱〉，頁39下。

¹³⁵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卷9，〈蘭泉學案〉，頁1下。

¹³⁶ 董睿，《王昶「一代風雅盟主」論》（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4月），頁7。

¹³⁷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卷9，〈蘭泉學案·附錄〉，頁2上-下。

¹³⁸ 清·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4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嘉慶12年（1807）刻本影印），〈春融堂集序〉，頁6下-7上。

先生自通籍，登仕途四十餘載，敷歷中外，文事、武畧皆能以功名。自顯而學問文章之業，未嘗一日忘，鞅掌之餘，更勤著撰，纂緝積至數篋。¹³⁹

嚴榮形容王昶的經歷豐富，不論是擔任文職或是武職，都有一番成就。即便公務繁忙，王昶都能夠持續編輯書籍，對此感到非常欽佩。此外，王昶還有與「阮伯元（阮元）詹事、王懷祖侍御及子伯申，咸在京師交酒之會。」¹⁴⁰阮伯元即為阮元，王懷祖、王伯申則為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四人常常會在京師內把酒言歡，謳咏風雅。

嘉慶 24 年（1819），時任職工部尚書的王昶，也於自家中校勘《續文獻通考》，「都中以經術文章名者：莊方耕閣學（莊存與，1719-1788）、申拂珊府丞（申甫）、盧紹弓中允（盧文弨）、楊二思編修（楊述曾，1698-1767）、紀曉嵐編修（紀昀）、朱美叔編修（朱筠）、石君（朱珪）……皆來，數晨夕，連茵接軫，聞者慕之。」¹⁴¹王昶與多位藏書家間、文人之間的熱切交流，如凌廷堪便是，透過與他的交流，¹⁴²使得王昶的校勘考據之學，有著很大的進步，對於日後他的考據學成就，產生很深的影響。

而王昶與翁方綱則對金石之學俱有所好，因此一見如故，經常詩歌唱和，聚集相會。翁方綱就曾作詩云：

論詩湖海見天真，鄭學箴規憶故人。每共寄園尋昔夢，敢援王翰願為鄰。山崖金石應新訪，蒲褐香燈證夙因。稷事來年曾卷軸，僧廊相待落花辰。¹⁴³

足見翁方綱對於王昶的金石鑑賞功力讚譽有佳，除此之外，也顯現出兩人間的感情深厚。此外王昶與其他藏書家或文士此時也經常舉行文會，例如：「席編修（席煜）、趙司馬（趙懷玉，1747-1823）、陳徵士（陳鱣，1753-1817）、吳秀才（吳騫，1733-

¹³⁹ 清·嚴榮，《述庵先生年譜》（《乾嘉名儒年譜》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序，頁1上。

¹⁴⁰ 清·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卷下，頁14上。

¹⁴¹ 清·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卷上，頁7下。

¹⁴²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24，〈與王蘭泉侍郎書〉，頁216。

¹⁴³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19，〈送王述庵大理假歸青浦二首〉，頁3。

1813)、姚上舍(姚椿, 1777-1853)及桂堂, 遠春時時過訪, ……皆在書舍, 老病中不憂寂寞也。」¹⁴⁴由於王昶在晚年遭逢不順, 但是他的老友們並沒有因而疏離他, 反倒是時常造訪; 而王昶也因為有這些好友們的陪伴, 減輕了很多的悲痛。

(12) 丁杰 (1738-1807)

丁杰, 原名錦鴻, 字升衢, 號小山, 又號小疋。丁杰從小家中就貧困, 無法輕易地獲得書, 所以一旦有念書的機會, 就會長期不進食只專心念書, 「肆力經史, 旁及《說文》、音韻、算數」等。¹⁴⁵丁杰任職於「四庫全書館」時, 與朱筠、戴震、羅聘等人互相學習, 並且也因此結識了翁方綱。丁杰「嘗與翁方綱補正朱彝尊《經義考》, 序年月, 博采見聞, 以相證合。」¹⁴⁶因為丁杰和翁方綱兩人共同纂書, 為彼此間的友誼打下基礎, 在此之後, 翁方綱也常常邀請丁杰一同前往翁方綱的書齋, 共同校正翁方綱所藏之圖書。

(13) 洪亮吉 (1746-1809)

洪亮吉, 字君直, 一字稚存, 號北江, 晚號更生。「北江與孫氏淵如(孫星衍)同里齊名, 皆以詞章傑才。……從大興朱學士筠(朱筠)安徽學使幕, 乃窮究經史。登鄉舉, 游關中, 依畢撫部沅(畢沅)。」¹⁴⁷洪亮吉從小就天資聰穎, 師事於朱筠, 並且與畢沅、翁方綱交好。洪亮吉曾經論及翁方綱, 曰: 「最喜客談金石例, 略嫌

¹⁴⁴ 清·嚴榮, 《述庵先生年譜》, 卷下, 頁 25 上。

¹⁴⁵ 清·徐世昌, 《清儒學案小傳》, 卷 8, 〈丁先生杰〉, 頁 9 上。

¹⁴⁶ 清·國史館, 《清史列傳》, 卷 68, 〈儒林傳下·翁方綱〉, 頁 39 下。

¹⁴⁷ 清·徐世昌, 《清儒學案小傳》, 卷 11, 〈北江學案〉, 頁 14 上。

公少性情詩，蓋金石學為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¹⁴⁸可見翁方綱熱愛金石考據，且仔細考證，受到洪亮吉的讚賞。

(14) 吳騫 (1733-1813)

吳騫，字槎客、葵裡，號國山、愚谷、兔床。「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錢少詹大昕為之序，謂：『所藏百氏皆具，獨言經者統於尊也。』少與仲魚（陳鱣）同講訓詁之學，兼好金石。每得一書，必校勘精審；所為題記，其子壽暘（1771-1835）嘗輯為《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六卷。」¹⁴⁹吳騫情殷金石，所著《國山碑考》，極為詳賅。除了藏書、著述以外，吳騫還喜愛交友。其與翁方綱為文友，兩人時相過從，談論藝文與收藏雅事。例如：吳騫曾經委託翁方綱代為校訂《國山碑考》，翁方綱嘗述其事，曰：

君子不以方綱椎魯無似，輒以大著《國山碑攷》諉誣訂定，悚切彌日。¹⁵⁰

又如翁方綱曾經獲得「建初尺」拓本，並利用紫檀木仿作還原，然諸家說法不一，令翁方綱感到困惑。當時吳騫剛好寄來周尺訂譌之文，可以提供翁方綱參考。翁方綱曰：

乾隆壬辰（37年，1772），得「建初尺」拓本，即孔東塘（1648-1718）作記者也。後二十年，予按試曲阜，於孔氏借此尺，用紫檀木仿作之。今漢陽葉東卿復於阮侍郎齋借此尺，用洋銅仿作，則視予昔所作木尺更為準式。東

¹⁴⁸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 17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光緒3年（1877）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影印），卷1，頁12下。

¹⁴⁹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卷9，〈吳先生騫〉，頁33上。

¹⁵⁰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11，〈致吳槎客〉，頁6下。

卿以其一贈予，既為記於尺側，而適得吳槎客（吳騫）所寄周尺訂譌之文，可補《東塘記考辨》所未備矣。¹⁵¹

另外，翁方綱〈愚谷文存序〉中，也提到與吳騫的交情。翁方綱曰：

予與槎客以文字相知，定交三十餘年矣！而未得為之序，今得見所存藁而序之者。槎客東南名士，其文淹貫載籍，力追古作者，不待予言也；其徵文攷獻，裨益於風化，人皆見之，亦無俟予言也。¹⁵²

翁方綱對於吳騫的藝文成就不但讚譽有佳，並且道出兩人以文字相知，交往已經超過 30 年，不難看出兩人之間的深厚友誼。此外，吳騫也與盧文弨交遊，他就曾自敘云：「訪抱經學士（盧文弨）於婁東書院，陸潤之先生（陸時化，1714-1779）見訪於書院，遂偕學士過其家，綜觀典籍。其收藏甚富，自云至潤之已八世。」¹⁵³ 由此可知，三人間也有書事交流。

(15) 姚鼐 (1731-1815)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因室名「惜抱軒」，故世稱惜抱先生。在姚鼐中進士以前的近十年間，姚鼐曾經移居京師立館任教，因得以結交許多京華名士。至乾隆 40 年春辭官返鄉，居京約二十年。期間，翁方綱與姚鼐多有交往，這段交情在兩人同編《四庫全書》時尤為密切。翁方綱嘗謂：

自壬辰（乾隆 37 年）、癸巳（乾隆 38 年）以後，每月與錢樺石（錢載）、程魚門（程晉芳）、姚姬川（姚鼐）、嚴冬友（嚴長明）諸人作詩課。¹⁵⁴

¹⁵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15，〈建初銅尺考〉，頁 18 上-下。

¹⁵²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3，〈愚谷文存序〉，頁 13 下-14 上。

¹⁵³ 清·吳騫，《吳兔床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年 5 月第 1 版），頁 35-36。

¹⁵⁴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 37 下。

翁方綱每月會邀請錢載、程晉芳、姚鼐、嚴長明等人，一同賦詩討論，可以想見諸人之間的交情。此外，姚鼐與凌廷堪也有書信往來，凌廷堪嘗謂：「竊謂《漢志》所載《司馬法》，與今所行《司馬法》當是兩書。何以知之？考《隨書經籍志經類三禮雜大義》下注云：『梁有《司馬法》三卷，亡。』此即《漢書藝文志禮類》所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也。……遙企江雲，依溯何已，不宜。」¹⁵⁵透過書信，不但顯出兩人來往論學十分熱烈。

(16) 孫星衍 (1753-1818)

孫星衍，字伯淵，一字淵如，號季術。自幼聰慧，以詩文名揚鄉里，「袁君枚（袁枚，1716-1797）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為忘年交。」¹⁵⁶他擅長書法，且「博極羣書，勤於著述。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靡不考其原委。」¹⁵⁷家有藏書樓「平津館」，收藏甚富。孫星衍與當時多位文人雅士皆有交流，嘗撰寫品藻金石之作《寰宇訪碑錄》，自序曰：

金石之學，始自漢《藝文志》。……又值同世通人名士，搜奇好異，郵示所獲，擴其見聞。若今王少寇昶、錢少詹大昕、翁閣學方綱、馮編修敏昌、阮撫部元、黃司馬易（1744-1801）、武大令意（1745-1799）、趙明經魏（1746-1825）、何文學元錫（1766-1829），皆為此學。……頃歸吳下，獲交邢明府澍。……明府博學洽聞，藏書萬卷，復據筐篋所有，補其不備，刪其複重，乃始成書，刊以問世，題為《寰宇訪碑錄》。¹⁵⁸

¹⁵⁵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24，〈復姚姬傳先生書〉，頁219-220。

¹⁵⁶ 清·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初編》，卷48，〈孫星衍〉，頁18上。

¹⁵⁷ 清·趙爾巽，《清史稿》，卷481·列傳268，〈儒林二〉，頁13225。

¹⁵⁸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叢書集成新編》4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1月臺1版），〈序〉，頁1上。

每當孫星衍遇到問題，便會與多位藏書家透過書信互相討論。如翁方綱、王昶、阮元、以及錢大昕等，都是他文會過從的對象。除此之外，與凌廷堪也曾有書信往來，「廷堪頓首，癸秋一別，忽忽逾六載矣。……餘情縷縷，不盡欲言。己未（嘉慶 4 年）小除夕，廷堪頓首。」兩人之間即使道別 6 年以上，仍然是好友。¹⁵⁹透過藏書家友人之間的意見交換，以及流通各家藏書相互參稽，孫星衍終於得以完成《寰宇訪碑錄》。

(17) 姚文田 (1758-1827)

姚文田，字秋農，號梅漪。「生平博覽羣書，精於考覈，兼明古曆傳。」¹⁶⁰姚文田與翁方綱也有交往之跡象，翁方綱曾於信中寫道：

秋農（姚文田）老友近禧：別來遂餘四年，遙想經述遠敷，迪綏增勝。而愚今春蒙恩還里，耳目步行，漸皆不能。與客對酬，惟有一榻默坐，徐致調攝之功，此吾老友所夙喻者也。茲乘豫門學士使便致候。藥洲尚有《西齋拙記》，祈為拓寄。而肇慶七星巖第一大巖，內有「景福」二大字，徑數尺之寬，人不知為北海（李邕，678-747）迹也。愚所拓為人持去，倘得秋冬水縮時，覓便人往拓此二字，老友留任，則煩新舉人北上者可寄耳。¹⁶¹

由此札中可以得見，當時於肇慶內的第一大巖內有「景福」二字，而且字體非常大，翁方綱知道此為唐代書法家李邕的親筆真跡，故拜託姚文田幫忙拓印寄來。即使翁方綱身體微恙，但還是熱衷於和姚文田討論書事，可見姚文田與翁方綱兩人間的藝文交情。

¹⁵⁹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 24，〈與孫淵如觀察書〉，頁 217。

¹⁶⁰ 清·周駿富，《清代疇人小傳》（《清代傳記叢刊》34，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卷 52，〈姚文田〉，頁 253。

¹⁶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稿》（《清代稿本百種彙刊》67，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 8 月初版），〈致姚文田〉，頁 3914。

(18) 石韞玉 (1756-1837)

石韞玉，字執如，號琢堂，晚號獨學老人，又號花韻庵主人。每當石韞玉去翰林院修書時，便與翁方綱有著密切的討論，文學交情日漸深厚，時常還會互贈文稿，非常重視彼此。翁方綱曾經作詩〈中秋夕東墅香亭鏡瀾金門琢堂集話湘舫殿撰環翠書舍〉一首，云：

苑樹交光寫一輪，空庭淡共水粼粼。天教對榻逢佳節，月入疎簾似故人。河漢微雲依鶴禁，畫圖古木半龍鱗。桂枝十載東堂夢，蓉鏡重圓記夙因。¹⁶²

東墅即為謝墉 (?-1795)，香亭為吳玉綸 (1732-1802)，琢堂就是石韞玉。翁方綱透過此詩述說平時與這些文人雅士間的文會交流。嘉慶 8 年 (1803)，翁方綱作詩〈寄題靈隱寺壁〉，於詩中說明藏書於靈隱寺的狀況，云：

未忘迦葉散花天，敢擬繡經宿墨緣。盥手初煩僑舍客，齋心聊當汎湖船。青藜分隸曾何有，白傅匡廬不偶然。幾句研屏新偈子，多慚紫竹石幢邊。¹⁶³

而石韞玉也作詩應和，云：

手寫曇章付梵天，靈山集結舊因緣。護持法藏真如印，接引迷津大願船。古德莊嚴千劫在，新詩微妙一燈傳。他時同證菩提果，仍約皈依將帳邊。¹⁶⁴

石韞玉認為翁方綱將親筆撰寫的《金剛經》供奉於靈隱寺中，如此與佛結緣的行為，令他非常讚賞。同時，他也非常贊同翁方綱「覃溪夫子魯靈光，手寫金經貝葉香」

¹⁶²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40，〈中秋夕東墅香亭鏡瀾金門琢堂集話湘舫殿撰環翠書舍〉，頁 5。

¹⁶³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62，〈寄題靈隱寺壁〉，頁 5。

¹⁶⁴ 清·石韞玉，《獨學廬三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出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寫刻獨學廬全稿本影印），卷 1，〈奉和翁覃溪先生雲林寺題壁詩〉，頁 18 下

¹⁶⁵的藏書家作為，透過名家之手撰寫佛經，藏諸名剎，也是一種高士雅尚之流風。除此之外，在與翁方綱的交流之中，石韞玉也漸漸的了解到翁方綱有著非常豐富的學識、思想，而這些都對日後石韞玉的文學思想，產生許多間接或直接的影響力。

除了與翁方綱交遊之外，石韞玉也與多位藏書家、文人雅士結友，如藏書家孫星衍便是。關於石韞玉與孫星衍的交情，石韞玉曾經說過：

予初入翰林，謁昆陵孫淵如先生（孫星衍）于京第。當其時汎汎而已，其後在山東同官，始知先生抱慈惠之心。……先生著書甚夥，其有關於經術、小學者，皆已付梓行世。¹⁶⁶

可見兩人的交往始於石韞玉剛入翰林院之時，不過當時與孫星衍僅僅是泛泛之交而已，真正開始深交，乃是兩人同時在山東當官才開始的。而石韞玉給予孫星衍的評價很高，不單單只是因為孫星衍著書豐富，對於他的人格特質，也是讚譽有佳。

(19) 吳榮光 (1773-1843)

吳榮光，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榮，號荷屋、可庵、拜經老人、石雲山人。「尤酷嗜金石，精鑿賞。所藏如辛舉鹵、祖乙鼎、姬彝、蚌笠尊，太史盧父已彝、兵史鼎等，皆海內絕品。其餘碑版，又幾二千通。」¹⁶⁷吳榮光收藏十分豐富，除了書法名畫之外，所藏銅器皆為海內外的絕品，石碑則是多達 2000 通。在京師期間，與翁方綱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其好友梁章鉅曾說：「與伊墨卿（伊秉綬，1754-1815）、吳荷屋（吳榮光）、朱茱堂諸君子遊，兼講金石之學，最後入『蘇齋』談藝。」¹⁶⁸

¹⁶⁵ 清·石韞玉，《獨學廬三稿》，卷 1，〈古今體詩九十七首〉，頁 1 下。

¹⁶⁶ 清·孫星衍，《孫淵如詩文集》（《四部叢刊正編》8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11 月臺一版，據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景印），石韞玉〈芳茂山人詩錄序〉，頁 1 上。

¹⁶⁷ 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列傳 18，〈金石學家：吳榮光〉，頁 498。

¹⁶⁸ 清·梁章鉅，《退菴金石書畫跋》（《石刻史料新編》第 4 輯 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 年 7 月臺一版），序，頁 1 上。

吳榮光與翁方綱皆愛好金石書畫，翁方綱就曾多次邀請吳榮光前往自己的書室，兩人時而探討法帖、碑刻。此外兩人還會一同賦詩，吳榮光曾作〈和翁覃溪先生論嶺南詩韻二首〉等詩來回應翁方綱的詩詞韻，可見兩人之間交情深厚。¹⁶⁹除了翁方綱之外，藏書家孫星衍曾經前往吳榮光家中觀看收藏，且稱讚曰：

今人收藏宋元人字畫，連篇累牘，真蹟絕少。此為嘉定年《敕告靈澤侯牒》，筆意如龍章鳳質，不假雕飾，且可攷古時公牒之式，真足寶也。蘭陵孫星衍，書於金陵「五松書屋」。¹⁷⁰

孫星衍感嘆如今收藏宋元字畫之人，真品極少，而對於吳榮光所藏的《敕告靈澤侯牒》，則是大為讚賞，可見其收藏之博雅與賞鑒之專精。

(20) 阮元 (1764-1849)

阮元，字柏元，號雲臺，芸臺，又號擘經老人、雷塘庵主人等。乾隆 54 年考中進士，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累仕地方督撫、學政，旋充兵部、禮部、戶部侍郎，拜體仁閣大學士。乾隆 49 年 (1784)，凌廷堪入京上書把阮元推薦給自己的老師翁方綱，翁方綱高度評價了當時的阮元「年踰弱冠，尚未采芹，其學問識解，俱臻極詣。」¹⁷¹年僅 21 歲的阮元其學問被翁方綱評價為識見俱臻極致，還沒有考上秀才就有如此的資質，使翁方綱非常的滿意。從此，年輕的阮元與翁方綱得以相識。而在長期的宦旅生涯中，阮元始終堅持學術研究，不僅於宦跡所到之處提倡經學、史學、金石、書畫，乃至天文曆算等種種學問，都有相當之造詣。¹⁷²以上諸家，

¹⁶⁹ 清·吳榮光，《石雲山人集》（《清代詩文集彙編》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卷8，〈和翁覃溪先生論嶺南詩韻二首〉，頁10上-下。

¹⁷⁰ 清·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叢書集成續編》9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7月臺1版），卷1，頁33上-下。

¹⁷¹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22，〈上洗馬翁潭溪師書〉，頁196。

¹⁷² 顧沿泊，〈古代書院藏書對現代圖書館的啟示〉，頁48；54。

皆是翁方綱重要的藏書家友人。關於翁方綱友朋關係之社群網絡圖示，請參見以下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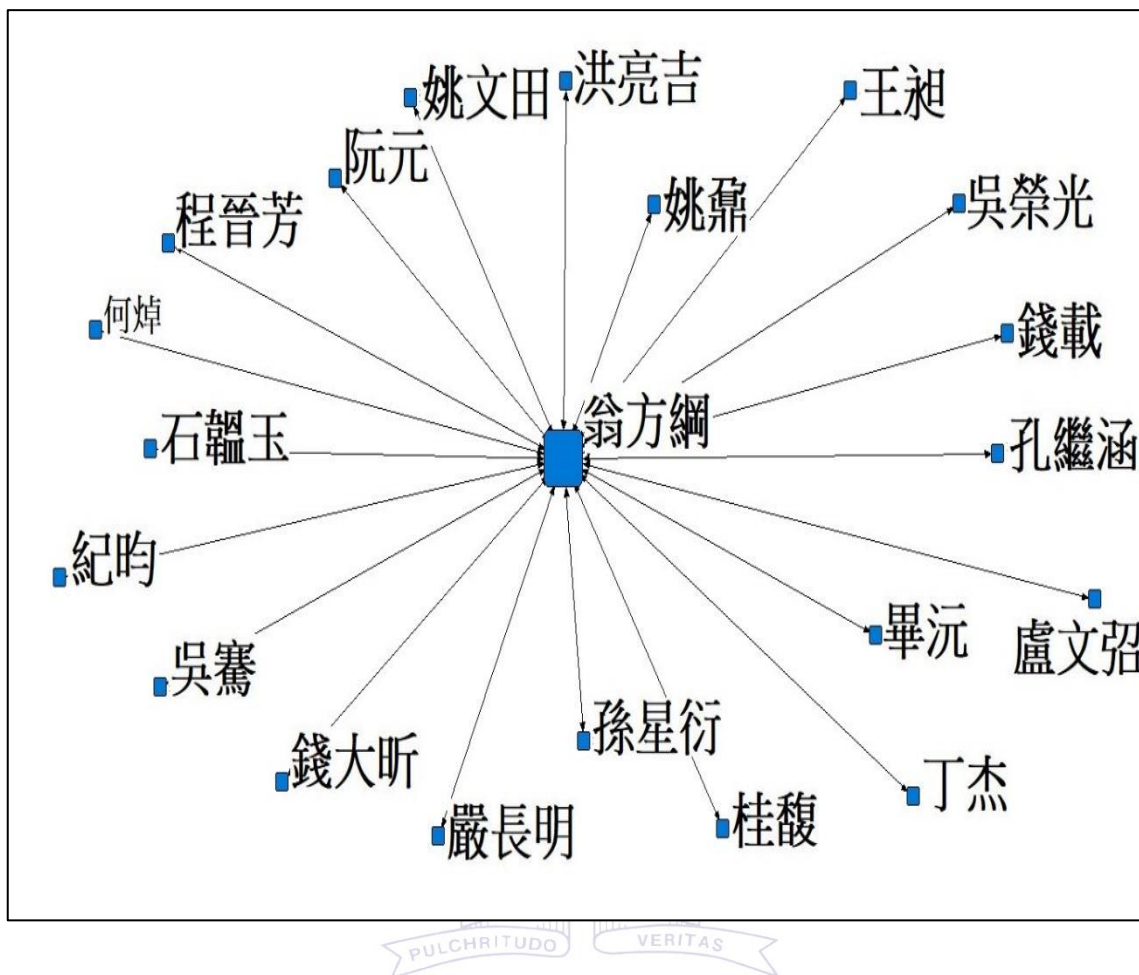


圖 4 翁方綱之友朋關係藏書社群網絡圖

最後，筆者綜合以上所列翁方綱的親族（血親、姻親）、師承、友朋等社會節點，將整個翁方綱的社群關係，輸入至 UCINET 內建的社會網絡繪圖程式，得出以下的網絡圖。在圖中，紅色的節點（中間位置）代表翁方綱，藍色的節點代表其親族關係，橙色的節點代表翁方綱師承的關係，而綠色的節點則是代表翁方綱的友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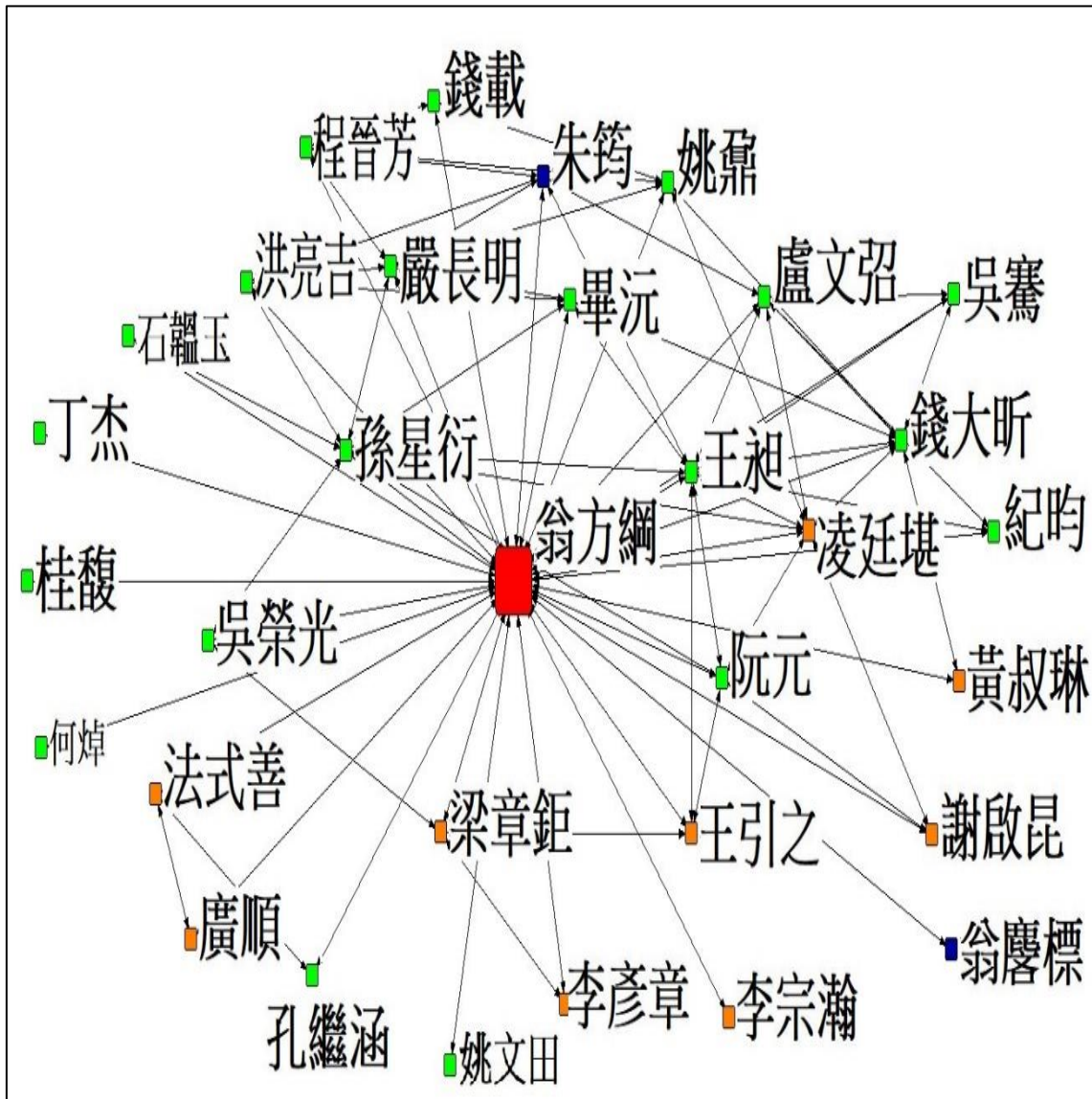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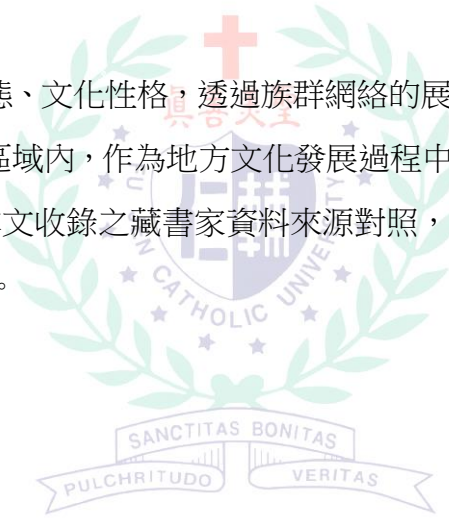


圖 5 翁方綱藏書社群網絡關係圖

由圖 5 可知，在整個社會網絡中，以翁方綱（圖示最大者）為中心，去串聯整個藏書的社會網路。進一步可以說明，同時代的集團間，往往亦互有牽涉，使得藏書家網絡益發顯得錯綜複雜，具有相當強烈的集團性格特質。此外，藏書家之間為了釐清校書、訪書等藏書專業上的諸多問題，往往也得集思廣義，與其他藏書家進行資訊交流，故在圖內所有箭頭的指向都為雙箭頭，也就是互相都有交流的意思，進而促成藏書家之間的集團性格。

以日常接觸來說，社會網絡比較容易聯想到網絡、部落格或臉書等的連結。但事實上，社會網絡泛指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關係或連結，因此有時我們置身其中，理所當然，擁有的各種關係或連結，包含社會性的連結，例如友誼，也包含實體的連結，例如上班的交通路線。若是將這種關係或連結視為一張「網絡圖」，其中「點」代表個體、我與他人，而「線」代表不同的關係、連結或路線，將社會關係視為這種點與線交織的網絡，並加分析便是社會網絡分析。¹⁷³在這些不同類型的集團基礎下，彼此之間相互地鼓舞與影響，進而為區域時代藏書文化營造出良好的時空背景與氛圍。¹⁷⁴

總之，一種文化心態、文化性格，透過族群網絡的展衍推進，便可顯得相當清晰。且文化世族在特定區域內，作為地方文化發展過程中的載體的重大作用，也是確定無疑的。¹⁷⁵至於本文收錄之藏書家資料來源對照，請參考附錄四：「翁方綱藏書社群成員知見表」。



¹⁷³ 陳冠至、陳柏溢、黃敬程，〈孰執牛耳？明代蘇州藏書家社群的數位人文解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55 卷第 3 期，2018 年 11 月），頁 245。

¹⁷⁴ 陳冠至，〈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3 月初版），頁 151。

¹⁷⁵ 嚴迪昌，〈「市隱」心態與吳中明清文化世族〉，《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1 期，頁 89。



第五章 翁方綱的藏書活動

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家，其好書之癖，聚書之誠，藏書之苦，實謂可歌可泣，私家藏書家在圖書的徵集、庋藏、利用與流通工作上為中國古代藏書文化做出了一大貢獻。¹⁷⁶清代私家藏書從藏書目的和利用來看，大致可分為三類，包括：由著述而藏書、讀書的著述家藏書家；為搜集、收藏典籍而藏書的收藏家藏書家，以及為校勘、整理圖書進行出版活動的出版家藏書家。¹⁷⁷清代中期北方私人藏書相當普遍，主要分布於北京、山東、山西、河北等地。北京為當時清政府的所在地，經濟繁榮、文化教育發達，私人藏書蔚為風氣。「寶蘇齋」位於北京前門保安寺街，主人就是翁方綱，以藏書豐富而聞名於當世。¹⁷⁸



第一節 藏書的徵集

承襲明代高濂（1573-1620）《遵生八箋》、曹溶（1613-1685）《流通古書約》、祁承燦（1563-1628）《澹生堂藏書約》這些真知灼見，清代的藏書建設理論取得了更加輝煌的成就。¹⁷⁹尤其是在購書方面，藏書家時常會為了購得書籍，往往不惜捐產購置卷頁典冊；或是聞人有異書，即多方覓求，很多人都是但欲得書而不較其值者。¹⁸⁰清人孫從添就曾感嘆藏書家購書之難，曰：

¹⁷⁶ 程煥文，〈秘而不宣保守典籍—論中國古代的私人藏書（上）〉（《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2年第1期），頁53-54。

¹⁷⁷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892。

¹⁷⁸ 謝彥卯，〈論清代私人藏書〉（《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頁108。

¹⁷⁹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336。

¹⁸⁰ 陳冠至，《明代南京藏書家的藏書生活》，頁125。

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韻事，最樂事。知有是書而無力購求，一難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難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於一時，不能復購於異日，三難也；不能搜之於書傭，不能求之於舊家，四難也；但知近求，不知遠購，五難也；不知鑒戒真偽，檢點卷數，辯論字紙，貿貿購求，每多缺缺，終無善本，六難也。有此六難，則雖有愛書之人，而能藏書者鮮矣。¹⁸¹

孫從添認為，購求書籍，既是最難之事，也是最美之事。

由於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大多書法家、藏書家對搜求、考察金石碑版，表現了非常大的興趣以及熱情，翁方綱及許多乾嘉年間著名的學者、金石學家、書法家、藏書家等，都是如此。¹⁸²翁方綱的學識廣博，在經學、詩學、書志學、金石考據學以及書法藝術等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在步入官場後，仍然積極地從事典籍、金石搨本的蒐集和研究，並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¹⁸³翁方綱愛書，且喜聚書，如同歷代的藏書家都將購書、訪書皆視為自己藏書事業的重要環節一樣，往往會為了尋覓書籍而花費眾多心力，曰：

方綱幼習是碑翻本，蓋即解春雨（解縉，1369-1415）所謂西安府學本之又重翻者。宋潛溪（宋濂，1310-1381）所謂南本失之瘦，北本失之肥。蓋西安府學翻本今雖未見其初翻之石，而即是宋云：「北本失肥」者，正與解春雨跋所謂一體填湊、筋脈無存相合也。乾隆己亥（44年，1779）秋，方綱典江南鄉試，榜發，得晤汪子容甫（汪中，1745-1794），云：「揚州有化度二本，其一真本，其一宋翻本。」而予還役，過行不及見之。其明年二月，門人江子秋史（江德量，1752-1793）為我購此本，云：「其一宋翻者，歸

¹⁸¹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臺北：廣文書局，1987年12月再版），第1則，〈購求〉，頁2。

¹⁸² 朱樂朋，〈翁方綱的金石考察活動〉（《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頁75。

¹⁸³ 李心鵬，《翁方綱題跋手札文集中所見的書學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5月），頁4。

於朱竹君（朱筠）。」後於竹君齋借其本來對看，惟一二字紙斷處不相應耳。然予雖知此本之真，而以為世間必有存字尚多於此者。又從郁氏《書畫記》見有盧嵩翁（郁逢慶）、趙松雪（趙孟頫）諸人題跋之本，亟思一見之，積此渴念又二十餘年矣。¹⁸⁴

傳聞在揚州有碑拓二本，其一為真本、另外一本則為宋翻本。翁方綱聽聞此訊，本想立刻前往。豈料，還未成行之前，學生江德量便已將真本買下，送給了翁方綱，同時也告知另一本宋翻本歸朱筠所有。在此之後，翁方綱向朱筠借宋翻本來兩兩互相對看，只有少數幾個地方不同而已。至此又與郁氏所藏《書畫記》見有多位前人之題跋，另翁方綱非常之開心，也完成了他 20 多來的渴望。可見其對書的喜愛與癡迷。藏書家透過購置藏書，形成自己的藏書系統，進而建立自己的藏書樓。

除了購書之外，訪書也是藏書家圖書徵集的主要來源之一。所謂訪書是指藏書家為了增益藏書或為了完成特定收藏目標，而進行的典籍圖書訪求活動。¹⁸⁵翁方綱於圖書的訪求上，也是費盡苦心、四處奔波，例如《李元秀碑》搨本，便是如此，翁方綱曰：

此碑久亡，相傳良鄉縣某人斲其石為六礎，嘉靖間，宛平令李蔭輦致都城署中，建「古墨齋」以覆之。後移順天府署，而王府丞惟儉（王惟儉）攜其四礎往汴中，僅存二礎矣。至國朝康熙三十一年（1692），府丞石門吳匪庵涵（吳涵，？-1709）移置府學文丞相祠，壁有記，勒石記言僅存數十字。今諦審精拓，可辨者尚百八十許字，但多泐耳。是碑，北海（李邕，674-746）書之最道美者，遠在陝碑雲麾之上，而泐壞至此。予自幼留意考之，訪其全碑不可得，今始於吳門訪得舊拓本，一真刻，一樸刻，凡二種，屬友人錢立羣（錢泳）為雙鈎其本來。董思白（董其昌，1555-1636）、莫廷韓（莫是龍，1539-1587）諸跋皆稱唐拓，然就中泐處，與今二礎字有相去不遠者，

¹⁸⁴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22，〈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二首〉，頁 11 上-下。

¹⁸⁵ 徐雁，〈中國歷史藏書重要術語詮釋〉（《圖書情報知識》，1989 年第 1 期），頁 56。

益見此石之泐久矣。然合此二本，文尚未全，且其裝冊，顛倒原次，仍不可讀，予亦無從而整理之也。¹⁸⁶

李元秀之碑已損毀，民間當時有人斷其石當作柱礎，直至嘉靖年間，才下令建「古墨齋」來典藏。與此之後，明代藏書家王惟儉將其中 4 礎帶至開封，故只剩 2 礎，隨著時間經過，其能辨識度越來越低。翁方綱年輕時便開始留意、考據此碑，他知道要能考據全碑帖是不可能之事。有次在「春暉堂」訪得其舊拓本，本應該是開心之事，但其二本，文內尚缺，且其裝幀更是紊亂，仍然無法閱讀，即使想整理也無從下手，實為可惜。由此可知，翁方綱對於藏書的執著與喜愛，即使無法全部都閱覽，還是想盡辦法將訪求收藏。

翁方綱除了親自訪求書籍之外，就算無法前往，也會請他人代為訪書，他嘗謂：

揚州禪智寺蘇文忠（蘇軾）《次韻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詩》，明人重刻於石。有嘉靖辛丑（20 年，1541）蜀岡盛儀、萬曆己卯（7 年，1579）沔陽陳文燭（1525-?）二跋。先是石九斷仆，國初新城王文簡（王引之）司理揚州時訪得之，屬寺僧陷方丈壁間，并次韻勒石其側。汪堯峰（汪琬，1624-1691）詩云：「鶴影蟬聲野徑長，髯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說迷樓好，誰訪殘碑到蜀岡。」記此事也。方綱嚮往斯蹟久矣，會門人謝蘊山守揚州，屬其訪搨，且續唱和之盟。今年夏，得所寄拓本，……今此石本，「師」字半泐，適門人張警堂銘（張銘）假守懷慶，以郊縣亦有此詩石刻，拓以見寄，與此蹟筆法正同，而其事特異。¹⁸⁷

蘇軾的《次韻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詩》，明人將其重刻於石。翁方綱非常嚮往其帖，因此要求謝蘊山在揚州期間，代為訪搨寄來，終於得此拓本。在考據之

¹⁸⁶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23，〈跋李元秀碑〉，頁 6 上-下。

¹⁸⁷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25，〈跋禪智寺蘇碑〉，頁 8 上-9 上。

時，翁方綱發現此帖內的「師」字的筆法，與當時張銘所在邳縣，也有此詩的石刻且筆法相同，因而感到訝異。

藏書家訪書的過程中，除了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藏書數量之外，有時候也是為了確認其版本，翁方綱跑遍各地，尋覓各種典籍，每遇同書不同板，除了會與自己所藏之書互相比對之外，也向朋友、弟子確認其版本的真偽，曰：

三十年前友人以杭州翻刻此記拓本見示。予適得寒山趙氏舊藏本對之，然與《墨林快事》所稱杭石之誤皆不相合，豈杭石又屢摹耶？今見春湖（李宗瀚）宗丞所得此本，不特遠勝杭本，并遠勝予所藏寒山舊本。蓋寒山本即從此摹出也。然前幅「羣峰密圍」之下，後幅「諸法同體」之上皆有缺畫，而石無泐痕，則此本亦重刻者矣。又不知《墨林快事》所稱有誤之本，此二處缺畫如何？此記蓋不知經幾翻摹矣。……此記書於元豐六年（1083）癸亥，正是初學晉人之時，宜其用筆得晉帖意也。蓋原石為人爭拓，不久即壞，是以如此就舊拓尚是初翻之本。評米書者正當拈此為第一義，正恐《寶晉英光》諸帖皆當讓席耳，安得訪求其初刻舊本以問津晉法乎？¹⁸⁸

30年前，翁方綱友人曾前來出示自己於杭州所翻刻的米芾碑帖。翁方綱一見，便與日前於寒山趙氏獲得之舊藏本互相比對，發現與《墨林快事》所載有所出入。如今，見弟子李宗瀚所藏之舊本後，認為寒山趙氏本應是出自於此。但是，越看似乎越覺得事有蹊翹，因為不論是杭州翻刻本，亦或是寒山趙氏藏本，皆有缺處，此本卻沒有，故判斷此本應為重刻本。翁方綱認為，此帖在當時因為太過受歡迎，太多人搶著碑拓，原石在當時就已經損壞，所以日後碑拓之帖，有可能就會是一直用錯誤的碑帖進行拓印。所以，翁方綱希望透過自己的訪求，找到當時正確的版本，來進行仔細的考據。

訪書對於藏書家來說，除了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藏書之外，也有可能是為了補足所藏之書有缺的部分，翁方綱曾云：「右趙東山《左傳補注》十卷，通志堂版本尚

¹⁸⁸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25，〈跋米書龍井方圓庵記〉，頁12上-下。

有闕脫，當訪求舊本補之」。¹⁸⁹ 翁方綱屢司文柄，一時英才碩彥，識拔無算，與他平時文物賞鑑的獨到眼光相互呼應。同時，翁方綱生平還精研經術，不為漢、宋門戶之見。¹⁹⁰除了精研經學之外，翁方綱對於考據學也非常熱衷，尤其是考訂訓詁，能夠深究義理，且立論持平，不會被當時的社會氛圍所影響。總之，他對於金石之衷愛，以及對考訂之熟稔，物色摩搨，使其家收藏頗為豐富。¹⁹¹

由於翁方綱時時精心積學，以致宏寬多聞，因此，乾隆帝常稱讚翁方綱學問甚好。蓋翁方綱之學問皆有根柢，其以古人為師，嗜古成癖，尤其癖愛藏書，實為乾嘉時期的著名藏書家。¹⁹²



第二節 藏書的度藏

藏書興，讀書盛；則文化繁榮。在漫長的藏書過程中，私家藏書家們可能會遭遇戰亂、朝代更迭、天災等因素，許多典籍時常旋聚旋散。因此，如何妥善保存典籍，對於藏書家來說尤其重要。

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措施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秘藏」，即將文獻典藏於石櫃、石室、屋壁或是石洞之中，以求永久保存；二是「四防」，即是採取防火、水、蟲，以及霉等的措施，藉此來保護藏書不受損害，以求文獻典籍能保

¹⁸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16，〈跋左傳補注〉，頁 1 上。

¹⁹⁰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清代傳記叢刊》6，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卷 9，〈蘇齋學案·翁先生方綱〉，頁 48 上。

¹⁹¹ 嚴文郁，《清儒略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 6 月第 1 版），頁 161。

¹⁹² 劉佳，〈翁方綱的「尚蘇」情節〉，《詞學新視野：李清照辛棄疾暨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8 月第 1 版），頁 482-483。

存更長的時間；三是「嚴管」，訂立「書不出閣，代不分書」、「杜絕火種、樓不延客」等的管理制度，以防藏書遭遇不測。¹⁹³

翁方綱除了是乾嘉時期的著名樸學家之外，同時也是北方的大藏書家，終其一生之心血，全都花費在書籍、金石、碑板之上。¹⁹⁴這能夠從翁方綱屢次將書齋易名，可以略知一二，同時也可以看出翁方綱不同時期的收藏偏好。從最初的「蘇米齋」、「寶蘇室」來看，如前文所述，因為當時翁方綱非常喜愛、崇拜蘇軾，他嘗謂：

予年十九（乾隆 17 年，1752），日課誦《漢書》一千字，明海鹽陳文學許廷輯本也。文學號蘇庵，則願以「蘇齋」名書室，竊附私淑前賢之意。戊子（33 年，1768）冬，得蘇書《嵩陽帖》。癸巳（38 年，1773）冬，得蘇詩《施顧注》宋槧殘本，益發奮自勗於蘇學，始以「寶蘇」名。昔陳眉公（陳繼儒，1558-1639）裒輯蘇書成《晚香堂帖》二十八卷，可謂勤且專矣，顧眉公堂曰：「寶顏」，而未以「蘇」名。宋牧仲（宋犖，1634-1714）摹蘇像而侍其旁，然未嘗名齋也。蔣樹存（蔣深）亦得蘇像，俾王麓臺（王原祁，1642-1715）圖之，始有「蘇齋」之目，查初白（查慎行，1650-1727）為賦詩者也，而銘記之屬，未有傳者。¹⁹⁵

乾隆 17 年，是年 19 歲的翁方綱，課誦陳文學之《漢書》成為了他每日必做之事，翁方綱認為，雖然自己無法得到蘇軾的親身教授，但是他非常尊敬蘇軾，因此曾經先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蘇米齋」，希望能夠追隨與品味蘇軾的風韻。乾隆 33 年，翁方綱獲得蘇軾的親筆手跡《嵩陽帖》；稍後又於乾隆 38 年，得到宋槧施、顧注《註東坡先生詩》殘本後，覺得與蘇軾更加有緣，因而發奮勉勵自己，努力學習蘇學，進而將書齋更名為「寶蘇室」。同時，他又感嘆明儒陳繼儒與清初名士宋犖等人，也都喜愛蘇軾，但卻都沒有以「蘇」字名其齋，認為實為可惜。

¹⁹³ 徐凌志，〈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理念及措施〉（《文獻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58。

¹⁹⁴ 李心鵬，〈翁方綱題跋手札文集中所見的書學思想研究〉，頁 5。

¹⁹⁵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5，〈寶蘇室研銘記〉，頁 14 上-下。

將書齋命名為「蘇米齋」之後，翁方綱又說：「予名室之後六年，始書此扁於所居『蘇米齋』之北楹，適得歙研，黝澤而宜墨。」¹⁹⁶因為喜獲安徽歙溪所產的精美硯臺，便用其磨墨，親自題刻扁額置放於書齋中。此外，他更延請揚州知名畫家羅聘（1733-1799）繪四十歲小像於所藏蘇軾《註東坡先生詩》殘宋本上（參見附錄二）。¹⁹⁷至此，能夠看出翁方綱對於其書齋的喜愛與自豪，對於要入室中庋藏之物，翁方綱更是廣為搜羅，豐富典藏的數量，翁方綱指出：

凡室之中，有益於身心則寶之；資於行事則寶之；能助問學、廣見聞則寶之。其耳目之翫好，器物之巧麗，非寶也。¹⁹⁸

在大量搜羅典籍、金石、器物等大量物件之後，翁方綱又將其分類貯存，舉凡對於身心有益，或是有助於待人處世，尤其是能夠幫助增長學問知識之物，他都加以蒐藏。然則，翁方綱認為如果此物為寶，但是卻有眼不識泰山，不懂得去鑑賞此物真正的價值，那麼就有愧對於那些珍品。翁方綱又云：

石之資用也，莫如硯，而但取色澤者，失之；文之可鑑賞者，莫如詩筆法書，而但取姿媚者，失之；人之尚友至蘇文忠（蘇軾）可無譏矣，而但取其激昂豪放者，抑又失之。然而所謂寶者，敬而勿失謂之寶，念而弗釋謂之寶，慎思而弗敢歧惑也謂之寶。是予所以銘諸心者，而豈僅以銘研也哉？¹⁹⁹

若是一塊石頭能夠成為一個好硯台，但收藏者卻只看到它的外觀與色澤；又或是一篇好的文章，其內容豐富且精深，但是觀覽者卻只對其書寫的筆順感到興趣；亦或是喜愛蘇東坡，但只喜愛他為人的一部份，沒有深入去了解他，諸如此類，對於翁方綱來說都是失職的蒐藏者。翁方綱之所以會提出這些觀點，目的當然都是在誇示自己的收藏、鑑賞、識人等能力，都是非常良好。其實，歷史上很多藏書家都是如此，不僅僅愛書，對與自身收藏書籍的品質或數量，通常也會感到自豪。綜上所述，

¹⁹⁶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5，〈寶蘇室研銘記〉，頁14下-15上。

¹⁹⁷ 王友勝，〈翁方綱與《蘇軾補注》〉（《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頁43。

¹⁹⁸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5，〈寶蘇室研銘記〉，頁15上。

¹⁹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5，〈寶蘇室研銘記〉，頁15上。

不難體會到翁方綱成立「蘇米齋」的心路歷程，同時也更加能夠了解到翁方綱的藏書心態。

中國古代的藏書家們透過構建書樓，或是另闢專室以貯放典籍，做為保存圖書的主要方法之一。藉由書樓或是書室，確實有利於藏書的管理或是保護。同時，也能夠滿足喜好文樓與會客之會結客的好是文人們進行雅集，為彼此都能提供一個場地。²⁰⁰對於翁方綱來說也是如此，經由成立「寶蘇室」來存放典籍，持續增加度藏的數量，盼望自祖父開始的藏書精神，能夠傳續給後代子孫。

在藏書的過程中，累積了豐富的藏書經驗。對於典籍的維護，除了一般人為的污損以外，最為重要的即為水、火、蟲等自然因素。因此，每逢伏天或初秋之時，藏書家們便會把藏書放到陽光下進行曝曬，由此形成了藏書文化中的「曝書」。這樣不僅可以驅除濕氣、防霉、甚至可以除蟲。²⁰¹翁方綱好交遊，時常會與文人之間互有文會過從，他們可能會聚集一起討論藏書之事，或是互相展示自己的收藏。翁方綱說：

坡書《天際烏雲帖》，……予齋藏此真蹟，每臘月十九日於「蘇齋」筍脯之筵，拜祭坡公笠屐像前，輒以《快雪》諸刻並陳几上，客來讚詠，無不驚歎予本之真者。²⁰²

翁方綱以藏有蘇軾的《天際烏雲帖》而感到自豪，每年的12月19日，他都會在自己的書齋中祭拜蘇軾，並設宴邀情各方友人前來作客。每當訪客看到翁方綱的收藏品，無不讚美此真跡。翁方綱對自己的藏書甚為自得，在其《復初齋詩集》內有〈自題三萬卷齋〉詩一首，云：

²⁰⁰ 陳冠至，《明代南京藏書家的藏書生活》，頁132。

²⁰¹ 方挺，《清代福建私家藏書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4月），頁84-85。

²⁰²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29，〈跋天際烏雲帖三首〉，頁3上；5上-下。

笑論插架鄴侯籤，己愧湖州目錄兼。秀水櫛難八萬擬，《黃甘》字孰兩行添。
漢碑草草傳洪適（1117-1184），宋槧寥寥拜子瞻（蘇軾）。《化度銘》圖摹
范老，「賜書樓」印敢輕鈐？²⁰³

從以上詩文，可以體會到翁方綱除了私自攀比唐朝李泌（722-789）、南宋陳振孫（1179-1262）、清初朱彝尊等多位名震天下的藏書先輩，來表明自身相同的藏書志向外，並標榜對一些歷史上的書法名家如東晉王羲之、南宋洪適、北宋蘇軾等的崇慕之意，當然，還透露出這些名家所遺之法帖，都是他的家藏珍品，其自得之情，可見一斑。此外，從「己愧湖州目錄兼」句中，還可以瞭解到翁方綱以沒有為大批的家藏珍本典籍編製目錄為憾；而從「賜書樓印敢輕鈐」句中，則可以知道翁方綱的藏書處除了「寶蘇齋」、「三萬卷齋」以外，其實還有「賜書樓」，甚至刻有專屬的藏書印。²⁰⁴據統計，翁方綱的藏書印有：「翁方綱印」、「文淵閣直閣事翁方綱潭溪」、「蘇齋真賞」、「密閣校理」、「蘇齋墨緣」、「恩加二品重宴瓊林」、「內閣學士內閣侍讀學士翰林侍讀學士」、「三任廣東學正」、「潭溪」、「潭溪審定」、「子孫保之」等數枚（請參考附錄三）。²⁰⁵

其實前述之「三萬卷齋」，是翁方綱 45 歲（乾隆 42 年）後，將自己的書齋改名為「三萬卷齋」的，說明翁方綱此時的藏書心態，已經因為家藏數量的大增及內容之豐富，更加感到自豪。到了晚年，翁方綱又將自己的書齋改名為「石墨書樓」，期盼寄情於金石書畫之間，以此終老。²⁰⁶在洪亮吉的《江北詩話》中，把藏書家分為五等，其中第二等「辨其板片，助其錯誤，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弼，翁閣學方綱諸人士也」。²⁰⁷可見誇示自家藏書數量是歷來藏書家之通性，即便翁方綱也在所難免，洪亮吉對翁方綱的藏書評價仍然很高，尤其是對翁方綱校讎與鑑賞藏書的功力大表認同。

²⁰³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47，〈自題三萬卷齋〉，頁 4。

²⁰⁴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清-現代》（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6 月第 1 版），頁 381-382。

²⁰⁵ 劉大軍、喻爽爽、李雲，《中國私家藏書》，頁 152。

²⁰⁶ 劉天琪，〈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成書考〉（《中華書道》，第 63 期，2009 年 3 月），頁 26。

²⁰⁷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卷 3，頁 1 上。

翁方綱因收藏了宋刊本《後山全集》，乃為之題跋，並題〈書陳後山集〉詩一首，云：

一瓣南豐古墨香，較量壓架配蘇黃。薪津注尚開雕未，紙貴誰論越與襄。²⁰⁸

翁方綱認為自己的藏書有如北宋的曾鞏（1019-1083）一樣的多與精，藏書多到放滿整個藏數處的架子，足以匹配蘇軾及黃庭堅，並且對於自己書齋內所收藏的《施顧註東坡詩》的殘本，為其版本的珍貴性感到非常讚嘆，熱愛、鑑賞不忍釋手。從以上可以看出翁方綱是如何熱愛藏書，以及他對自身所藏之書感到十分滿意。



第三節 藏書的利用

隨著藏書家收書來源的拓寬，藏書數量的增多，藏書活動不再僅侷限於書籍的典藏，而是會有目的地對藏書加以整理研究、校讎是正、或是利用自己的藏書著書立說、刊刻秘笈以利後人。²⁰⁹濟世、求知、修身養性乃古代私家藏書動力之所在，藏以致用，為用而藏，是古代私家藏書一貫遵循原則。藏書助學術、以藏書經世道，以藏書長見識。一般說來，為用而藏是大多數古代私家藏書的出發點與根本目的。

210

²⁰⁸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60，〈書陳後山集〉，頁 16。

²⁰⁹ 任莉莉，〈試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與目錄版本校勘學〉（《圖書情報工作》，2011 年第 1 期），頁 138。

²¹⁰ 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山東圖書館季刊》，2004 年第 4 期），頁 39；41。

一、閱讀與賞鑒

自古以來，讀書便是藏書的主要目的之一。中國古代藏書家大多具有淵博的知識和學問，而讀書同樣是為了做學問，也就是為治學。藏書家大多都酷嗜讀書，懷有深深的讀書情節，藏書家張金吾（1787-1829）曾評讀書一事：「人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者，無它，學不學之所致也。然欲致力於學者，必先讀書，欲讀書，不先藏書。藏書者，誦讀之資，而學問之本也。」²¹¹藏書家藏書之餘，必讀書，若不讀書，單純只為藏而藏，即會失去其原本的意義。

翁方綱不僅愛藏書，同時也愛讀書。曾與張埴的對談中說：「至於今日讀書、攷證之學其多且難，已倍於古人。」²¹²相較於從前，當今的讀書、考證之學需要發花費更大的心力與功夫才可以完成，又云：

梁子九山（梁上國，1750-1818）每來吾齋談藝，極虛衷，不以議論鳴於人。今其兄子芷林（梁章鉅）始以所為《古文尚書》辨諸條輯鈔來示予再讀而三歎焉。毛氏（毛奇齡，1623-1716）冤詞可不必有，而此書不可無也。²¹³

梁上國每次前來與翁方綱談藝，論事中立，不會帶有任何成見去評斷他人。而當翁方綱再次見到梁章鉅所鈔《古文尚書》後，深感可惜。他認為此書非常好，但是見到毛奇齡的冤詞，卻感到不悅。毛奇齡的冤詞因為時常被拿來與歐陽修的誣陷一事互相評論與比較，在翁方綱的心中，歐陽修被誣陷是很悲傷的事，與毛奇齡的冤詞明顯是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藏書家經常透過閱讀典籍，增加自己的見聞、知識，並且時常會和文人之間互有討論。

²¹¹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13年（1887）吳縣靈芬閣集字版校本影印），藏書志序，頁2上。

²¹²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11，〈復張瘦同論聯句書〉，頁26上。

²¹³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1，〈古文尚書條辨序二〉，頁5上。

除了閱讀典籍之外，藏書家亦會對於自己的收藏進行鑑賞。所謂鑑賞，其實是有兩個概念，首先是「鑑」者，鑑別、鑑定也。只有透過鑑別藏品的真偽、優劣，才能確定此藏品的各種價值。也只有精品、珍品才會值得自己陪伴三五摯友同好欣賞之。所以說，歷來對「鑑賞」的大致定義有三：其一為審查識別也；其二為明察而賞識之也；其三則是對於藝術品之鑑別賞玩也。²¹⁴藏書家會以這三種方式為前提來進行鑑賞，翁方綱曾說：

《古文苑》，世傳孫洙（1711-1778）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宋紹定壬辰（5年，1232）章樵昇道序，稱為唐人所編詩文。今按卷首所載岐陽石鼓之文，與今所傳本無異，而時有差誤，即此可知其必不出於唐人所編也。此尚是舊板本，亦或資以備考可矣。²¹⁵

《古文苑》一書，章樵有序稱是唐人所編詩文，日後由孫洙獲得。翁方綱按卷內所載和流傳的他本互相比對，得知此本並不是出於唐人所編。由此可知，藏書家藉由鑑賞，不僅可以確認前人的考證是否正確，同時也可以增加自己所藏之書的質量。翁方綱復於〈跋顏氏家訓〉中提及：

是書蓋淳熙七年（1180）所鈔，故於「構」字不書，注云：「太上御名者，宋高宗諱也。」板本每半葉十二行，行十八字。後有《考證》一卷，連《跋》七葉，其第六頁之後九行寫諸人系銜，自後而前，故此葉除第一行有字外，凡空十四行也。沈虞卿諸銜寫式已詳記於盧校本內矣，前後有「汲古閣」毛氏諸印。以予所藏宋槧《蘇詩》施顧注本內毛氏諸印對之，亦止「汲古閣」三字紅文小方印及「毛晉」二字紅文小連珠印，此二印殊審不爽耳。又知「汲古得修綆」五字紅文方印，亦是毛氏印，《蘇詩》內亦有之也。嘉慶元年（1796）丙辰二月一日至四日，竭四半晝之力甫能對訖，記於此。²¹⁶

²¹⁴ 金炫廷，《明人的鑑賞生活》（《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15，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初版），頁7。

²¹⁵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稿》，〈跋古文苑〉，頁4133。

²¹⁶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稿》，〈跋顏氏家訓〉頁3172。

《顏世家訓》內有毛氏的「汲古閣」藏書印，便與自己所藏《蘇詩》來互相比對，希望藉由藏書印的比對，能夠辨識真偽。藏書家就是如此，為了確認所藏的真假，必須發揮長時間的精力來進行鑑賞，以獲得答案。翁方綱又於〈雪浪石盆銘記〉中云：

蘇書《雪浪石盆銘》，刻於盆口四周。自上盡字內，至下存字內，從徑四尺五寸；自右原字內至左東字內，橫徑四尺四寸五分盆口寬五寸四分，合外內計之，須得圓石徑圍五尺五寸也。其高未見，不能計，然大約亦須數寸或尺許，若選美石可琢為盆者，度一時未能就，是以姑用圓研代之，縮臨其字刻焉。此原刻之字已被俗人磨去，拓本今存者至為珍罕矣。慮摺疊易損也，故翦開略依其原石彎環勢粘於冊，時時翫之，而并繪此圖於後。他日儻得用原式依此尺寸伐石為之，更當詳加敘贊以傳爾。²¹⁷

至此，可以看出，藏書家收藏花費心力收集書籍，也花費大量的心力對書籍進行鑑賞。經過藏書家的細心比對，無疑對增加自己藏書的質量來說，有著正面且非常大的助益。從書籍的徵集至利用，不僅需要花費許多的財力去徵求，徵集到圖書之後，更要花費時間與精力去進行閱讀與鑑賞，才能一直不斷地精進所藏。翁方綱熱愛藏書，也熱愛讀書與鑑賞，這點更是完全符合中國古代藏書家的藏書精神。

二、校讎與著述

大凡私家藏書家，皆注重校勘。由於書籍在經歷長時間的輾轉抄寫或刊刻，很難不出錯，對此，很多的藏書家都會自覺地擔當起校勘的職責。藏書家以自家藏書為校勘的對象，長年累月的進行著校勘工作，且將其視為藏書利用的一個重要環節，

²¹⁷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5，〈雪浪石盆銘記〉，頁6下-7上。

許多藏書家會為了提高自己的藏書質量，勤勉於校勘。²¹⁸翁方綱在廣納典籍之餘，透過他的書友，互相討論校勘，希望藉此來提高自己藏書的質量，他為詩云：

十日屯陰一日晴，數峯纔啟半峯明。何嘗信宿扶筇到，但取蒼涼挂笏情。當
午校讐爭晷景，幾時蒲葦又秋聲。閑庭風雨閑街月，此地從來欠合并。²¹⁹

只要一有時間，翁方綱就會和好友姚鼐一同在庭院中校讎書籍，互相討論，一邊感受微風吹拂，一邊享受這種既有趣又清閒的時間，樂此不疲。除了弄清楚所依據版本之優劣外，更需要透過各種方法找來原刻本進行比較。典籍通常在傳抄、傳刻的過程中，時常會出現脫文、訛字、倒字、重文、疊字、缺頁，或是誤改的現象，這些都必須經過藏書家自發性地校勘來加以補正。²²⁰而藏書家的校讎，除了是透過自己的藏書之外，有時候也會向他人借閱書籍，進行校讎工作。翁方綱於〈跋李雁湖注王半山詩二首〉中，曰：

壬寅（47年，1782）春，抱經（盧文弨）主講席於晉陽，馳書於杭，取其寫本至京，予得借錄此十七卷，……予昔年得宋槧《施注》蘇詩，今得借鈔李（李壁，1159-1222）注王（王安石，1021-1086）詩，皆宋本之未經後人刪亂者，而又皆是殘本，事之相合固有如此者哉！因錄而精校之，與張氏（張燕昌，1738-1814）刻本同裝於篋。²²¹

因為對於李壁於王安石詩中的注有所疑惑，於是迫切地想要校讎，但是又苦無其他書籍可以比對。恰巧當時好友盧文弨至晉陽，於是借他的藏本來進行比對，細心校讎，然後，再將此本和張燕昌所刻的版本一同裝於篋中。由此可知，翁方綱對於所藏圖籍，每當有疑惑，並不會略過或是放棄考證，而是會去向書友借書，進行校勘，然後再典藏於書室之中。

²¹⁸ 方挺，《清代福建私家藏書研究》，頁 88。

²¹⁹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11，〈晨起同姬川陶然亭作〉，頁 8。

²²⁰ 韓文寧，〈明清浙江藏書家的主要功績和歷史局限〉（《東南文化》，1997 年第 2 期），頁 143。

²²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18，〈跋李雁湖注王半山詩二首〉，頁 9 上。

另外，由今日現存的古籍當中，可以檢閱到翁方綱遺留下的手書題記，透過這些史料，可以了解到翁方綱寶貴的藏書經驗與心路歷程。例如在國家圖書館典藏的清康熙版《佩觿》一書的末尾，他親筆題曰：

《佩觿》三卷，前繫銜云：「朝請大夫、國子周易博士、柱國，臣郭忠恕（？-977）記」。按其傳，稱恕先周廣順初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周易博士，此書稱臣，則是作於周也。其末之〈辨證〉一篇，內引《景祐集》，均其非出恕，先可知矣。至卷中音釋，雖或不盡言出《說文》，而多與《說文》可相檢證者。毛斧季（毛扆，1640-1713）校刊《說文》，識後云：「忠恕小字說文字源，扆今不得而見。但夢英（釋夢英，948-？）篆書偏旁，咸平（今刻本咸誤延）二年（999）所建者，中有五處次序不侔，始竊疑之。及讀恕先《汗簡》，次序與此悉合，乃知夢英之誤也。」徐鼎臣（徐鉉，916-991）承詔校定《說文》，在雍熙三年（986），而恕先卒於太平興國二年（977），所用《說文》，乃徐氏未校以前之本，其或原有訛脫，而徐後訂正耶？或所見本異耶？凡此，自宜存以備致者也。」郭氏窮極博綜，揶揄當世，其作是書，蓋亦譏切俗學，以擴啟童蒙，故未暇溯言作字之本始。至如唐人碑帖、經師俗寫，皆以入之，是固不得與《說文》之每字必則古昔者，可同日語矣。近日史館校勘，每竟一書，輒資朋友講聞，若歸安丁君（丁杰）錦鴻之於《漢隸字源》，瑞金羅君有高（1733-1778）之於是書，皆纍數千百言，非徒讐校之勤而已。方綱既擇其言之要者過錄於卷，因為羅君言是書之不可概繩如此，並識於卷前。乾隆四十三年（1778），歲次戊戌，春二月十一日，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北平翁方綱。²²²

《佩觿》的作者為宋代著名的畫家郭忠恕，《佩觿》是一部成書於五代後周的辨別音近形似字的字書，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字學價值。翁方綱認為在《佩觿》的其中一篇的〈辨證〉內引用《景祐集》，並非出自於郭忠恕。且在毛扆校刊《說文解字》

²²² 宋·郭忠恕，《佩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間吳郡張士俊刊澤存堂五種本），書末，頁56上-下。

中，認為郭忠恕在《佩觿》所說字的來源，和釋夢英於咸平二年（990）所刊的《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中，有許多的不同之處，但在讀了同樣是郭忠恕所撰之《汗簡》後，才發現錯的其實是釋夢英。而在此之後，徐鼎臣校訂《說文解字》，是在郭忠恕離世之後，而郭忠恕當時的是沒有校訂過的，然而坊間卻有傳言郭忠恕是使用徐鉉校訂過的本子，或是所見本是有問題的，這點翁方綱認為需要親自去進行考證（於國家圖書館內藏有其他翁方綱手書題記書籍，參考附錄五、六）。

抄書，是古人經常運用的藏書方法之一。在印刷術發明之前，藏書多靠抄寫，每一位藏書家在徵集典籍的過程中也都離不開抄書。他們或自抄，或雇人抄。即使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由於受限於印刷數量限制，所以抄書仍然是藏書家徵集的重要途徑之一。²²³此外，在書籍的校勘方面，有時為了一種書籍的校勘，往往需要埋頭故紙，昏天暗地且耗費數年的光陰。藏書家遇到殘缺不全的書籍，都希望能夠完整的補全，往往不辭辛勞、遍訪各家，或於雜書中拾遺補缺，使無數珍本能夠破鏡重圓，完美再現。²²⁴

翁方綱不謹勤於讀書，也喜歡著述。這也是藏書家利用藏書的方式之一，據《清史稿》載：

方綱讀羣經，有《書》、《禮》、《論語》、《孟子附記》，並為《經義考補正》。尤精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考證至精。所為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論者謂能以學為詩。他著有《復初齋全集》及《禮經目次》、《蘇詩補注》等。²²⁵

²²³ 王和平、趙繼龍、李俊芳，〈我國古代藏書家的優良特質及其卓越貢獻〉（《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08年第12期），頁145。

²²⁴ 鄧宏峰，〈中國古代藏書家保存與傳播文化典儀的貢獻〉（《安陽工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頁37。

²²⁵ 清·趙爾巽，《清史稿》，卷485·列傳272，〈文苑二〉，頁13359。

此外，翁方綱享高壽，而性耽吟詠，隨時隨地，無不有詩，而一生所作詩，更是多至六千餘篇，²²⁶不難想見藏書對其詩文創作的貢獻之鉅。總之，藏書家時常會透過著述來表達自己的心境，發表讀書心得或學術創見，希望透過著述流傳個人的思想，以饗同好。

第四節 藏書的流通

一般而言，藏書的流通是指藏書家將自己收藏的典籍、圖書在社會和歷史間的傳播。在歷史上，藏書的流通主要有借讀、借抄、借校、翻刻與捐贈等多種形式。²²⁷藏書家活動頻繁，共同的愛好和居住的相對集中，都會促使藏書家們喜歡彼此往來，這點同樣也反映在翁方綱身上。

在當時，書籍的刊刻、流通條件等的限制，即使有錢，也未必能夠購得書籍。因此，藏書家會透過彼此互相借抄來收集、補足圖書。翁方綱交友廣闊，其好友之中，有不少人都是藏書家。因此，透過與好友的郊遊，來進行書籍的借抄、借讀等來進行藏書的流通，如：「馮子伯（馮敏昌）求篤嗜《迪功詩》，欲予合輯而論次之。適從時帆（法式善）齋中借《迪功集》并談藝錄。」²²⁸翁方綱弟子馮敏昌很喜歡《迪功詩》，希望能夠一起來討論，當時翁方綱便從另一位弟子法式善的書齋借出《迪功集》來一同討論。

好友盧文弨，一生熱愛校勘書籍，這點也非常受到翁方綱的尊敬，在〈送盧抱經南歸序〉中說：「君所校正書目甚繁。予初成進士時喜讀遷（司馬遷，前 145-前

²²⁶ 王軍偉，〈經學背景下的肌理說〉（《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4 期），頁 25。

²²⁷ 徐雁，〈中國歷史藏書重要術語詮釋〉，頁 56。

²²⁸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8，〈徐昌穀詩論二〉，頁 14 下。

86)、固(班固, 32-92)之書, 則借君所校三史錄之。甲戌(乾隆 19 年)授館職後, 借所校《文選》錄之。」²²⁹翁方綱喜歡讀司馬遷、班固之書, 於是借盧文弨所校三史, 之後再次借《文選》來進行抄錄。

除了書籍之外, 翁方綱也喜愛金石, 特別是碑拓。翁方綱曾說:「癸丑(58 年, 1793)冬, 始獲見宋商邱(宋瑩)所收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陳伯恭(陳崇本)侍讀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 撫搨五日而還之。」²³⁰因為喜愛此廟碑, 而特地去向陳崇本借此碑, 在自家「寶蘇齋」中的窗旁仔細賞玩, 甚至將它摩搨後再還給陳崇本, 而摩搨之本, 則入自己的「寶蘇齋」中妥為度藏, 可見翁方綱對此碑的喜愛。而每當翁方綱向朋友借到書籍後, 往往欣喜若狂, 這在他與陳焯書信可以看出:「無軒(陳焯)先生大兄足下: 昨奉書後, 即得從友人處借讀張芑堂(張燕昌, 1738-1814)所刻《金石契》二冊, 甚古雅, 敬望吾兄為謀致一本, 感切感切。」²³¹可見每此借得珍本, 他就會感到非常開心, 這就是愛書、癡書的一種表現方式, 也是一對典型的藏書家。

除向人借書之外, 藏書家有時也會將自家所藏、所刻之書送給他人。在 17 世紀前期的朝鮮, 當時統治者仍雅尚明儒, 推崇朱子學, 以致因空談性理, 脫離現實, 導致黨爭殺戮。到了 17 世紀中葉至 18 世紀前期, 高麗士大夫才開始反思性理學的弊病, 也開始主張經世致用, 高舉實學, 改革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問題。²³²例如當時旅居中國的朝鮮學者金正喜(1786-1856)在北京已經接觸到很多的中國學者, 其中金正喜最常稱頌的就是翁方綱和阮元師徒。尤其是翁方綱豐富的著作, 諸如:《經義考補正》、《蘇齋筆記》等, 都使金正喜大為嘆服。同時, 受到翁方綱藏書活動的薰陶感染, 金正喜回國後, 除了和翁方綱、阮元保持頻繁的書信往來, 進行學術交流以外, 也有書籍的流通互贈。翁方綱和他透過學問和書籍作為媒介, 進行超越國界的學術交流。²³³翁方綱曾經把自己新刻的圖書, 寄送給金正喜, 也曾

²²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12,〈送盧抱經南歸序〉,頁 1 上-下。

²³⁰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20,〈跋嶽廟碑〉,頁 15 上。


²³¹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稿》,〈致陳焯〉,頁 351。

²³² 何繼文,〈翁方綱在詩歌批評方面對金正喜的影響〉,頁 332。

²³³ 琴知雅,〈翁方綱的詩學及「學術詩」〉(《曲靖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第 2 期),頁 2。

經請求金正喜在韓國幫助搜求國內不見之書。由此可以看出，翁方綱是非常喜愛收藏書籍的，而金正喜不但是他的學生，還兼他的書友，兩人的書事交誼，成為中韓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²³⁴

觀此，中國古代的藏書家，幾乎都有借抄或贈送。正是因為古代的通訊、交通都不是非常發達。因此，藏書家們或親自動手，或雇人代勞，或抄自官府，或源自私家。不僅是從別人處抄寫，而且也允許自己的藏書為別人抄錄，進而互惠互抄。²³⁵或許，藏書家之所以進行書籍的流通，只是很單純想要增加自己的藏書數量，這樣如此單純的動機。但也正是因藏書家對於藏書有特殊的癖好，使得染有此癖好的人把自己的興趣、精力、感情、錢財能夠毫不吝嗇地奉獻給那些在外行人看來是冷冰冰的書籍。藏書家對於書籍的珍貴之情，時常會超過書籍本身所能表示的真正價值。²³⁶



第五節 翁氏藏書對推動學術文化的影響

乾隆時期，雖然社會穩定、政治統一，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卻呈現出官方理學的獨尊與僵化，而民間尤其是以江浙為核心的江南地區，則開始盛行經學、考據之學，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官私、南北思想，乃至朝廷與民間儒士之間的巨大分歧。為了解決這種分歧，清廷決定借助編纂《四庫全書》，來重新梳理知識資源，更是重建新的價值體系、學術氛圍，為中央、地方的儒士階層確立全新的學術思想發展模式。²³⁷於是一時之間，朝野上下呈現出一片熱衷於《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的熱鬧景

²³⁴ 文炳贊，〈朝鮮時代的韓國以及清儒學術交流—以阮堂金正喜為主〉（《船山學刊》，2011年第1期），頁179-180。

²³⁵ 鄧雪峰，〈古代私人藏書與藏書家之貢獻〉（《前沿》，2008年第10期），頁191。

²³⁶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頁22。

²³⁷ 姜海軍，〈清中期南北學術的分立、一統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2期），頁18。

像，與圖書相關的學問也隨之大行其道，同時促使藏書風氣更加充斥於士庶的日常生活當中。

一、《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是目前存留下來的《四庫全書提要》之中，內容頗為豐富的一部手稿。²³⁸由於翁方綱生平精研經術，博學宏覽，尤長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故能夠對群籍敘錄之撰寫，作出較為精確詳實且具學術參考價值的偉大貢獻。乾隆 38 年，詔開「四庫全書館」，翁方綱獲薦為纂修，負責校辦各省進呈書籍。²³⁹自此，翁方綱在四庫館中，先後與一些當時著名的學者，如：朱筠、錢大昕、孔廣森、桂馥、陳焯……等人時相討論，校辦群籍。²⁴⁰當時擔任《四庫全書》編纂並撰寫提要的纂修官達數十人之多，但是，只有少數幾個人的提要得以被保存下來，而其中翁方綱的《四庫全書提要稿》更多達 1000 多篇被保存了下來，²⁴¹足證翁方綱撰寫提要的深邃功力，確實為各界所推崇。其實，翁方綱在參與編纂《四庫全書》之時，即相當重視各書的序跋，認為序跋可以展現或概括《四庫全書》的主旨，是體現學術流變的一項重要訊息。因此，一旦遇到所校辦書籍中的序跋時間與前人著錄的時間不一致時，翁方綱便會仔細地加以考訂，²⁴²力求精確。乾隆帝將徵集到的圖書交給「四庫全書館」檢查，而分纂官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嚴格審查

²³⁸ 黃博，〈謹小慎微與膽大妄為：高壓政策下的文人行為—翁纂四庫提要稿《瀕川集》之存廢問題探微〉（《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第 2 期），頁 61。

²³⁹ 李孟晉，〈讀〈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續紹〉（《書目季刊》，第 40 卷第 3 期，2006 年 12 月），頁 35。

²⁴⁰ 曾紀剛，〈同聲與異響：翁方綱四庫提要稿與《四庫全書總目》集部提要較論〉（《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19 期，2008 年 4 月），頁 2。

²⁴¹ 鄭駿捷，〈《四庫全書》在澳門〉（《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頁 20。

²⁴² 清·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 1 版），頁 4。

圖書的內容，針對每冊圖書進行分類處理，舉凡涉嫌違礙或悖逆專制政權的書籍，進行部分抽毀、全部銷毀，或是不予收錄、僅存其目等處理方式。所以，翁方綱在提要稿中明確地註明了「應刊」、「應抄」、「應存」或「不應存目」等類別。²⁴³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為翁方綱於乾隆 40 年前後參與《四庫全書》編纂時，所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底稿。其收書約 1154 種，現在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其中經部約 200 種，史部書約 256 種，子部書約 200 種，集部書約 484 種，以及叢部書 10 種。²⁴⁴據《翁氏家事略記》記載：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月，大學士劉（劉墉）等奏：「原任學士降調候補之翁方綱，留心典籍，見聞頗廣，請充補四庫全書纂修官。」²⁴⁵

劉墉的建議旋即獲得朝廷的批准，於是翁方綱在收到任命之後，便立刻奉旨赴任，辦理《四庫全書》的編輯工作。《翁氏家事略記》又載：

三月十八日，入院修書。九月二十五日，奉旨：「翁方綱學問尚優，且曾任學士，著加恩授為翰林院編修。」十月初三日到編修任，是年冬，移居爛麵胡同。²⁴⁶

乾隆 38 年 3 月 18 日，翁方綱奉旨入翰林院修《四庫全書》，遂參與「四庫全書館」之役，並要求翰林諸臣取院中所儲明嘉靖間重錄之《永樂大典》，分類編輯。《翁氏家事略記》又載：

自癸巳春入院修書，時於翰林院署開「四庫全書館」，以內府所藏書發出到院及各省所進民間藏書；又院中舊儲《永樂大典》，日有摘抄成卷、匯編成

²⁴³ 史志龍，〈從《翁方綱四庫提要稿》看「不應存目」書籍之標準〉（《山東圖書館學刊》，2014 年第 4 期），頁 106。

²⁴⁴ 樂怡，〈翁方綱纂《提要稿》與《四庫提要》之比較研究〉（《圖書館雜誌》，2006 年 4 期），頁 74。

²⁴⁵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 35 下。

²⁴⁶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 35 下-36 上。

部之書，合三處書籍，分員校勘。每日清晨入院，院設大櫥，供給桌飯；午後歸寓，以是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處，在寶善亭與同修程魚門（程晉芳，1718-1784）、姚姬川（姚鼐）、任幼植（任大椿，1738-1789）諸人對案，詳舉所知，各開應考證之書目，是午，攜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是時，江浙書賈亦皆踴躍，遍徵善本足資考訂者，悉聚於五柳居、文粹堂諸坊舍，每日檢有應用者，輒載滿車以歸家中，請陸鎮堂司其事。凡有足資考訂者，價不甚昂，即留買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寫其需查數條，或暫借留數日，或又僱人抄寫，以是日有所得。校勘之次，考訂金石，架收拓本，亦日漸增。²⁴⁷

當時朝廷舉辦「四庫全書館」的編纂工作，幾乎彙集了全國的一流人才，翁方綱在與將近百位的學者、藏書家、書畫家等一起編書，彼此交流專業知識，相得益彰，可以想見翁方綱等一知名學者一同纂修的盛況。此外，由上亦可得知，當時他們處理的圖書，從內府所藏一直到民間藏書，都是纂修的對象。至於纂修的時間，大致上都為固定的時間，大約是每日清晨入院纂修，一直到中午返家。並且與當時的文人、學者程晉芳等人，一同討論與進行纂修工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凡是價格不貴的書，即立刻出錢買下；若是無法買到的書，或者是急需查用之書，就先借閱幾天，僱人抄書，如此日積月累，所獲亦相當可觀。於校書之餘，也與尚述諸家一起考訂金石搨本，使得其家書架上法帖珍刻之拓本，數量變得越來越多。《翁氏家事略記》又載：

（乾隆）四十二年（1777）丁酉，時方綱承修《四庫全書》，又承修《明紀綱目》，又承修《音韻述微》，又承修《續通志》，又兼武英殿繕寫處覆校。是冬，辭武英殿分校、覆校事，仍在「四庫全書館」專辦金石、篆隸、音韻諸書。四十三年戊戌，《四庫全書》五年期滿，分等議敘，方綱列上等，奉旨加一級。五月，充殿試彌封官。²⁴⁸

²⁴⁷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36下-37上。

²⁴⁸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37下-38下。

由上可以得知，翁方綱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的工作，實際上是始於乾隆 38 年。至乾隆 46 年，翁方綱奉旨任國子監司業，不久，又擢司經局洗馬，才離開「四庫全書館」，結束參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前後約 8 年的時間。在這 8 年內，翁方綱於編校《四庫全書》的工作可謂貢獻卓著，留下了一千多種圖書的提要、札記或案語等紀錄。²⁴⁹

在翁方綱編纂《四庫全書》的 8 年當中，自乾隆 38 年 5 月至乾隆 41 年 10 月，翁方綱主要是辦理採進書及內府本的審校工作。到了乾隆 41 年 10 月 12 日，又兼任武英殿繕寫《四庫全書》分校官。乾隆 42 年冬，他辭去武英殿分校、覆校的工作。所以，《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寫作內容及對象，主要便包含了兩方面的書籍：一為初辦之書，也就是「四庫全書館」首先分派給各纂修官辦理之書籍，由各纂修官擬寫提要，並且初步處理相關意見或問題，這個就是翁方綱擔任「四庫全書館」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的主要工作。另一種為分校之書，也就是「四庫全書館」所擬定的「應抄」、「應刊」之書，在發抄、刊印之前，需要再一次的校刊，而這是翁方綱擔任武英殿分校官以及覆校官的主要工作。²⁵⁰更進一步地說明，翁方綱首先是將書籍的序跋、目錄過錄，少的為二、三紙，多的則有十餘紙。其次是根據自己的判斷，提出書籍的取捨及分類意見，這當中包含了刊、抄、存、毀等四類。第三，若是「應存」、「應抄」、「應刊」之書，一般要寫簡單的提要。有時，翁方綱還會再對原書進行校勘，並為如何抄書提出說明。²⁵¹

二、靈隱書藏

²⁴⁹ 張昇，《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1（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頁 8-9。

²⁵⁰ 張昇，〈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構成與寫作〉（《文獻》，2009 年第 1 期），頁 158-159。

²⁵¹ 段惠子，《翁方綱著作研究-以經學、金石學、書學為中心》，頁 36。

翁方綱晚年另一項值得注意的學術活動，就是他與好友阮元共同倡建了膾炙人口的杭州「靈隱書藏」。「靈隱書藏」的籌建，源自於阮元刊刻翁方綱、朱筠等人的詩文集，而就在續刻《復初齋詩集》時，阮元萌生了籌建藏書與藏書樓，並將《復初齋詩集》度藏其中的想法。²⁵²

關於籌建「靈隱書藏」，阮元在所撰〈杭州靈隱書藏記〉一文說道：

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翁方綱）先生、法時帆先生（法式善，1752-1813）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於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石韞玉，1755-1837），曰：「《復初齋集》刻成，為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阮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寬閒遠避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尚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哀之，其為藏也大矣！」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厨，以唐人「鷲嶺鬱岿峩」詩字編為號，²⁵³選「雲林寺」玉峰、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藏書」。蓋緣使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²⁵⁴

「靈隱書藏」之設，始於清嘉慶 14 年，時阮元擔任浙江巡撫，為了推廣教育，思無窮之益，決定在杭州靈隱寺的「大悲閣」後建立書藏，取名「靈隱書藏」，提供學子們覽閱。此外，還大書「靈隱書藏」四字匾額，懸於閣楣，並慎重地制定了《入藏條例》9 則：

²⁵² 劉仲華，《漢宋之間：翁方綱學術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0 月第 1 版），頁 35-36。

²⁵³ 唐代詩人宋之問（約 656-712）有詩云：「鷲嶺鬱岿峩，龍宮隱寂寥。……當時，雖具以匡復為名，故人多護脫之。」請見：唐·駱賓王，《駱丞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106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卷末，〈右魯國鄒雲卿〉，頁 1-2 上下。

²⁵⁴ 清·阮元，《擘經室集·三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5 月第 1 版），卷 2，頁 616-617。

-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 二、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驚」字號廚，再收「嶺」字號廚。
- 三、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 四、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 五、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錠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為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 六、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 七、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缺之。
- 八、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為「後對」、「後天」二字。
- 九、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²⁵⁵

從以上阮元所訂定的入藏 9 則，可以看出當時的「靈隱書藏」已略為具備現代圖書館之部分性質，這在當時，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對於管理員（守藏僧）的規定與要求，以及閱覽規則，更是令人讚賞。

「靈隱書藏」設立後，各方均可將自己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贈與「書藏」，提供讀者們閱覽。阮元在《靈隱置書藏記事》中有云：

《尚書》未百篇，《春秋》疑斷爛。列史志藝文，分卷本億萬。傳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書樓，難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與俗隔崖岸。岿巍靈隱峰，琳宮敞樓觀，共為藏書來，藏室特修建。學人苦著書，難殺竹青汗。若非見著錄，何必弄柔翰。舟車易遺亡，水火為患難。子孫重田園，棄此等塗炭。朋友諾黃金，文字任失竄。或以經覆瓿，或以詩投溷。當年無副本，佚後每長歎。豈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亂。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貫。逸民老田間，不見亦無悶，雖不待藏傳，得藏亦所願。我今立藏法，似定禪家案。諸友以書來，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廚，卷軸積無算。或有訪書人，伏閣細

²⁵⁵ 清·阮元，《擘經室集·三集》，卷 2，頁 617-618。

披看。古人好事心，試共後人論。既汎西湖舟，旋飽蔬筍飯。出寺夕陽殘，
鷺嶺風泉渙。²⁵⁶

阮元認為建造靈隱書藏一事，乃鑑於當時藏書樓雖多，卻是難聚而易散。其次，當時學人之著述，大多藏諸名山，若能盡得而藏之，誠乃阮元畢生所願，故而建立藏書閣於杭州靈隱寺，以達真正藏用圖書之良法美意。²⁵⁷

「靈隱書藏」最先入藏的圖書，就是翁方綱的《復初齋集》。²⁵⁸翁方綱識見廣博，且於金石、書畫、詞章之學，皆抉擿精審，剖析毫芒。其治經，亦與當時考據、訓詁諸家大異其趣，然其說頗多宏通之論、救弊之言，且著書滿家。²⁵⁹嚴格地說，「靈隱書藏」之建立，應該起源於翁方綱才是。因為前述翁方綱在得知其作《復初齋集》即將刻竣完工時，即致書予紫陽書院院長石韞玉，希望能夠為其置放一部於杭州的「靈隱寺」中，以供眾覽，²⁶⁰而後才引發阮元建立「靈隱書藏」的種種作為。

關於「靈隱書藏」的建立始末，翁方綱也曾經作了〈靈隱書藏歌〉一首以誌之，歌云：



靈隱書藏事孰始，始自杭刻朱翁詩。朱公未及藏記讀，阮公索我書之碑。我詩杭刻已深愧，緣此議藏能毋嗤。同人去夏集湖上，石子鑄我禪壁詞。全曰一集未盈筐，盍仿曹氏書倉為。遂啟佛閣廚七十，以備續度籤裝治。主以二僧編以例，匡廬白集寧聞茲。石子書來趣函寄，正我盥寫金經時。古稱大都與通邑，名山藏副於京師。名山名剎更增重，豈比家刻傳其私。苟非懸之免指摘，或且倍甚來瑕疵。往者新城王叟集，青藜劉君隸寫之。欲藏嵩少果踐否？林吉人楷名空馳。嗚呼寸心千古事，甚於鏡影公妍媸。念此徬徨汗浹背，

²⁵⁶ 清·阮元，《擘經室集·四集》，詩卷八，頁 889-890。

²⁵⁷ 許媛婷，〈論藏書與書藏〉（《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2002 年 12 月），頁 136。

²⁵⁸ 沈津，〈靈隱書藏與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28 卷第 1 期，1995 年 6 月），頁 116-117。

²⁵⁹ 陳鴻森，〈《翁方綱年譜》補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5 期，2004 年 9 月），頁 287。

²⁶⁰ 傅璇琮、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頁 117。

欲緘油素又屢遲。上有靈峯下湖水，鑒我樸拙心無欺。繼有哀函來寺者，何以助我加箴規。寫經微願那足補，日日齋被勤三思。²⁶¹

必須注意的是，「靈隱書藏」所收藏的圖籍內容相當豐富，並不限於佛教典籍而已。

「靈隱書藏」創立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輝映整個東南地區。當時文人學子們紛紛捐出自己的著作，以充實書藏。甚至當時一些名人名士的著述和手跡，也都被收藏於「靈隱書藏」內。阮元曾為法式善刊刻《存素堂詩集》，也收藏於「靈隱書藏」內。「靈隱書藏」在設立不久後，便與收藏《四庫全書》的七閣並駕齊驅。²⁶²

「靈隱書藏」雖仍然是偏重於保存，但也為學人的閱讀提供了方便，對於推動當時文化的傳播和學術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讓人感到比較可惜的是，「靈隱書藏」不幸燬於咸豐 10 年（1860）太平天國的戰火之中。雖然在此之後，不斷有許多熱心的人士們希望能夠重建，但是卻因為諸多的原因而未能如願，實為蟬林之一大憾事。²⁶³



²⁶¹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63，〈靈隱書藏歌〉，頁 2。

²⁶² 葉憲允，〈清代「靈隱書藏」及其影響〉，頁 74-76。

²⁶³ 陳東輝，〈杭州靈隱書藏述要〉（《中國典籍與文化》，1994 年第 2 期），頁 55。

第六章 結論

私家藏書是中國藏書活動中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大量的私家藏書家通過藏書活動的保存和傳承了大量的古籍文獻，促使學問文化的發展，有助於形成藏書與讀書的風氣。²⁶⁴

相較於明代，清代的私家藏書不論是藏書的人數或是數量皆已超過從前，達到了鼎盛的時期。私家藏書家不論是收藏或是刊刻典籍，大多都是匯集世人罕見的秘本珍集，而且都帶有「前赴後繼」的色彩。藏書家們以自己對歷史典籍的極端熱愛與珍視，搜羅尋覓，抄刻並舉，孜孜以求，勤奮執著地努力實現自己的追求，不遺餘力地推進私家藏書事業的發展。²⁶⁵吳晗先生（1909-1969）就曾說過私家藏書為「有裨於時代文化、鄉邦徵獻，士大夫學者之博古篤學者，至大且鉅。」²⁶⁶

清代乾嘉時期藏書事業的繁榮有目共睹，它歸功於幾個因素：首先，它繼承了明代本來就已經豐富的藏書遺產。這樣的繼承，一種是來自直接的家傳；另一種則是間接的轉手收購。其二，清代的印刷出版事業空前發達，自康熙時期起，在清宮就設置了龐大的印刷機構「武英殿修書處」。此外，坊刻和家刻也更加興盛，書籍因而成為了大量的商品，只要有聚書的愛好，攜金赴市，萬卷可立致，頓成藏書之家。²⁶⁷

其三，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經歷漢、晉、唐、宋、元、明等朝代的發展，有著近二千年的歷史。到了清代，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並且形成了濃厚的藏書風氣，因而湧現出眾多數代相聚相傳的藏書世家。此外，乾隆年間進行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向全國徵集了大批的私家藏書，對於呈獻五百種之多的鮑士恭（1750-？）、范懋柱（1721-1780）、汪啓淑（1728-1800）、馬裕等四家的藏書家，各賞以《古

²⁶⁴ 吳倩，《清代私家藏書群體研究》（保定：河北大學管理學碩士論文，2012年5月），頁36。

²⁶⁵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299。

²⁶⁶ 吳晗，《浙江藏書家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月第1版），頁1-2。

²⁶⁷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頁269-270。

今圖書集成》一部；而對呈獻一百種以上之九子家，則賞賜《佩文韻府》各一部。如此一來，人們便知多藏為榮，這無疑又推動著清代私家藏書風氣的擴展。²⁶⁸

在經歷過明末的社會動盪，清朝逐步取得了國家統一和政治上的穩定。同時，社會經濟的繁榮又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為清代的私家藏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²⁶⁹因此，清朝的藏書文化，可說與當時的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文化方面：藏書可以看做一種文化的活動，歷代統治者的文化政策對藏書活動發展，通常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明示或是潛在的影響存在。如果統治者實行較為開明的文化政策，便可促進私家藏書的發展；反之，若是對藏書本身或是藏書主體進行破壞性的打擊，那麼就會嚴重阻礙私家藏書的成長。²⁷⁰滿清統治者在政治、軍事統治的同一時間，也十分注重思想與文化的統治。例如滿清入主中原後，在教育、科舉制度等各方面，基本上沿襲了明代，即所謂「在清學校，向延明制」，²⁷¹也就是中央仍然設立國子監，地方上的府、州、縣，也都開辦設有儒學，延聘教官，招收生員。

康熙時期，由於康熙皇帝自幼便喜愛讀書，博雅好學，史稱：「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²⁷²因此，康熙皇帝當時就已經認知到，圖書將會在社會治理中扮演著重要且有著巨大作用的角色。

藏書風氣往往會與當時的統治者在文化方面的政策，具有密切的關聯性。而私家藏書推崇、珍惜版本，也是歷代藏書家的普遍風氣之一，自明清以來，私家藏書

²⁶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頁210。

²⁶⁹ 陽祖達，〈清初私家藏書的時代特徵〉（《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年第3期），頁106。

²⁷⁰ 古艷敏，《清初私人藏書群體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5月），頁16-17。

²⁷¹ 清·趙爾巽，《清史稿》，卷160·志81，〈選舉一·學校一〉，頁3099。

²⁷² 清·實錄館，《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6月第1版），頁910。

家們尤其以收藏宋元版本的書籍為榮。加上隨著清代乾嘉考據學的興起，這種以收藏宋元版本的書籍為榮的風氣，在清代達到了頂峰。隨著社會風氣逐漸開明，私家藏書的收藏風氣也有了趨向多元文化的樣貌。²⁷³

(二)、經濟方面：經濟環境對私家藏書主要會有兩方面的影響，其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會有更多有著經濟能力的人加入到藏書家的隊伍來。其二就是商品經濟發達，促使書籍的流通，為藏書者提供了更多的收藏來源。²⁷⁴

社會經濟的發展好壞，會使私家藏書的藏書風氣間接或是直接受到影響。清朝政府為了使經濟快速回復，穩定的發展，實施了不同的經濟方面政策，特別是到了康熙至乾隆年間的一百年來更是清代的鼎盛時期，社會趨近穩定、經濟也繁榮、百業更是興旺，使得私家藏書事業也迎來了最為繁榮、發達且普遍的時期。²⁷⁵

清代私家藏書家人數眾多，遍及社會的各個階層，且在地域的分布上比起從前也較普遍，遍及全國各地的藏書網路。隨著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私家藏書的觀念也逐漸出現了變化，有些藏書家開始意識到藏書對外流通的重要性。因此，當一位藏書家除了自己去徵集圖書之外，也會透過人與人之間，如：師承、友朋等的關係，與這些文人雅士之間的交流，對藏書來進行利用、流通，以供人閱讀。這種思想觀念無疑對推動文化傳播，造就人才，皆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此外，清代的私家藏書家除了收藏明代或當代的典籍之外，還特別注意宋、元版本的收藏。此風在明代以後已經可見端倪。²⁷⁶

到了清代，特別是乾嘉時期，隨著考據學的興起，此風越演越烈，達到了頂峰時期。考據學既是一種求真像的學術，又必須要有充分的證據，則收集資料，尋找證據就會成為考據工作中最主要的部分，所以許多考據學家本身就是藏書家，而藏

²⁷³ 季玲，《論晚清藏書樓》（清寧：曲阜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4月），頁6-7。

²⁷⁴ 古艷敏，《清初私人藏書群體研究》，頁17。

²⁷⁵ 曹曉帆，〈清代蘇州萬卷藏書家的刻書活動及其功績〉（《新世紀圖書館》，2006年第3期），頁69。

²⁷⁶ 謝彥卯，〈論清代私人藏書〉，頁108-109。

書家隊考據學的貢獻，可以分為幾點：首先為提供罕見書籍，以供學者利用；再者是刊布罕見善本，以廣學者利用；最後則是刺激印刷事業的興盛。到了清代，始由於家刻本的興起而逐漸沒落，出版業會與藏書家集中於同一個地區，自然有著互相供需的關係。此外，藏書家的精心校勘過的書，其價值有時會超過真宋本，為學者爭相購藏的對象，這是在前代未形成考據學風時所沒有的特色。²⁷⁷

藏書家們講究版本，精於校勘，身處在這個時代的翁方綱，受到此學風的影響，也喜愛考據，每遇書籍便會對其進行考據，然而翁方綱曾感嘆的說：

然吾所最憾者，每書載其原序，而於序尾之年月反多刪去，將使觀者何由而得其師承之所自乎？何由而參驗其沿革同異乎？²⁷⁸

或許是因為書籍古老，有所缺頁，也或許是本來就未刊刻上，翁方綱感嘆每本書籍的原序的序尾日期反而都被刪去，這點令他感到可惜。但也就因為如此，文人們會以文會友、飲酒賦詩、結聚論學，謂為時代的風氣。翁方綱與藏書家朋友間，會因為校書、訪書、賞鑒、提跋等藏書事業方面的問題，向朋友來互相將書籍借讀、借抄、借校，以資考據。舉凡不定時的舉辦讀書會，或是飲酒會來彼此相聚等，透過以上幾種的「文會交流」的方式，進而讓自己所藏之書質量逐漸增高，並為後人所重視。

總之，因為清代乾嘉時期的經濟繁榮與文化思想的進步，於是形成私家藏書事業的鼎盛，而藏書活動無形中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繁華，並且豐富了人們的生活文化與思想，兩者之間可以說是互相影響。翁方綱身為當時的藏書家，他好交遊，藏書家在他的廣大交友圈中，也佔了很大一部份，誠如前文所述，藏書家之間往往會為了購書、訪書或是互相討論校書，甚至炫耀自己的所藏之書，而會去和其他藏書家進行交流。除了早就已經認識的朋友之外，透過朋友的介紹再去認識其他的藏書

²⁷⁷ 趙飛鵬，《楊守敬之藏書及其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5月），頁19-21。

²⁷⁸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7，〈攷訂論上之一〉，頁7下。

家，又或者是自己當起橋樑的角色去介紹自己的朋友給他人認識等，逐漸去擴大自己的藏書社群。藏書家很多都是如此，因為想要增加自己的藏書數量或是為了校勘自己的藏書，透過這樣的藝文交遊或是社群生活等方式來進行藏書的活動，藉此來滿足自己的求知慾。

翁方綱廣為購書、搜羅抄錄、校書不輟，並且插架萬卷，筆耕不輟、刊刻典籍，以溉後人。他保存和傳播了許多典籍，不論是他的書法、藏書，以及著述，等，給後人留下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以上種種皆是翁方綱的藏書事業的文化貢獻。他藏書豐富，但是至今仍乏人探索，筆者冀望透過本文的研究，讓讀者可以了解，翁方綱除了活躍於金石、書法外，他的藏書事業也是可圈可點，藉此能夠更加認識翁方綱的為人、社群特徵與交往、藏書收藏的特色與心境、藏書活動與生活文化之內涵，以及藏書事業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與貢獻，並從中體會翁方綱所想要表達的藏書精神，相信可以為中國古代圖書事業的發展史，再添新的一頁。





附錄

附錄一：國家圖書館典藏：宋·郭忠恕，《佩觿》（內含翁方綱手書題記）。²⁷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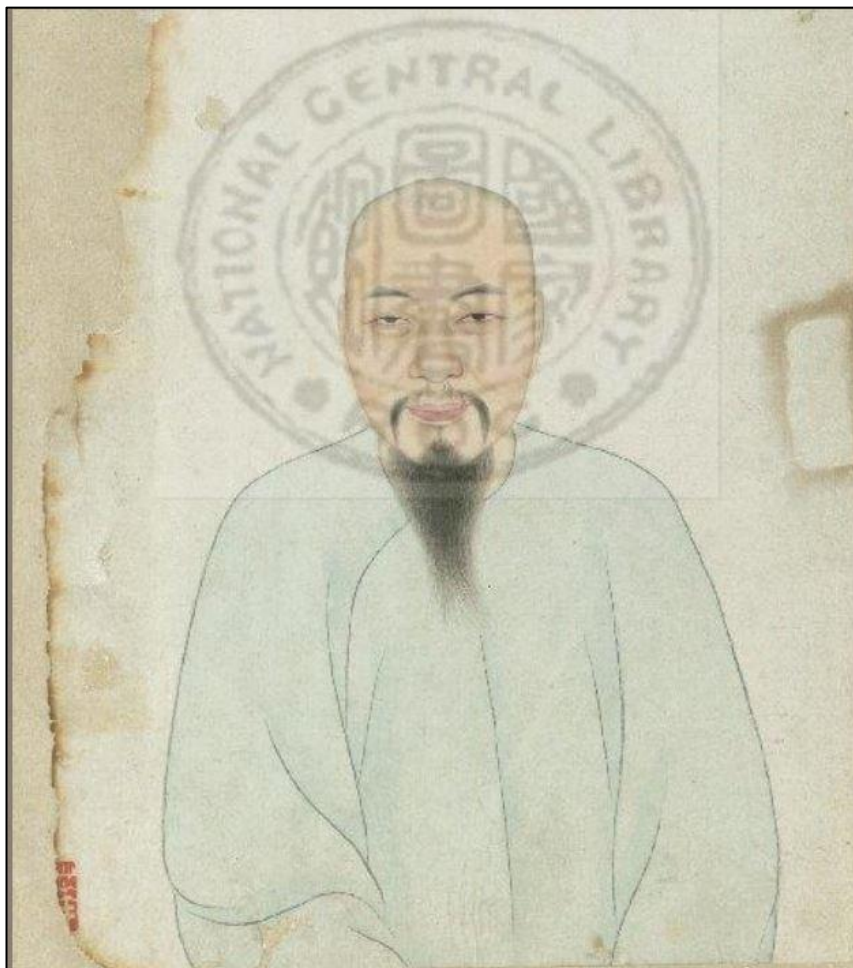


²⁷⁹ 宋·郭忠恕，《佩觿》，「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資源古籍影像檢索系統」，檢索於2019年6月20日，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ea0e239d1f0a4ce19b538f3d1957cb2efDQyOTY30&image=1&page=&whereString=IEBEZXNjcmlwdGlvb19Db2xvcGhvb1Ai5pa557axLiA1&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j6TnsY3l1bHlg4_mqqLntKLos4fmlplnuqsi0&sourceID=&SourceID=。

解或可也其亦與此以自宜若以備致者也其以會神時故
柳論世其作是言其六漢初指唐以換致事其然其根
漸之作字之年始至如唐人碑帖俱神依息皆以入之字而
不字與說文之每字必則字皆者同也法至近日支竹叔點
重一書概皆附及法而若錄也其碑說、於漢隸字法以全
羅君有萬、於之書皆盡數千百言非徒學、動也、古
保既釋其言、要者逐解於法、同為畫片、其言、不可概
便如此在論於其前其後四、二年、其法所以成、二月、十一月、
清國校理翰林院編修、北平、翁、古、綱、

附錄二：國家圖書館典藏：宋·蘇軾，《註東坡先生詩》

（內含翁方綱四十小像）。²⁸⁰



²⁸⁰ 宋·蘇軾，《註東坡先生詩》，「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資源古籍影像檢索系統」，檢索於 2019 年 6 月 20 日，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38eb1789060d47048d72d1fb2806bb78fDQ1Mzg50&page=&whereString=IEBUaXRzZV9NYWluICLmnbHlnaEiIA2&sourceWhereString=ICYgQH NvdXJjZV9zb3VyY2UgICLj6TnsY3lvbHlg4_mqqLntKLos4fmlpnlusi0&SourceID=1&HasImage=。

附錄三：翁方綱藏書印。²⁸¹



²⁸¹ 林申清，《明清藏書家印鑑》（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10月第1版），頁95。

附錄四：翁方綱藏書社群成員知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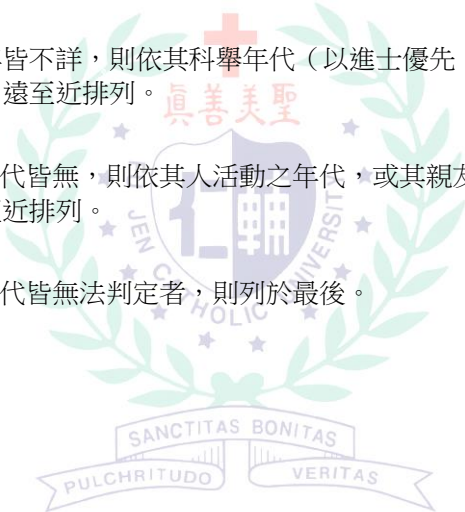
編號	姓名	社會關係	資料來源（僅舉一種為例）
1.	翁麴標 (1656-1708)	祖孫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6，〈先大夫文藁冊尾記〉，頁16上。
2.	何焯 (1661-1722)	友朋	清·李放纂輯，《皇清書史》，卷13，〈何焯〉，頁6上。
3.	黃叔琳 (1672-1738)	師承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67，〈書何端簡公然燈紀聞後二首〉，頁15上。
4.	朱筠 (1729-1781)	姻親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14，〈戊戌八月十三日為大兒聘朱氏女婚啟〉，頁19下-20上。
5.	孔繼涵 (1739-1783)	友朋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卷8，〈孔先生繼涵〉，頁38下。
6.	程晉芳 (1718-1784)	友朋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15，〈同學二首贈魚門別〉，頁13上。
7.	嚴長明 (1731-1787)	友朋	清·嚴長明，《官閣消寒集》，序，頁1上。
8.	錢載 (1708-1793)	友朋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4，〈籀石齋詩鈔序〉，頁18上。
9.	盧文弨 (1717-1796)	友朋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24，〈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抱經先生盧公墓誌銘〉，頁2上。
10.	畢沅 (1730-1797)	友朋	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卷35，〈歸航詩，次翁宮詹覃谿韻〉，頁3下-4上。
11.	謝啟昆 (1737-1802)	師承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4，〈謝蘊山詩序〉，頁8上。
12.	錢大昕 (1728-1804)	友朋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26，〈書洪文敏瑞麻贊石本後〉，頁4下-5上。
13.	桂馥 (1736-1805)	友朋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49，〈送未谷任永平令〉，頁4。

14.	紀昀 (1724-1805)	友朋	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 68，頁 39 下。
15.	王昶 (1724-1806)	友朋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19，〈送王述庵大理假歸青浦二首〉，頁 3 上。
16.	丁杰 (1738-1807)	友朋	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 68，頁 5548。
17.	洪亮吉 (1746-1809)	友朋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卷 1，頁 12 下。
18.	凌廷堪 (1757-1809)	師承	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 6·皖派經學家列傳，〈凌廷堪〉，頁 160。
19.	廣順	師承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3，〈陶廬雜錄序〉，頁 16 上-下。
20.	法式善 (1753-1813)	師承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3，〈陶廬雜錄序〉，頁 16 上-下。
21.	吳騫 (1733-1813)	友朋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11，〈致吳槎客〉，頁 6 下。
22.	姚鼐 (1731-1815)	友朋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頁 37 下。
23.	孫星衍 (1753-1818)	友朋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序〉，頁 1 上。
24.	姚文田 (1758-1827)	友朋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稿》，頁 3914。
25.	李宗瀚 (1770-1832)	師承	清·李放纂輯，《皇清書史》，卷 23，〈李宗瀚〉，頁 19 上-下。
26.	王引之 (1766-1834)	師承	清·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卷 3，〈翁覃溪閣學手札跋〉，頁 19 下-20 上。
27.	李彥章 (1794-1836)	師承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4，頁 26 下。
28.	石韞玉 (1756-1837)	友朋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 40，〈中秋夕東墅香亭鏡瀾金門琢堂集話湘舫殿撰環翠書舍〉，頁 5 下。
29.	吳榮光 (1773-1843)	友朋	清·梁章鉅，《退菴金石書畫跋》，序，頁 1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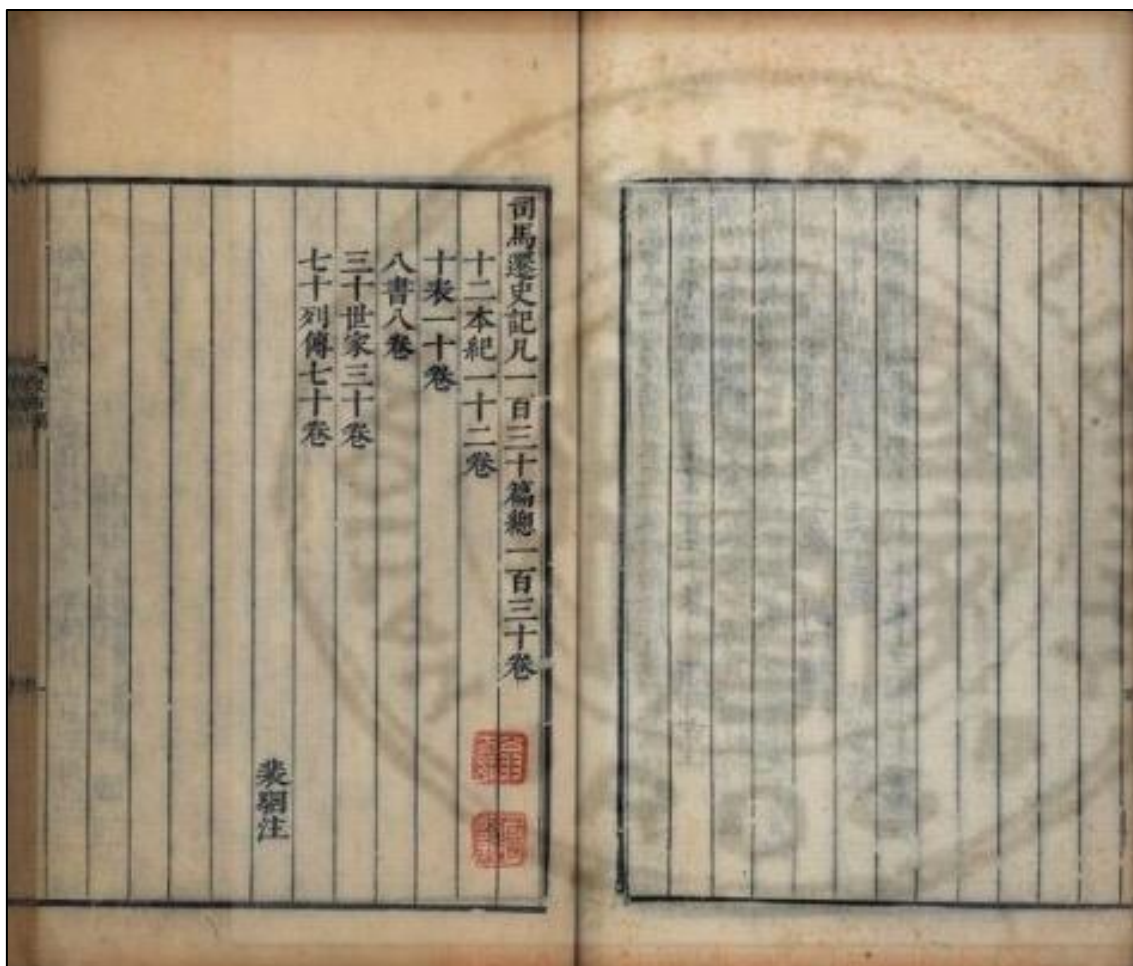
30.	梁章鉅 (1775-1849)	師承	清·梁章鉅，《退菴詩存》，卷7， 〈展上己日邀雲芬子彥同觀宋四家天 冠山詩畫合卷留飲小齋疊前韻〉，頁 17下。
31.	阮元 (1764-1849)	友朋	清·浚廷堪，《校禮堂文集》，卷 22，〈上洗馬翁潭溪師書〉，頁196。

說明：

- 一：本表是為了方便第四章「翁方綱社群關係的解析」之參照而製。
- 二：本表按藏書家之卒年，由遠至近依序排列。
- 三：若藏書家之卒年不詳，則依生年由遠至近排列。
- 四：若藏書家之生卒年皆不詳，則依其科舉年代（以進士優先，而後舉人、監生、貢生、生員、薦舉等）由遠至近排列。
- 五：若生卒年、科舉年代皆無，則依其人活動之年代，或其親友、同時代人之生存年代約略加以判定，由遠至近排列。
- 六：其生卒年、生存年代皆無法判定者，則列於最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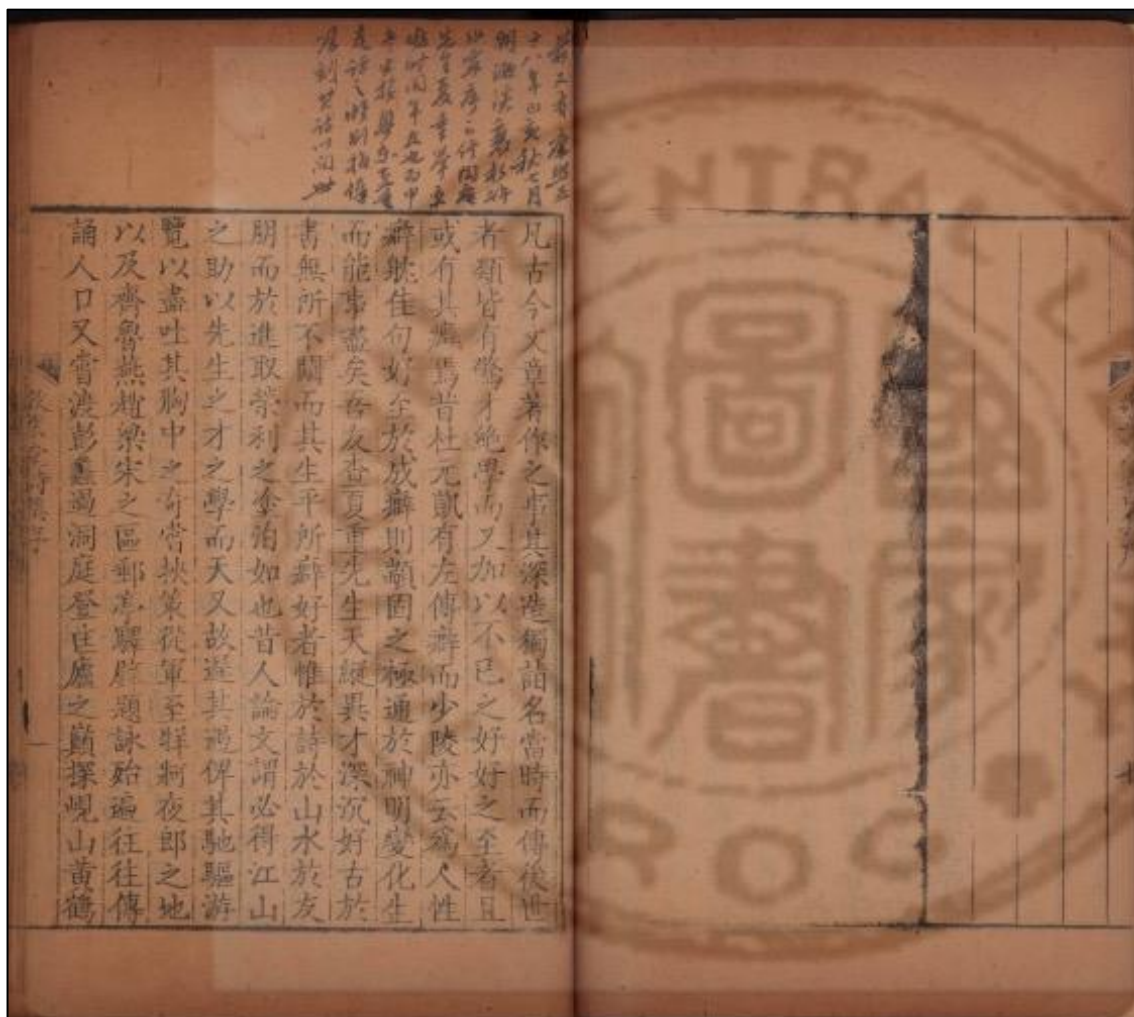
附錄五：國家圖書館典藏：漢·司馬遷，《史記》（內含翁
方綱藏書印、手書題記）。²⁸²



²⁸² 漢·司馬遷，《史記》，「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資源古籍影像檢索系統」，檢索於 2019 年 7 月 6 日，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c01496060b41493bbb62755d369d44d1fDQzMz>
[M50&page=&whereString=IEBEZXNjcmlwdGlvbl9Db2xvcGhvbiAi57-](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c01496060b41493bbb62755d369d44d1fDQzMz)
[B5pa557axIiA1&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j6TnsY3lvbHlg4_mqqL](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c01496060b41493bbb62755d369d44d1fDQzMz)
[ntKLos4fmlpnlusi0&SourceID=1&HasImage=](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c01496060b41493bbb62755d369d44d1fDQzMz)。

附錄六：國家圖書館典藏：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

（內含翁方綱手書題記）。²⁸³



²⁸³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資源古籍影像檢索系統」，檢索於2019年7月6日，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c64a244211eb40c0bf89176bbab1b35afDQ3ODM10&page=&whereString=IEBEZXNjcmlwdGlvb19Db2xvcGhvbiAi57-B5pa557axliA1&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j6TnsY3lrbHlg4_mqQLntKLos4fmlpnlusqsi0&SourceID=1&HasImage=。

參考文獻

一、古籍史料

唐·駱賓王，《駱丞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106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

清·丁申，《武林藏書錄》，《叢書集成續編》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7 月臺 1 版。

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清代傳記叢刊》12，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

清·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民國 14 年羅氏鉛印高郵王氏遺書本影印。

清·石韞玉，《獨學廬三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出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寫刻獨學廬全稿本影印。

清·吳騫，《吳兔床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年 5 月第 1 版。

清·孫星衍，《芳茂山人詩錄》，《四部叢刊正編》8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11 月臺一版，據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景印。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 13 年（1887）吳縣靈芬閣集字版校本影印。

- 清·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初編》，《清代傳記叢刊》21-22，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
- 清·實錄館，《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6月第1版。
- 清·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2月第1版。
-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清代詩文彙編》3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 清·錢曾撰、丁瑜點校，《讀書敏求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 清·嚴榮，《述庵先生年譜》，《乾嘉名儒年譜》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 清·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4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嘉慶12年（1807）刻本影印。
- 清·江藩，《漢學師承記》，《清代傳記叢刊》1，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
- 清·吳榮光，《石雲山人集》，《清代詩文集彙編》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 清·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叢書集成續編》9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7月臺1版。
- 清·李放纂輯，《皇清書史》，《清代傳記叢刊》83-84，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

-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127-191，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
- 清·阮元，《學經室集·三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5月第1版。
- 清·周駿富，《清代疇人小傳》，《清代傳記叢刊》34，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
- 清·法式善，《陶廬雜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 11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北京圖書館藏嘉慶22年（1817）陳預刻本影印。
- 清·姚文田，《邃雅堂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道光元年（1821）江陰學使署刻本影印。
-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 17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光緒3年（1877）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影印。
-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第1版。
-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叢書集成新編》4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1月臺1版。
-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臺北：廣文書局，1987年12月再版。
-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清代傳記叢刊》5-7，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

- 清·浚廷堪，《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第1版。
- 清·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乾嘉名儒年譜》8，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初版。
-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稿》，《清代稿本百種彙刊》67，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8月初版。
-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54-14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清刻本影印。
- 清·國史館，《清史列傳》，《清代傳記叢刊》96-105，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
-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乾嘉名儒年譜》13，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 清·梁章鉅，《退菴金石書畫跋》，《石刻史料新編》第4輯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7月臺一版。
- 清·梁章鉅，《退菴詩存》，《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道光刻本影印。

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嘉慶 4 年（1799）畢氏經順堂刻本影印。

清·陶湘，《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清代傳記叢刊》32-33，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臺北：國家圖書館，2011 年 3 月第 1 版。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嘉慶 11 年（1806）刻本影印。

清·錢泳，《履園叢話》，《清代筆記小說大觀》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清·嚴長明，《官閣消寒集》，《叢書集成續編》116，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7 月臺 1 版。

二、專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7 月第 1 版，2725 頁。

王文錦，《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9 月第 1 版，518 頁。

王桂平，《清代江南藏書家刻書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 1 版，341 頁。

吳晗，《浙江藏書家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1 月第 1 版，234 頁。

- 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8月初版，552頁。
-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378頁。
- 金炫廷，《明人的鑑賞生活》，《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15-16，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初版，335頁。
- 林申清，《明清藏書家印鑑》，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10月第1版，210頁。
-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736頁。
-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487頁。
- 張升，《明清宮廷藏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10月第1版，303頁。
- 張光賓，《中華書法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4月初版，306頁。
- 張昇，《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542頁。
-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8月初版，215頁。
- 陳冠至，《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初版，251頁。

傅璇淙、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1384頁。

黃建國、高躍新，《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7月第1版，445頁。

劉大軍、喻爽爽、李雲，《中國私家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355頁。

劉仲華，《漢宋之間：翁方綱學術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472頁。

劉兆祐，《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文庫，2007年5月第1版，331頁。

劉佳，〈翁方綱的「尚蘇」情節〉，《詞學新視野：李清照辛棄疾暨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520頁。

劉薈，《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456頁。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清-現代》，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第1版，1787頁。

嚴文郁，《清儒略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6月第1版，427頁。

三、一般論文

丁春菊，〈桂馥與翁方綱交遊考論〉，《文史哲》，2014年第4期，頁136-168。

- 文炳贊，〈朝鮮時代的韓國以及清儒學術交流—以阮堂金正喜為主〉，《船山學刊》，2011年第1期，頁177-180。
- 王友勝，〈翁方綱與《蘇軾補注》〉，《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頁42-80。
- 王志勇，〈清代書院藏書的借閱制度考略〉，《齊魯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頁144-147。
- 王和平、趙繼龍、李俊芳，〈我國古代藏書家的優良特質及其卓越貢獻〉，《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08年第12期，頁144-147。
- 王建生，〈「肌理說」的意義〉，《中國文化月刊》，第221期，1998年8月，頁46-48。
- 王軍偉，〈經學背景下的肌理說〉，《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頁24-28。
-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4期，頁20-24。
- 王蕾，〈清代藏書思想研究現狀與思路〉，《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0年第6期，頁19-23。
- 史志龍，〈從《翁方綱四庫提要稿》看「不應存目」書籍之標準〉，《山東圖書館學刊》，2014年第4期，頁106-110。
- 任莉莉，〈試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與目錄版本校勘學〉，《圖書情報工作》，2011年第1期，頁137-141。
- 朱樂朋，〈翁方綱的金石考察活動〉，《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頁75-77。

- 何繼文，〈翁方綱在詩歌批評方面對金正喜的影響〉，《人文中文學報》，2015 年第 21 期，頁 331-362。
- 吳中勝，〈「肌理說」與翁方綱的詩學精神〉，《文學評論》，2011 年第 4 期，頁 181-188。
- 吳高歌，〈翁方綱、鄭石如、阮元書學觀念的比較〉，《中國書法》，2015 年第 19 期，頁 130-145。
- 李孟晉，〈讀〈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續貂〉，《書目季刊》，第 40 卷第 3 期，2006 年 12 月，頁 35-38。
- 李萬健，〈清代藏書家及其目錄〉，《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0 年第 1 期，頁 10-14。
- 沈津，〈靈隱書藏與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28 卷第 1 期，1995 年 6 月，頁 115-124。
- 周郁、蔡建國，〈晚清書院藏書圖書館化述論〉，《高校圖書館工作》，2008 年第 2 期，頁 58-60。
- 邱美瓊，〈由求同到證異：翁方綱對黃庭堅詩歌的接受〉，《江西社會科學》，2007 年第 10 期，頁 122-125。
- 金把路，〈韓國數位人文教育現狀與課題〉，《漢學研究通訊》，第 35 卷第 1 期，2016 年 2 月，頁 27-35。
- 金景芝、盧萌，〈「神韻說」的淵源〉，《集寧師專學報》，2010 年第 2 期，頁 18-22。
- 姜海軍，〈清中期南北學術的分立、一統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史學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頁 18-26。
- 孫守真，〈翁方綱書學思維探論－與阮元〈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等文作一較論〉，《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 22 期，2011 年 4 月，頁 115-139。

孫學堂，〈對「格調說」及幾個相近概念的省察〉，《求是學刊》2004年第3期，頁95-99。

徐凌志，〈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理念及措施〉，《文獻研究》，2006年第4期，頁58-59。

徐國能，〈翁方綱杜詩學探微〉，《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期，2006年7月，頁179-204。

徐雁，〈中國歷史藏書重要術語詮釋〉，《圖書情報知識》，1989年第1期，頁55-57。

徐壽芝，〈古代寺觀藏書及整理〉，《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3年第6期，頁93-95。

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山東圖書館季刊》，2004年第4期，頁39-53。

徐壽芝，〈古代官府藏書與利用〉，《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頁129-132。

徐壽芝，〈試論清代的公私藏書〉，《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頁127-131。

張昇，〈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構成與寫作〉，《文獻》，2009年第1期，頁158-168。

張娟，〈清代私家藏書對學術發展的影響〉，《呂梁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頁50-53。

張然，〈學人之詩與肌理說辨析〉，《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頁28-32。

曹曉帆，〈清代蘇州萬卷藏書家的刻書活動及其功績〉，《新世紀圖書館》，2006年 3 期，頁 69-71。

許媛婷，〈論藏書與書藏〉，《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2002 年 12 月，頁 129-148。

陳東輝，〈杭州靈隱的書藏與經藏〉，《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 年第 4 期，頁 127-129。

陳東輝，〈杭州靈隱書藏述要〉，《中國典籍與文化》，1994 年第 2 期，頁 53-56。

陳東輝，〈清代私家藏書與學術發展之互動關係〉，《文獻》，2003 年第 4 期，頁 189-199。

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48 卷第 1 期，2010 年 10 月，頁 119-144。

陳冠至、陳柏溢、黃敬程，〈孰執牛耳？明代蘇州藏書家社群的數位人文解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55 卷第 3 期，2018 年 11 月，頁 243-284。

陳連營，〈翁方綱及其經學思想〉，《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6 期，頁 8-14。

陳鴻森，〈《翁方綱年譜》補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5 期，2004 年 9 月，頁 287-348。

曾紀剛，〈同聲與異響：翁方綱四庫提要稿與《四庫全書總目》集部提要較論〉，《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19 期，2008 年 4 月，頁 1-28。

琴知雅，〈翁方綱的詩學及「學術詩」〉，《曲靖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第 2 期，頁 1-7。

- 程煥文，〈秘而不宣保守典籍—論中國古代的私人藏書（上）〉，《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2年第1期，頁51-55。
- 程煥文，〈論清代藏書思想及其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的關係—《清代藏書思想研究》序〉，《圖書館建設》，2013年第1期，頁2-4；10。
- 費愉慶，〈中國古代官府藏書機構考〉，《當代圖書館》，2004年第3期，頁75-78。
- 陽祖達，〈清初私家藏書的時代特徵〉，《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年第3期，頁106-107。
- 陽曉，〈沈德潛格調說研究評述〉，《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頁45-48。
- 黃博，〈謹小慎微與膽大妄為：高壓政策下的文人行為—翁纂四庫提要稿《潁川集》之存廢問題探微〉，《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頁61-63。
- 葉憲允，〈清代「靈隱書藏」及其影響〉，《高校圖書館工作》，2016年第4期，頁73-77。
- 劉天琪，〈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成書考〉，《中華書道》，第63期，2009年3月，頁21-28。
- 樂怡，〈翁方綱纂《提要稿》與《四庫提要》之比較研究〉，《圖書館雜誌》，2006年4期，頁74-77。
- 蔡志超，〈翁方綱肌理說及其杜詩論述〉，《慈濟技術學院學報》，第14期，2009年11月，頁273-290。
- 鄧宏峰，〈中國古代藏書家保存與傳播文化典儀的貢獻〉，《安陽工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頁35-37。

鄧雪峰，〈古代私人藏書與藏書家之貢獻〉，《前沿》，2008 年第 10 期，頁 189-191。

鄭駿捷，〈《四庫全書》在澳門〉，《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頁 20-22。

謝彥卯，〈論清代私人藏書〉，《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3 年第 1 期，頁 107-109。

韓文寧，〈明清浙江藏書家的主要功績和歷史局限〉《東南文化》，1997 年第 2 期），頁 141-144。

韓梅花，〈清代京杭運河沿岸私家藏書的流傳與傳承〉，《文獻研究》，2013 年第 5 期，頁 93-95。

嚴迪昌，〈「市隱」心態與吳中明清文化世族〉，《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1 期，頁 80-89。

顧沿泊，〈古代書院藏書對現代圖書館的啟示〉，《圖書館情報研究》，2010 年第 4 期，頁 187-190。



四、學位論文

方挺，《清代福建私家藏書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4 月。

古艷敏，《清初私人藏書群體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5 月。

朱友舟，《翁方綱書學思想研究》，南京，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4 月。

- 吳倩，《清代私家藏書群體研究》，保定：河北大學管理學碩士論文，2012年5月。
- 吳淑慧，《清儒翁方綱及其《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6月。
- 宋如珊，《翁方綱詩學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12月。
- 李心鵬，《翁方綱題跋手札文集中所見的書學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5月。
- 季玲，《論晚清藏書樓》，清寧：曲阜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4月。
- 段惠子，《翁方綱著作研究—以經學、金石學、書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年4月。
- 孫守真，《翁方綱及其文獻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2月。
- 張朵聰，《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研究》，河南：河南大學美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5月。
- 張偉，《翁方綱詩學思想探析》，江蘇：蘇州大學文藝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4月。
- 黃立一，《翁方綱詩論與清中期詩學思潮轉向》，泉州：華僑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4月。
- 黃敬程，《明代北京私人藏書研究》，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6月。
- 楊小華，《翁方綱詩學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5月。

楊吉源，《朱笥河研究－以樸學論題為中心》，新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1月。

楊淑玲，《翁方綱肌理說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7月。

董睿，《王昶「一代風雅盟主」論》，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4月。

趙太順，《翁方綱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

趙飛鵬，《楊守敬之藏書及其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5月。

鄭才林，《翁方綱詩歌創作及其詩學思想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5月。

五、網路資源

漢·司馬遷，《史記》，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資源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c01496060b41493bbb62755d369d44d1fDQzMzM50&page=&whereString=IEBEZXNjcmlwdGlvb19Db2xvcGhvbiAi57-B5pa557axIiA1&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lj6TnsY3lvbHlg4_mqqLntKLos4fmlpnlucsi0&SourceID=1&HasImage=。

宋·郭忠恕，《佩觿》。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資源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ea0e239d1f0a4ce19b538f3d1957cb2efDQyOTY30&image=1&page=&whereString=IEBEZXNjcmlwdGlvb19Db2xvcGhvbiAi5pa557axIiA1&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lj6TnsY3lvbHlg4_mqqLntKLos4fmlpnlucsi0&SourceID=&SourceID=。

宋·蘇軾，《註東坡先生詩》。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資源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38eb1789060d47048d72d1fb2806bb78fDQ1Mzg50&page=&whereString=IEBUaXRszV9NYWluICLmnbHlnaEiIA2&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lj6TnsY3lvbHlg4_mqqLntKLos4fmlpnlusiq0&SourceID=1&HasImage=。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資源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c64a244211eb40c0bf89176bbab1b35afDQ3ODM10&page=&whereString=IEBEZXNjcmlwdGlvb19Db2xvcGhvbiAi57-B5pa557axLiA1&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lj6TnsY3lvbHlg4_mqqLntKLos4fmlpnlusiq0&SourceID=1&HasImage=。

清·鄭玄，《儀禮註疏》。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4e/1b.html>。

哈佛大學，「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
<http://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bdb>。

